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高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行发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长沙潇湘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期刊登记证第125号

*

1986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6千字 印张: 7.7

印数: 1—7,000 定价: 1.25元

目 录

自传·····	陈明仁 (1)
我的一生·····	方鼎英 (38)
附录：方鼎英墓志·····	陈树华 方辉生 (68)
记外祖父王礼培的生平事迹·····	易新夏 (73)
熊希龄的一生·····	周秋光 (80)
一代名医易南坡·····	易肃如 (103)
回忆我的伯父杨端六·····	杨宜福 (107)
我们所知道的陈嘉勋先生·····	黄时裳 黄曾甫 (118)
周介禔先生事略·····	周仁济 (121)
伯父刘兴传略·····	刘 岳 (129)
回忆戴岳先生·····	潘 监 (135)
先君陈浴新事略·····	陈守宁 (143)
周灿小传·····	刘 岳 (152)
鸭绒被创始人丁鹏翥·····	王和政 (156)
化学教师郭德垂·····	郭道晖 郭道光 (161)
龙伯坚事略·····	黎 丰 (164)
简述父亲焦达悌的一生·····	焦传爱 (178)
我所了解的石声汉教授·····	姜义安 (183)

周佛海的青少年时期·····	钟玉如(201)
杨致泽刘昭彭伯陔其人其事·····	周德民(209)
湘西会战中武阳遭遇战和武冈追击战···	蔡鸿源 孙必有(216)
“湘游一纵”回忆录·····	赵琦 陆民华 刘文通(233)

自 传

陈 明 仁*

一、家 世

我于一九〇三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东乡的一个名叫洪源冲的地方。祖父是一个雇农，一生忠厚勤劳，经常被人剥削欺负。一九三〇年去世。祖母同祖父一样忠诚，但管教子孙很严，治家颇有条理，于一九四六年病故。父亲最初是一个自耕农，中年以后，才逐渐拥有一点山地稻田，从几石发展到百多石，取得了绅士的地位。我母亲死得较早，她死时我才十三岁。接着我父亲又续了弦。我很小的时候，曾和本地一个农家女子谢芳如订了婚，因为母亲的死，我在十三岁那年，便和谢芳如结婚了。我兄弟五人，弟弟明礼，于一九四四年死了，明智、明陶一向在家，明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警卫团长；姐姐四人都出嫁了。我生了两子一女，女儿早死，长子扬钊，曾在中央军校和金陵大学毕业，现在全国政协工作，次子扬铨，现在浙江大学读书。他们都已结了婚，孙儿三人，孙女三人，都还很小时。我爱人谢芳如和我同甘共苦地生活了三十多年，她是旧社会一个典型的善良主妇，对于我生平求学的鼓励，服务社会的支持，以至后来参加解放事业的帮助，都是很大的，但一病三年，已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去世，这是我个人

* 陈明仁(1903—1974)系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是湖南和平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传记手稿现存中央军委，是作者五十年代初所写。

和家庭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父亲是一九三〇年死的。那时候浏醴交界一带，有一部分游击队活动，知道我在国民党军队里任旅长，于是派队伍向我家索取枪械。我父亲无以应付，致被他们掳走。后来县政府闻讯，派了保安队伍进攻，游击队在仓皇退却之际，无法顾及扣押中的人质，把我父亲寄押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得以逃回家来，由于他在押时受过多次刑讯，伤势很重，不久便死了。父亲的死，当时许多人认为是地方上很重大的事件，而我则根据唯心观点，认为命所注定，不愿深加计较。所以，当我回家奔丧的时候，始终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游击队不仇恨、不报复，免得多所牵连。甚至明知当地有些人参加了这一活动，都一概不去追究他们。我认为，我父亲的死，乃是由于下列几个原因：一是我当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在政治斗争的影响下，我父亲自然成了攻击的对象，我家中虽然没有枪械，但游击队向国民党军官追问枪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二是我在那时，每年生日，经常有些部属赠送若干大大小小的银质镀金的礼品，如寿星一类的东西，我都一概送存家中，乡间不知价值，误认为全是金银，因而负了一个富有的虚名，引起一般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当时向我家有所需索，也就不足为怪；三是我父亲本身是一个当权地主，平常以好汉自居，喜欢过问地方的事，甚至欺负剥削劳动人民，与当地人民难免不结仇恨。所以我父亲的死，不能归咎于人，他和我都应该负责的。

我家在祖父时代，是根贫苦的，到父亲手里，才约计共买田一百多石租。父亲逝世后，到我兄弟分居时为止，由我买成田租共为一千石。分居后，我又续买田租八百石，连同以前所分乃独占有田租一千石。此后，在醴陵县城建有房屋一栋，南京建有平房两栋，在衡阳县有小型房子一所；其余在醴陵乡间，尚有部分园土、茶山、鱼塘等，为数不多。

由于我长年在外，全部租谷从来自己未收用过，而是用在家乡，做了一些所谓“公益事业”。计有：（一）创办小学五所，对贫苦子弟，实行强迫教育；（二）筹设药局一所，聘有医师为居民治病，医药费分为全费、半费、免费三种，而以免费为最多；（三）办义仓一个，专供度荒时，免息借贷；（四）每年冬天，根据地方造册，普遍救济附近贫民一次。此外，我每年回家一次或二次，每次必另筹措一笔钱，实行所谓济贫。济贫之外，近邻贫民有向我借钱的，也借给他们。其借贷分两种：一为还本不计息；一为还息不还本。如果有确实还不起的，便于我回家时，当面焚卷了事。而事实上，我在借钱的时候，并未计较其还与不还，所以我每次回家，当场焚券的事，是相当多的。

我这种拿着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而来的钱，转向劳动人民示惠的法子，连续达十年之久。至一九四七年回家时，计算结果，每年收的田租，不但完全用光，而且还欠很多债。于是，我不愿再行包办下去，而将这千担租除提存三百担分给妻儿们外，其余七百石，完全捐给地方，由地方上推人自己去经营，我不再直接负责了。

我的爱人，随我在外二十余年，平日是善于节约和储蓄的。一九四五年我因为在七十一军军长任内，亏空甚巨，又因好名，不愿拖欠“公款”，我知道她已陆续积存了黄金约一百六十两，于是向她商量变卖还帐。虽然她当初不肯，但经过多次争吵，终于变卖了。变卖所得，除弥补所亏空的公款外，还剩余法币五百万元（凭记忆约值黄金四十两），交七十一军上海办事处处长陈公杰，嘱其生息并经营些临时生意，以作那时家庭生活和儿女们的教育费用，这是我的家庭经济概况。在此，我还要附带交代一下，我与公家经济的关系。

我过去在国民党部队，由当连长起便抱定一个决心：即对士兵不克扣，对人民不勒索。如果要钱用，则向蒋介石要。因

为我过去每年总得要见蒋介石一、二次，每次见他，他总要送我三、五千元，以笼络我好替他多多卖力效力。过去，我总自命比人家廉洁，没有直接贪污过钱钞。但到了今天，才发现这一部贪污史，不知从何说起，现在只能就比较重要的交代一下。

一、我对经济，一向强调公私分明，所以常认为一些田产、房屋，是我过去在做主官任内的薪水和特别费积累下来购买添置的；其他则是蒋介石个人送给我的，并不认为属于剥削。对于“公家经费”则主张公款公用，家中及私人绝不滥支。但事实上，我过去的生活，是相当浪费的。各种应酬以及接济部属们的费用，是相当浩繁的。这笔钱真不知花费了多少。军需人员为了应付各种花费，于是吃缺、生息、做生意、办假报销等等贪污方式，便层出不穷了。而我为了要钱用，也就明知故犯，不去禁止，思想上横竖认为是公款公用，反正我和我的家庭，没有拿什么钱走。所谓应酬或涉及应酬的浪费，都认为是为团体、为部属，反认为我不负这个团体的责任，私人便没有用这些钱的必要。而对于为什么要用钱？——政治腐化；为谁用钱？——四大家族及个人利益；用的是那一些人的钱？——劳动人民的血汗。都未仔细去考虑过。所谓廉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话，也可以说实际上就是贪污，并纵容了部属的贪污，也助长了社会坏风气。

二、一九四九年我在长沙起义时，外传白崇禧空运原第一兵团光洋几百万，铁甲车送光洋几十万，黄金几万两；兑换变卖盐款和银元券又多少万；送安江家属又带去光洋多少万，黄金多少两；总之这笔洋财，是不可以数计的。我因当时环境很险，没有心神和时间过问这些，同时对上述谣言，也无所闻。直至由北京回来，才知道有这种传说。我很清楚谣言的来源，是由于白崇禧在我起义后，向原第一兵团官兵广播，并散发传单，说他曾发了我多少钱，没有转发下去，引

起官兵们对我的怀疑，以达到分化之目的；部队中的坏分子便借此造谣，以图中伤。我对此事，一向认为无辩白的价值，是非真伪，自然会有事实证明。但也不能不承认，那时的经济情况，确实非常混乱，难免公私不分；乃至我在混乱中，也确实涉及贪污的事实。例如：（一）起义前两月，我兼任长沙警备区司令，以禁止现金出口的“法令”名义，扣留国民党中央经委会转达萍乡的现洋七万多元，报缴省政府。当时，程潜主任（兼省政府主席）在此款内提交第一兵团周转费一万五千元，后由家眷送往安江。长沙办事处长罗召南，正在安江筹设留守处，要求将此款连同他另所控制的五千元，共计两万元随同送往安江（这大约是谣传安江送款一百九十余万元的起因）。及至湘西解放，家属回来，始知此两万元，因突围叛军家眷过境，纷纷需索救济，最后仅留下六千余元，经两儿杨钊、杨铨将它变卖成黄金七十余两，我当即平均分给他们兄弟，作为今后生活费用。

（二）起义后，我去北京一趟回来，我爱人说：财务科长谢家将送她黄金五百两，她即追问此金来源，据谢当面报告是用白崇禧未及运走的一批存盐变卖得来的。当时我仅留一百两交给爱人，其余四百两则提作省政府主席特支费，以应付当时非常局面所需要的开支。这四百两黄金，我在省政府主席任内，自起义赴京至第二年四月交卸时止，已完全用光，其中包括接济失业旧部，以及因家中减租退押、买公债等，可说是公私未分的。而留给爱人的二百两黄金则也在她病中医药费以及死后丧葬费开支内用完了。

现在，我的经济状况是：醴陵全部田产已由土改时扫数交还农民，押款也已全部退清。衡阳及南京的房屋，正在办理手续送清当地人民政府接管设法利用，我不再继续占有。只有桂林还有一块地皮，尚未处理，醴陵有一栋房子，仍为我侄辈暂住。长子杨钊已成家，能自食其力；次子杨铨，亦快大学毕业。

业，不久可独立生活，我在经济上的包袱，已很轻了。

二、学 历

我小时候在家乡的私塾，读过几年旧书，然后进入高小，在高小只读一年。到一九一五年便因费用太大，负担不起而中断了，但仍然在附近补习一年。一九二〇年才跑到长沙，投考兑泽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了一年小学。那时小学教师待遇菲薄，没有余钱拿回家，帮助家庭解决困难，大为我的祖母所不满。因为她本来是不很赞成我读书的。读了书还是无出息，更加触动了她的愤怒，终至闹到不肯让我在家停留的地步。我当时也感觉到教小学不是出路，家里既无法容身，于是决心外出，准备跑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一天晚上，暗地偷回家中，要求我父亲给我三十元银洋作旅费，并表示从此以后，再不会向家庭有所索取了。当时父亲瞒着祖母给了我旅费，次日一早，我便背起一个包袱，踏上了投笔从戎之路。而知道我去的，只有父亲和我爱人，祖父母和兄弟都蒙在鼓里。

我于一九二四年单独一人到了广州，时机不巧，黄埔和讲武学校都已不再招生了。同时，同乡青年还有很多人一样向隅。后来，我因潘培敏的介绍，见到了军政部讲武学校教育长李明灏，得到李的特别关照，而被例外地收下了。讲武学校的校长是程潜，监督周贻虹，教育长李明灏。校内分为四个队，第一、二两个队为学生队，第三、四两个队为军士队，我是参加第一队的。我进讲武学校时，该校已经开课很久了，完全采用军国主义的打骂教育，同学操练不好，动不动就遭受体罚。伙食、被服都不周全，言论更被周监督所限制，引起大家不满。但又不敢正面反抗。我在学校本想埋头学习，但由于到校后，学术各科都能赶上人家，表现了特殊的才智，博得老师、同学的推重，他们希望我在这时，对此事有所主张。一天晚上自习时，我便号

石全体同学正式向学校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并且立即得到全体同学的拥护。而当时学校认为我们这是造反。第二天，周监督召集全体同学追究，并说这是违反纪律的事件，全体同学都要受处分，而倡首的尤其要军法从事，责以军棍，并查问谁人为首。这时，我即挺身而出，自认为首，并说这种合理要求是应该提的。当时周认为我还坦率，乃从轻改责手心二十了事。这是我生平求学以来第一次受到处分。当时我思想上认为，我们这种要求是正义的、反压迫的，而竟得到如此处分，因此，对周深为不满不服。

这年冬季，校长程潜被任命为攻鄂总司令，将出发攻打武汉。有一天，大元帅孙中山及党代表廖仲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等，到学校讲话。孙首先宣布程校长须出师北伐，不能兼顾校务，今后讲武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由蒋介石负责，这时第三、四两队已先毕业随程出发，只有第一、二两队是等待合并的。可是隔了很久，合并未曾实现，恰逢周贯虹又发表为赣军总司令，于是有人说，第一、二两队要提前毕业，作为周的赣军干部，不合并于黄埔了。同学们听此消息，深为不满，认为我们都是大元帅的学生，他已吩咐学校交蒋介石合并办理，周某不能擅自改变这个计划。当时，我们集议，推选代表十二人到黄埔去质问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来接收？我也被推为代表，而且为十二代表的率领人。我们事先向学校请假不准，并被大骂一顿。我们无可奈何，只好不顾一切冲出校门，跑到黄埔。到黄埔军校见到蒋介石以后，我们表示欢迎新校长，希望早日实行合并，更说出周的用心。当时蒋答复说：“合并迟早要实现，但目前还有某些困难。至于周想私自将你们提前毕业，是决不可能的。”蒋吩咐我们回去好好安心等待。当时，我们告以未经学校准假，而是冲出校门跑来此地的，回去一定会受处分。蒋说：“你们拥护大元帅，欢迎新校长是光明正大

的，我可以派人护送你们回去。”于是派了军校秘书袁同畴把我们送回了讲武学校。但我在此时又和另一个同学，跑到党代表廖仲凯、俄国顾问鲍罗廷处报告此事，没有随同袁一同回校。当袁同畴等未到学校以前，学校已宣布将我们十二人开除学籍。后来看到大家是经蒋派袁护送回来的，学校才收回成命。但袁去了以后，学校又挂牌把我们十二人开除，并指明陈明仁除被开除外，还要扣押。不久，我坐了廖仲凯给我们乘的一辆汽车回到学校。一进校门，校方便将我扣押起来。这时已是深夜，同学们知道我已被扣押，于是大闹起来。我当时想出来向同学们说话，而值星官李国良制止不许，后来鉴于同学们情绪激昂，才集合了大家由我出来说话，我说明我们见到了蒋介石，已得到好的答复。并劝同学们解散，安心睡觉，等待发展。同学们也就风平浪静地散了。可是学校方面看到我的能量如此之大，大为震惊，害怕将来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区队长林柏生、惠济、乐钧天等出来调解。调解的办法是：由所有区队长联名向校方担保不开除我们。我们当时认为学校出尔反尔，毫无诚意，一致不接受区队长的调解，甘愿被开除。因此十二人当晚即愤而离校，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小学校借住了一晚。次日早晨，即将服装脱下，交回学校，以表示我们的决心。这一天，我又被十二个同学推派，去见蒋介石。蒋当时知道我们的情况不妙，深为同情，答复马上帮忙处理。他先要我们搬到旅馆住下等候。当时，我们和讲武学校同学间的联系，还是密切保持着的，联系的办法，便是与学校每天外出采买的同学交换意见。某天，同学中特别选出一位能干的同学当采买来和我们商量。商量的结果，决定每天推选十二人为代表向学校交涉。第一天的如被开除，则第二天再推选十二人，如此继续下去。果然第一天的十二名代表被开除，第二天的十二名代表也被开除。这时，学校感到事情严重，才与蒋介石具体交涉合并办法。不到

几天，我们学校就合并到黄埔军校了。合并时，周贯虹向蒋介石提出了五个条件，其中有一个是，不得收留被开除的第一批学生。当时蒋也答应了。可是在合并之先，蒋介石便派人到我们住的旅馆，付清用费，接我们十二人先到黄埔。等讲武学校全体同学并入黄埔时，我们十二人，已经早编入黄埔第六队了。这是我由讲武学校转入黄埔的经过。

黄埔军校原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队，以及五队一个队。一、二、三、四队为黄埔第一期，五队为第二期。讲武学校的学生并入后，编为第六队，但仍为第一期。第一、二、三、四队，比我们早三个月毕业，第六队则迟三个月在东江毕业，当时校长便是蒋介石。

我在黄埔军校专心读书，除参加“血花”剧社外，没有参加过其他活动。当时学校内有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种组织。我一概都未参加。未参加的原因是，我认为我要做一个单纯的军人，不愿沾染政治关系。这种政治性的组织活动，对我个人的发展是无多大帮助的。不过在上战术课时，我往往有些闹事，与教官为难。因为教官所讲的内容，我们早已在讲武学校学过，再学没有兴趣。战术教官刘尧震，每次遇着闹事的时候，便把闹事的人名记在本子上。他对这些人特别注意。而我后来得到刘尧震的信任，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一九三二年，我在八十师任副师长的时候，我曾被调到庐山训练团第一期受训，并兼了一个教官的名义，但实际上我并未到职，经常逗留在醴陵、南京等处。等到第三期的时候，我又由八十师师长之职调去受训，并任该团第三营副营长。我因为在八十师没有完全接受我的上级、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要我杀害一批经红军训练后释放回来的被俘官兵的命令，大为蒋鼎文所不满，定要惩罚我。于是借调训的名义，把我的师长职务解除了。所以在庐山受训完毕后，被调任为第二师的参谋长了。

到职还不到二、三个月，蒋鼎文知道了我任参谋长，仍不甘心，又建议将我免职。我被免职后，很久没有实际工作。我于一九三五年进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为时一共三年，一九三七年，陆大暑假期内，我又被调到庐山训练团任区队长三个星期。一九三八年上期，抗战正在进行，珞珈山又在训练干部，我又被发表担任女生队长。但因另有任务，并没有到职。庐山军训团的团长是蒋介石，副团长是陈诚，以下各职都由现职高级将领担任，而受训的便是从各部队调来的中下级军官，或各行政机关的重要干部。训练内容，注重精神思想方面，主要的是要大家一致团结，从事于所谓安内攘外、拥护领袖、复兴民族。而安内就是剿共，攘外就是抗日。这替后来抗战时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至于在当时由这种训练所造成的剿共的实际军事行动，就更不必说了。陆大是当时国民党政权下，唯一的最高军事学府。它专门研究军事理论和现代化的高级军事战略、战术，政治课根本没有。校长杨杰，是当时中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但他和蒋介石、何应钦意见不合，常为蒋、何等猜忌。解放后，杨杰准备由滇经香港北上参加政协会议，被特务杀害了。我当时进陆大，并非真正有心深造，而是为了三个原因：（一）我当时闲着无实际工作；（二）想加造资格；（三）藉此等待好的机会。所以在校三年，根本没有学到什么，甚至后来什么课都未去上过，而考试时要完成各种课程的答案，则都请同学代庖。例如戴坚、陈庚、黄彬、韩浚章等同学，都是我经常固定委托负责作答案的。这样混了三年，于一九三九年春毕业。

一九四三年，我在云南任七十一军副军长时，兼任驻滇干训团第一期步兵大队大队长，第二期将官研究班主任，及第四期副教育长。那时因“准备美械”，教育内容完全是学习美械的使用，纯是军事技术，没有政治课程。我任第一期将官班主任

时，曾率领受训人员，到印度蓝姆茄美国步兵战术学校去受训。当时受训的有团长以上，乃至军、师长职级的人。而教练都是美国下级军官，甚至是上士，学的又是一个兵的基本动作。如步枪如何拆卸、洗擦，如何射击之类。

大家都认为他们这是故意侮辱中国人，因而深感不满。我个人更是高高在上，根本不太去过问。

下面我讲讲自己的主要经历。

三、主要经历

一、惠州之役

我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毕业后，便在一九二四年的八个月之内，因战功一连接着由见习排长而节节升任排长、连长，以至营长，参加了广州北伐前有名的东莞之役、惠州之役两次战争。

我最初由讲武学校编入黄埔军校以后，因为战术课程在讲武学校已学过，对于战术教官刘尧震每次上战术课，不能特别引起兴趣，往往当场吵闹。刘也每次都把吵闹的人名记上，反而另眼相看，认为这些人是胆大有为的。因此，在第一次东征时，军校教导团围攻淡水之役，刘尧震为营长，曾将平日闹事的都调到营部见习，我便是其中之一。不久，我被调到第二团任少尉排长，后来刘任第四团团团长，他又把我调到第四团一营三连当中尉排长。其时，当我们的连长的都是黄埔军校一、二队的毕业生，我们瞧不起他们，常常闹不团结，记得我在第二团当排长时，还曾因事打过连长，结果刘仍庇护我，把我另调一连，而未加处分。但是连长对我怀恨在心，当我们驻虎门时，有一次，连长居然设计来暗害我，请我和另外两位排长，同到馆子里吃饭，首先灌我们的酒。酒醉后，又带我们进妓院玩

一晚。因而三人都得了花柳病。其他两个排长患病后，便进医院治疗，我则坚持下去，不愿示弱。有一次下操，副营长张际春知道我在尽力勉强支持，特嘱我下去休息。后来连长知道了。认为我未经许可擅离操场，要求营长给我处分。营长杜从戎转请团长刘尧震处理。刘即叫我去一下，当我见到他时，他只亦庄亦谐地说了一句：“为什么你们一玩就会得病，我生平玩了一辈子，都未得过病。”并未加责备，而且要我仍回连队去。对于连长请求处分的事，根本不议。因此，我的气焰更加高涨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蒋介石下令缴郑泳琪的械。一天晚上，由虎门向东莞出发作战，那时营长和副营长都因我有病，要我留在后方，但我自己坚决要求去。因为一则当时年轻，好胜心强，不去怕背上一个怕死的声名；二则认为我是由讲武学校编入黄埔军校的，非蒋嫡系，已经被人轻视，如果临阵退缩，则以后更无出人头地的日子；三则刘团长对我太好，我非替他出力不可，于是决定带病出发。但我始终由两个兵扶起走，走到快天亮时便停在地下，寸步难移了。副营长张际春见我病重，定要派担架把我送回后方，我坚决不肯。一会儿，拂晓攻击开始了。这时第一营接受攻击任务，我们第三连本是作预备队的，但首先望见东莞东门的一个山头，有很多敌人在企图抢山。营长当时便要我们第三连首先占此山，而连长竟下令派我第一排去攻占。我当时认为自己病得不能动，而他偏要我首当其冲。这是连长故意与我为难。我气愤之下，忘记了痛苦，一个人身先士卒，爬上此山，指挥部队将此山头占领，并一鼓作气，趁敌人未攻之前，先行攻击，带领全排勇猛冲入敌阵，猛打猛冲，结果缴了敌人一营人的枪。缴获数目之大，以我排为最。团长认为我战功卓著，一面到黄埔报功，一面将我升为本连连长，而将原来的连长调开。

一九二五年，广东政府第一次东征，久攻惠州不下。到了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对于惠州乃采取监视政策，并无再攻之意。但刘尧震自告奋勇，愿以所带的第四团攻打惠州，自信一攻必克。而当时负指挥之责的蒋介石，也就寄希望于刘尧震，把攻惠州的任务交给了他。当部队由东莞向惠州进发时，我病已经转剧，多人劝我回后方休息，而我仍然不肯示弱，坚持要去参加战斗。由于张际春让了一匹马给我骑，不需步行，减少了一些痛苦。

开始攻惠州的日子定在十月十二日。首先挑选奋勇队，我这连被挑了二十余人，以杜从戎为奋勇队长。当时的兵力部署是，第一、第二两营担任攻击，由北门进攻；第三营监视西门。这天早上开始攻击，一接触，便死伤很多。第一营营长，第一、二连连长都负了伤。因而攻击任务，未能达成。下午团长命令我带第三连增援。我接受命令后，立即准备攻击。惠州城四西皆水，要跨过一座桥，才能达到城边，地势极为险要。我受命后率领全连的兵力，冒着炽烈的炮火，先抢过了桥，离城已经近了。但因预备的一些攻城用的梯子，都放在桥那边，抢过桥时没携带，没有梯子无法上城，又只得到桥那边将梯子搬来。在桥上一来一往过了很久，敌人用密集火力射击，我连死伤很大，结果只搬过来八张梯子。当梯子搬过来时，团长刘尧震已达到我连的位置。他知道我已搬过来八张梯子，就命令我准备赶快攻城。就在他吩咐我的一刹那间，忽然敌弹飞来，中了他的要害，他马上阵亡了。我当时认为，我当学生以至现在，都是受刘的爱护，对他特别感激。现在目击他死在我身边，我不禁悲愤交加，对于敌人的仇恨，急剧增长。于是不顾一切，带着一连兵力，冲锋前进。但因梯子搬不上，仍是无法上城。这时，天色已晚，阵地上的士兵，在敌人火力的监视之下，极本不能再动，茶饭也都没有，我只好冒险来回行走于阵地上，亲

送茶饭给每一个士兵。并把阵亡人员所遗下的枪枝收拾，交给伙夫带回后方。团长死后，由副团长黄庚籓和一少校团附负责指挥。这天晚上，副团长接到何应钦的命令，无论如何要限当晚将惠州城拿下，否则军法从事，副团长接命令后，马上找我去接受这个攻击使命。我当时坚持当晚不能攻击，理由是兵散无人掌握，加之官长多负伤阵亡了，力量不能集中，梯子也背不上去了，即令能攻入城内，晚上无法清扫敌人，也是不能坚守的。但副团长懦弱无能，毫无办法，他对我的主张又不敢呈复，要我自己写报告复何。我便把不能当晚攻击的理由，写了一个报告由副团长转给何应钦。何接到我的报告后，随即来令我指挥第一、第二两个营，于明日拂晓攻击。我接令后，立即准备收集队伍，并拟以一夜之力，把梯子搬靠城边，但经过通宵的努力，一、二两营能收集的士兵不足一百五十人，八张梯子也只搬了一张靠近城边，其余七张因城上炮火激烈，使人寸步难移，未能搬去。同时，原来规定拂晓攻击的信号为打十发炮弹，准备在打到第三发炮弹时，便开始冲锋，可是届时一直没有听到炮声响，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等了一会，接何应钦的命令，说要重新布置，并要把监视西门的第三营由西门调来，同时发表第三营营长惠东升为代理团长。我接到这个命令之后，马上松了一口气，以为攻击惠州城的任务是第三营的了，可是事实不然。惠东升代理团长以后，却仍然给我命令，要我指挥。将第一、第二两个营，编成七个队，每连一队。我连人数多一点，便编成两队。每队带一梯子，并指定攻击目标。到时，各向攻击目标冲锋前进，时间为下午一时，仍听炮声三响为信号。届时我一切准备妥贴了，炮声一响，我便带了七个队，冲锋前进。但在这个时候，眼看到凡属前进的都倒下了，再也不能抬头。我心里很着急，于是只带着一个号兵，手中拿着一面旗子，吹着冲锋号，猛向前冲。但是回头一看，部队并未行

动。这时我军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视线之下，前后左右，都是死的伤的，号兵也死了。我在这万分紧张之际，仍拿着旗子向城下跑。经过几段跃进，才到达了先天晚上放梯子的位置。这位置处在死角，比较安全。当时，城楼已经被打垮，城墙出现了缺口，机枪步枪对城下射击还是很密，不过敌人打不着我。我站了约半小时，一直看不见我们部队的一个人。过了一会，才陆续发现来了两个士兵，是第一连的。我把他们叫到面前，商量爬城计划，计划结果是我们三人一齐爬城。于是，由我领头，他们两人跟着我前进。当时，我身上带了一支驳壳枪，四个手榴弹，手里仍然拿着一面旗子。当梯子刚竖起来，我便拿着旗子沿梯而上。等到梯子靠到城墙，我已跃上了城墙顶。到顶上后，首先以手枪向敌人射击，接着抛掷手榴弹，敌人猝不及防，立即四散。等我继续抛掷两个手榴弹时，旗子已插上城头，并眼见敌人开始溃退。我们城下的队伍，也蜂拥而上。惠州城终于被我们占领了。这是十月十三日下午四时的事。第三天，蒋介石、何应钦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在惠州集合全体部队，由蒋介石亲发口令，吹三番号向我敬礼，并宣布命令，升任我为第三营营长。

二、九江会议和预二师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陆军大学毕业后，由于何应钦的关系，被派到军政部当部附。在此期间，曾一度被派为点验主任，负责点验湘、赣、浙三省的部队，接着点验四川部队，因为一度被发表为第六辅习训练处处长，四川并未去了。但补充兵训练处也未去到差，又于六月底发表我为第二预备师师长。原来第二预备师是由贵州保安团队编成的，师长为贵州人冯剑飞。部队由贵州开到岳阳时，才装备武器；装备后，又由岳阳开到咸宁。这时冯剑飞去见蒋介石，蒋问这个部队能否作战。冯

答：“没有把握。”蒋一怒将冯撤职。冯被撤职后，何应钦便推荐我继任师长。我接到任命之后，是在某一天的早晨至咸宁接事的。而在当天下午便奉命率部队赴九江作战。这时部队已发了枪，但都未经过射击训练，干部也是没有作过战的。尤其大部分负责人，在出发之际，都怕上前线而纷纷逃跑。司令部六个处长逃了五个，整个部队都是很乱的。当部队开拔经过汉口的时候，我见到了何应钦，何得知这支部队要开往九江作战，为之骇然。认为这个部队在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参加战斗，并向蒋介石建议，把这个师的任务变更。蒋介石当然也认为他的建议是对的。所以我这个师开到九江后，开始受张发奎指挥，并直接受李汉魂节制。由于自己知道部队本身太不健全，而作战任务终将加上，所以，一到九江，便加紧训练，在敌机不断空袭之下日夜不停地训练。这样训练了一个星期，我自己在晚上训练营以上干部，天亮前训练排连干部，白天便由干部训练士兵。一星期后，部队大有进步，作战才有了点把握。当敌人在九江发起进攻时，蒋介石特别电告张发奎、李汉魂，不要将预二师投入战斗，而调到瑞昌整训。但张发奎、李汉魂还是命令我师参加了战斗，并未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但是九江会战的结果，是八个师都被打垮了，只有我这个预二师，非但未打垮，而且完成了任务。当时蒋介石、何应钦都很嘉奖我这个部队。但是不久，便发表命令，令预二师与四十四师合并，预二师撤销，我当四十四师师长。本来四十四师是由税警团改编的，装备是新式武器，但是归军长俞济时指挥。我担心在他的指挥下，我师的人事、经理，将会完全受他管制，不能如同预二师一样独立自主了。因而由瑞昌跑到汉口去找何应钦，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我的理由是：预二师本来是一个不能作战，而且不必参加作战的部队。可是结果在战斗中完成了任务，并未溃退，比任何老部队都要好些，上级也曾奖励，现在反而又将

它的番号撤销，这仿佛成了一种处罚了。但何应钦极力解释说明，这是由预备师改为正规师，并且变为了一个有很好装备的部队，这自然是赏的意思。而我则坚决表示，这非赏而是倒罚，要求从此解甲归田。同时从地域观念来打动何的心，说预二师的官兵多系贵州子弟，四十四师的干部都很齐全，将来一旦人事异动，干部都会被淘汰的。他们在九江作战有功，我不忍坐视他们将来流离失所，我只好和他们同进退。当时，何应钦认为我的理由也对，但又说命令既下，很难收回，要我直接向蒋介石去请求收回成命。我当时拒绝了去见蒋，因为这是军政部长的事情，何可以处理，无需去向蒋介石请求。僵持的结果，我终于胜利了，逼得何应钦向蒋介石要求，把成命收回了。这样，我才仍带了预二师开到岳州报到。后来陈诚知道我得到何应钦的支持，仍保留了预二师，大为不满，便向蒋介石建议，仍然坚持要把预二师撤销。撤销后的部队开到江西，拨给第八军节制。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建议，便下了命令。当我接到命令后，马上就准备移交，不再去找何应钦了。我不再找何应钦的理由是：原来上面要撤销预二师，发表我当四十四师师长的时候，我去争执乃是为了全体官兵，而非为我自己。这次发表命令，则只有对于部队的处理，没有对我本人的安排。如果再去争执，显然是争地位了。所以我接到命令后，便将部队送至江西武宁，交第八军补充，表示个人无所留恋。交待清楚后，我打电报向何应钦请示处理。何复电要我回军政部待命。这时，陈诚到了武宁，当我去见他时，他要我留在武宁，担任第八军副军长。我答复他因为何部长要我回军政部，不能留部队工作。他听了马上变色，表示不满，认为我是属于何一派的。从此以后，陈诚始终把我看作是眼中钉，一直不放心我。其实是我当时说话没有留心，太直率了，而并非自己真的存了什么派系观念。我离开武宁之后，回到汉口，何应钦又决定从四川

补充三个团，恢复为一个师，并改换为正规番号给我率领；但是由于我的坚决要求，这个部队终究仍然保持了预二师的名义。这个部队成立后，便调到长沙，拨归张治中指挥，以便附带担任长沙的警备责任。当部队由岳州向长沙开拔之中，长沙警备司令丁炳权，被调率部抗日，警备司令改由鄧梯接充。我当时得了这个消息，很为不满。认为我的部队开到长沙，长沙警备司令应归我来担任，为什么给别人呢？因为怀此成见，所以部队一开到长沙，便立即渡河驻扎在白箬铺一带，表示我既不任警备司令，则部队便不担任警备任务。后来张治中要我调一部担任警备，我答复说我的部队在长沙的任务是整训，除整训方面的事我愿意接受指挥外，其余概不接受，而张治中对我也无奈何。从此，我便在长沙一心整训了。不久，长沙大火，我在十一月十二日大火之时，还曾由河西渡河进城，想找张治中问问我的部队应该如何行动，但到长沙后，不知张的去向。十三、十四两日我们仍然在岳麓山等着，总希望上面有所指示。结果等了二天，没有消息。这时，我才独断地把部队向湘西开动，一直开到经过沅陵的时候，才接到上级一电，发表我兼任芷江警备司令。不久，预二师被编入第六军，移驻衡山。我改兼湘潭、株洲警备司令。以后，又再扩大范围，兼任衡山、衡阳、耒阳警备司令。

一九三九年秋，我部调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开到湖北松滋、枝江一带驻防。一九四〇年春又由松滋调入广西参加桂南会战。桂南会战时，总司令是徐庭瑶。他当时有一打算，准备在支持不住的时候，将部队撤退，留在广西境内打游击。他的打算竟通知了各部队的高级军官。我接到这个通知，认为非常不妥。后来由于这个打算，一到紧急关头，便都准备打游击，各自撤退，不顾一切，造成全战场十四个师的大溃败。可是，我这个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一直在前线坚持到底，等



待命令，大约坚持了一个星期之久。那时各方面的敌人，都来围攻，我部死伤七千多人，战斗部队牺牲殆尽。直到奉了命令要我撤退，我才撤下火线。我这一次作战，取得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进一步的信任。不久，蒋介石在柳州召开检讨会议，各部队将领都受到处分。没有受到处分的，只有我一个人。因此，尽先给我补充部队。补充后，一直驻在武鸣一带担任防守。一九四〇年冬，开到贵州，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整训。到达防区后，我颇以整顿社会风气的责任自居，除了整理部队外，并干涉地方行政，禁毒、禁赌很严。我严格执行命令，在黔西枪决过一个贩卖鸦片的保长，一个勾引妇女的司令和一个为群众所痛恨而又神通广大的恶霸。一九四一年夏，部队开入四川，奉令去川南接周成虎的防务。周成虎是四川军阀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在川南霸占几县，军队专门贩卖毒品，不听调遣。过去国民党政府几次派人接防，都因武装冲突，不能实现。因而蒋介石便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加到我的身上。首先，我到重庆去见蒋介石，他要我在既不冲突，又能接好防务的原则下，完成这个任务。我接到命令后，一面准备部队行动，一面派人先到川南了解情况。了解的结果，是周成虎无意交接，准备和我作战。但我想如用武力解决，不能达到目的，不如改用政治手腕好些。因此，我决定亲自到泸州去，直接找周成虎商谈接防问题，同时，还利用红帮关系和周成虎打通。这样，说部队暂时不去，只去一个人，表示国民党中央对他并无恶意，可以使他相信不疑。况且红帮关系也可产生一点积极作用。及到泸州，一连和周成虎鬼混了十多天，天天同他过着抽大烟、嫖、赌的生活，并且为了表示诚意，还特别住在他的家里，两人混得很相契了，于是隔阂化除了，无话不讲了。一天，他先向我表示态度，他说：“中央要我交出八县，由中央派人接防，在过去任何人来接防，我都是不交的，今天交给你我很

愿意。而且欢迎你的人早日来接防。”因此，我才问他准备什么时候交呢？他说：“我马上可以下令，将部队调走，让你来接。”不久，他实现了诺言，我很顺利地、不费丝毫力气地接防了。我接防后，驻在叙永，兼任了第八区的清乡司令。在驻防叙永兼任清乡司令的期间，八县归我管辖，更得到了直接参与地方政治的机会，对于执行国民党政府的清乡政策，我特别卖力。例如清剿惯匪、禁烟、禁赌等，都曾认真进行，而且在出巡清理积案时，杀了八个著名的土匪头子。川南八县的人民，认为确实是替地方除了一个大害。尤其禁烟严厉，使云南、四川间经常贩卖烟毒的人，根本不能在境内通过。这也算是一点特殊的成绩。

三、顶撞蒋介石

一九四一年冬，部队奉命开往云南，当时除了我的预二师基本队伍外，还另配有两个师和一部分炮兵部队，归我指挥，论兵力已经大于一个军了。当我的部队开往昆明附近时，中央参谋团、云南行营以及绥署等机关，都一致称赞预二师的部队很好。而我当时也认为确实值得称赞。只是有一个显著的表面上的缺点，便是服装不齐。这是因为抗战期间，公家所发的衣服质量太差，一件棉衣规定要穿两年，事实上一季都穿不到。而那年冬天，又只发给我们四成新的棉衣。所以，士兵服装自然是很烂的。我的部队到云南后，又经常担任筑工事，每逢工作，做工的部队通通把好的衣服收起，临时发给烂的。这年冬，蒋介石到了昆明。有一天，他到昆明西山游览，恰逢我的部队在西山作国防工事。蒋介石看到我的部队衣服破烂，大为震怒。原来是蒋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之时，参加会议的人都注重穿着，只有我一个人穿的是士兵服，蒋说我有伤国体，已经对我有了成见，及到西山看见我的部队服装又如此破烂，更是大为不满。

他由西山回到昆明，便要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来找我，想对我责备一番。那时，我驻在离昆明三十里的安宁，宋希濂并未派人或以电话通知我，我始终不知此事。当蒋介石一连找我四次，还未找到之时，便向宋希濂查问我的下落，宋当时说，我未在昆明，所以，未找到我。蒋介石因此更加愤怒，立即下令将我撤职改调为七十一军副军长。命令下达后，旋即乘飞机到缅甸腊戍去了。我当时是归宋希濂指挥的，撤职令下达后，他限我在两天之内将移交办清楚。这种期限迫切，是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的事。但我仍然遵照办理。办了移交手续的第三天，蒋介石由腊戍回到昆明，一下飞机便派阮肇昌坐汽车到安宁来找我，要我去见他。我那时正在愤愤不平，认为自己的实力等于一个军，而调我任副军长，实际是明升暗降，且在昆明所有的部队，唯我这师声誉最好。我自己也认为我的部队无论作战或训练，都比一般人强，今天的结果却是被无故调任一个副职，心实不甘。我决心趁蒋介石来找我去见他的机会，和他大闹一顿。并向家人表示，我这一去，或许会不能再回来了。我和阮肇昌到了昆明后，走到蒋介石住所的金碧别墅，打破了平时见蒋必须先行探听和通过侍从室的惯例，一直跑到会客室去。这时蒋介石从楼上下来，态度安详和蔼，对我似乎没有不满的样子，而且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可是他最后还是说：“你这个师长没有作好，希望再多勉励。”我那时气愤已极，忍耐不住，马上辞色俱厉地质问他：“我什么地方没有作好？作战不好，还是技术训练不好？如论作战，则每次战役，我都得到了奖赏，也都是你给的，你并非不知。论校阅则成绩第一，论训练也算不错，就在不久以前，你还亲自打电报嘉奖，说我的部队纪律严明，为入滇部队之冠。何以今日突然变坏了呢？”这时蒋介石竟哑口无言，沉默良久。一会儿他才说：“你的部队的衣服没有穿好。”于是我更生气，便说：“我的部队衣服没有穿好，

不能怪我，只能怪你自己。”这时他也生气，反问为什么要怪他自己呢？我说：“衣服是你发给我们的，质料这样坏，只穿一星期便穿破了。并且去年只发给我们四成新的，六成是旧的。”他当时不相信，连说：“决没有这样的事。”我说：

“此事有帐可查，非我捏造。”他又说：“总之，任何部队没有像你这个部队穿得这样烂的。”我说：“你的眼睛看不见真实情形，我不愿学人家一样来蒙混你，当你未来昆明之前，宋希濂曾打电话给我，叫我把穿烂衣的士兵关在营内，所有到外面服勤的，都要穿好衣服，不要给你看见。我当时力斥他的不对，我认为部队的实际情况，站在黄埔学生的立场，应该使你知悉，不应该欺骗你。所以我没有听他的话。我是有什么穿什么，不去娇柔造作。”蒋介石又说：“我看见过七十军，便是没有穿烂衣服的。”我说：“他们原驻重庆，预备参加秋季大演习，给外国人看的，一切装备都是换过了的。后来，因为云南军事吃紧，没有等到参加演习，便调到昆明来了，所以装备皆新。”他这时无话可说，乃讲些压迫无理的话，总说：“还是你不行！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我便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家里没有钱拿来为士兵制衣服，如果你发了我的贷金还如此，则是我贪污了，我自应负责。你既是发的现品，当然是你发的什么，我们便穿什么。”说到此处，蒋介石又无话可说，便横蛮连说几声：“总是你不行，总是你不行……”我在气极之下，也不顾一切地连说：“我不承认我不行，我不承认我不行……我认为我什么都行……”因为两人意见如此走极端，于是彼此争吵，声闻户外，惊动了许多人。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便变口说我侮辱领袖，当即吩咐他的侍从，叫宪兵来把我押解去重庆惩办。这时宪兵并未到来。蒋见宪兵未到，乃改口说：“你回去，下次再如此，我就要办你。”他以为这样吓唬了我一下，我会自动走的。但我偏

不走，并说：“我如果犯了国家哪一条法令，应该办罪的，便请在这一次办，不要等待下次办。”因此，两人又大吵起来，逼得他第二次叫宪兵。这时宪兵营长到了，蒋介石真的命令宪兵营长，将我押解重庆。我当时愤不可遏的把一副中将领章扯下来向他面前一掷，并说：“这是什么国家的中将，你高兴怎样便怎样？我现在不要这个官了。”说后立即出来，拉着宪兵营长一同上车，要求马上便去重庆，表示我并不畏惧。这时侍从人员与营长等人，都婉词劝我，先到侍从室去休息一下，不必闹了，要走也要吃了饭再走。我在大家劝慰之下，便到侍从室暂时休息吃饭去了。正在此时，龙云来见蒋介石，蒋盛怒未息，面告龙云说我侮辱领袖。龙云当时说：“陈明仁这个人非常实在，并不虚伪，平时穿衣吃饭都是士兵化，他的部队比任何一个到滇的部队都好。”龙又举一些例子说：“陈明仁初次来见我时，也是穿一套破烂衣服，许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勤务兵。当时我问他的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到昆明？他说部队已过去三天了。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呢？他说他的部队是夜间通过昆明的。我问为什么要夜间通过。他说有三个原因：一、部队历年在 frontline 作战，不愿使士兵看到繁华城市，以免影响士气。二、部队服装太坏，怕人民看见会讥笑为叫化子部队。三、白天昆明的道路是汽车走的，晚上通过，不致妨碍交通。根据这些事实来判断，我觉得陈明仁算是很不错的。”龙云这一番话，使蒋介石的气平了一些，对我的印象似乎起了一个变化。龙云走了以后，接着关麟徵去见蒋介石。蒋又一样地说我侮辱领袖，并说黄埔学生中竟有这样的人，那还了得。当时关麟徵也说：“陈明仁除了脾气大以外，一切都在他人之上，今天要培养这样一个将领是不容易的。”蒋介石听了大家都这样赞扬我，也就深以为然，于是问他的侍从看我走了没有？侍从说我还未走，正在吃饭。蒋便说：“吃饭以后，叫他自己回去好了。”我

经大家一劝，也自动收兵回去了。

我和蒋介石闹了这场以后，便不愿再当军人，准备回到老家去。虽然路过昆明的朋友，都来劝告，嘱我一定要到七十一军就副军长职，但我始终未去到差。过了一个星期，蒋介石又到了昆明，我当时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心想蒋介石又来了，应该再去测验他一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因此当他到昆明的那天下午，我便仍不经侍从室传达就去见他。当我到达蒋的住所金碧别墅，还未见到蒋时，恰逢杜聿明、宋希濂等也在等候见蒋。杜、宋两人还劝阻我不要去见，要我先就了七十一军副军长职，等蒋息怒以后再去见他。因为他们怕我万一和蒋再吵，则会更加不可收拾。我当时对于杜、宋的意见，并不怎么重视，倒是担心我今天不经传达，一定不能见到蒋。而结果却出乎意料之外，不但蒋接见我在杜、宋两人之先，而且他的态度，比往常还好些。对于争吵一节，只字未提。同时问我已否就了副军长职？最近看一些什么书？并且多方慰勉。如此，便再将上次的事提一提。我说，上次和你吵闹了一场，我的用心是好的，当然态度言词方面多有失敬的地方，说到此处，蒋便一面摇手，一面连说三句：“那是没有关系的。”这次见面，我认为结果圆满，蒋对我还是不错，于是才又下决心继续替他卖力，去到七十一军就了副军长职务。在七十一军经过两年，大部分时间是完全挂名，到一九四三年才兼了干训团大队长、班主任、副教育长等职，长时间驻在昆明。

四、回龙山三战

一九四三年冬，日寇开始向滇西攻击，渡过怒江，前方非常吃紧。我认为自己平常不管事，打仗时候到了，便应该出来负责，于是离开干训团回到部队去。一九四四年春，我国军队开始反攻。七十一军奉命接受围攻松山、龙陵的任务。在此战

役中，我在七十一军中起了很大作用，几次战争危急，足以影响整个战局，都是我来挽救的。例如：当我军围攻松山、龙陵之时，有一次日寇将腾冲方面部队集中攻打龙陵，以解松山之围。我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作战不力，节节败退，已退到黄草坝了。师长张少勋认为再无办法抵挡，要变更阵地，开放公路。如果这样做，则日寇松山之围可解。松山之围既解，则他们一直可以攻到怒江，打到昆明。我认为这样关系太大，坚决要八十七师一定守住，不准再退。这时，张师长接了我的电话，我不准他退，他着急了。随即打电话给总司令宋希濂，直接报告说，他的部队死伤大，并言及守不住等种种困难。适逢这时，我要打电话给旁的地方，总机告诉我，现在张师长与宋总司令讲话，线路不空。我当即要总机把塞子插上，旁听他俩通话。我清楚地听到张师长的报告，同时又听到宋希濂答复张说：“万一守不住，可以变换阵地，放开公路。”我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方插话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影响整个大局的。今天七十一军归我指挥，师长不能直接报告总司令，而你总司令也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同时，我在电话中严厉警告张师长说：“你违反了我的命令，你只好自己提头来见吧。”张师长在这个时候，知道情势不对，在两小时后便自杀了。自杀后，宋希濂告诉我这个消息，我问：“死了没有？”宋说还没有死，并说已看了他。他自己打了自己的胸膛，还不致于死。”我说：“张企图自杀而不死，是为逃避责任，我一定要枪毙他。”并责怪宋不应该去看他，看了等于鼓励不愿牺牲的人。这事发生以后，我便另派师长将战局挽回。自此，八十七师再没有打过败仗了。经过这事以后，宋希濂和七十一军军长钟彬都被调走，而接宋希濂职务的是黄杰，我则接了钟彬七十一军军长的职务。

我任七十一军军长后，对于作战特别认真，当时，凡是其他部队拿不下的任务，都由七十一军来担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

台山、鬻佐寺、回龙山等，都是七十一军攻克的。而攻克回龙山一役，不但挽回了当时的战局，而且增加了我个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声誉，我自己也公然认为这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由于回龙山被攻下，日军的防线完全崩溃，缅甸方面的战事便结束了，接着便向印度会师。第二天，何应钦和卫立煌等都来到了前线，举行升旗和在印度会师的典礼，宣告战役胜利结束。从此，远征军长官部以及远征军所属总司令部一律撤消，我们新二十八师也取消了。我的七十一军便奉命由芒市空运到云南沾益，再车运到贵阳归第三方面军汤恩伯指挥。当在芒市上飞机时，美国人计划飞机只运人不运武器，说到贵阳装备新的武器，当时我们不肯这样办，认为部队将武器缴掉，则飞机万一遇有任务将怎么应付？因此彼此闹了很久，结果决定只带重武器不带，轻武器还是带了。到贵阳后，部队便来一次大合并，由其他两个军与我的七十一军并成为一个军。为了合并，我与汤恩伯发生摩擦，影响了七十一军到贵阳补充武器的事，终未达到目的，一直影响到以后很长时间内，我的部队补充武器，始终成为一个问题。这时日寇企图西攻重庆，已经进至贵州独山，我七十一军奉命进入广西，收复柳州、桂林等地。由于武器既未补充完全，又要担任攻击任务，我在出发之前表示这个问题实在重大，希能得到妥善解决。当时美国人担保到了柳州，一定补充，因为柳州有飞机场，可以空运来。到攻克柳州，又因飞机缺少，空运发生困难，经过多少次商量，最后决定以一百辆汽车，走公路由贵州运武器到柳州补充，但这时正在涨水，公路桥梁中断，临时发生阻碍，我们为了早日获得武器，便派了许多部队，帮同路局方面抢修桥梁，修得可以通车的时候，忽然日本投降了，情况立即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时陈诚出任军政部长，他发布命令，所有当时的美国装备，通

通由军政部接收统一分配，美国人立刻也就不负责直接把武器交给我们了。

后来，我部奉命由广西柳州徒步开往湖南、汉口，再乘船开往上海。在柳州时，我将美国后勤部所有存余车辆，强迫接收，经过衡阳时，美国联络组回国，我又利用人事关系，将衡阳组的汽车也接收，一共接收了两百辆汽车。不久，陈诚知道了，命令我退还军政部，几次命令，我都没有照办，因此陈诚对我更加不满。

五、四平之战后的思想变化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七十一军经由镇江、昆山开往上海，随即奉命开往东北。本来运兵的船已准备好了，我因没有装备完全，坚决不肯马上走，闹到最后，军政部负责人才说，我们的武器，已运到秦皇岛，应该先开到东北以后，再去装备。我当时信以为真，便答应上船开航，希望一到东北，装备问题便可马上解决，但结果不然，我的部队开到东北以后，到一营被调用一营；到一团被调用一团，弄得分散不成样子。我本人还未到达东北时，八十八师即已调归新六军指挥，八十七师也已损失严重，分解得破碎不堪了。等我到达东北以后，我所属的部队，所能指挥到的，只有九十一师一个师了；可是不久九十一师又被调到热河；八十八师师长则被新六军撤职，由东北长官杜聿明直接另派师长接替。当时，我觉得遭遇尽是使我难堪的，非常苦闷，尤其因为部队被分散了，自己没有力量表现成绩，加上上级长官如熊式辉、杜聿明等，都瞧不起我，使我精神上大受刺激，常常自认为平时战无不胜，部队确实能够打仗，结果都归了人家指挥，因为没有表现本领的机会，我常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想。直到后来奉命解德惠之围一役，我自己才带了两师兵力去作战，由于这一战获胜，各方面对我的观感也才好

转一点。一九四七年五月，怀德紧急，我奉命率部去解围，今已出发，上级临时变更计划，要我增援长春。不料部队行进到怀德至公主岭之间，突被解放军截击，八十八师损失大半，九十一师也有很大的损伤，于是上级把增援长春的计划又改变，令我部退守四平，造成我平生一段罪恶最深的历史。根据当时的情况，四平四面受击，我的兵力单薄，本来万不能守，但我竟下了决心要坚守下去。为什么要坚守呢？我的理由是：（一）蒋介石有命令要死守，我是蒋的学生，关系密切，不能不效忠于他、服从他的命令。（二）根据抗战八年的教训，凡是守不住一个地方的将领，都是被杀了头的，而攻不下一个地方的，却没有人受过处分。我为了保全性命不能不守，而且当时受了一方面的反动宣传的欺骗，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全不知道，只听说，共产党军队是喜欢残杀的，我想与其守不住被共军残杀，不如尽力守住，或者勉强可望获得一线生机。（三）自己当时认为我平生以打胜仗著名，又抱了满脑子的升官企图，到东北后却无表现，仅仅解德惠之围有点成绩，但怀德一役又失败了，希望能够特别出一次风头，然后，才能达到向上爬的升官目的，但徒凭过去的资望是不行的，唯有孤注一掷，再创造新的纪录。而且，我估计当时凡属国民党的部队，守了一个地方，如能坚守下去还比较有把握，如守到中途而要撤退，则绝对会被击溃、被消灭的。这说明坚守一地或有幸存之望，撤走则只是死路一条。因为我有上面所述这些理由，所以我就认为，四平应守，而且能够守住。能够守的把握是我学会了日本人过去守龙陵、松山的办法，这些办法都是我曾经亲身体会过的，当时，我相信用了日本人的方法，一定可以达到坚守的目的。因此，对于兵力的部署和工事的作法，都是另有一套的。而主要是采取置之死地的办法，因为，以前任何部队在坚守阵地上，只要被敌人突破一点，便闻风而逃。而我这次兵力很少，一共不过

两万余人，很可能会被突破，为了万一被突破一点，而不致影响全局，只有依靠坚固的工事，而工事又只有靠而，不靠点和线，有了全面的坚固工事，即令多数点被突破，都是不要紧的。当时，解放军进攻四平的第一天，便突破了我的阵地，但其战术似乎也只是根据国民党军队的传统看法，始终从突破点发展，不去多突破些地方，而不知我们正希望对方这样做，所以，我们能以少数兵力应付一个突破点，虽则以后还有地方被突破，可是，始终只有两个突破点，仍然不曾影响我军的全局。那时，解放军方面炮火很猛，我在八年抗战之中，都不曾遇过这种场面，但炮火的射击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打在突破点上，对于我们危害不大，我军阵地也不曾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一役，我以少数兵力守了四十多天，巷战十九昼夜，为了作工事，随便拆人民的房子，据人民的家俱，乃至用大量的被食作工事材料，一切都是只要能达到坚守的目的，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结果，坚守的目的达到了，博得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刮目相看，认为是一种奇迹，一致吹嘘、赞扬我，因而，国民党破府下令升我为兵团司令官，颁发给我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表示特殊嘉奖，另派陈诚到东北慰劳。陈诚到东北后，把我带到各部队讲话，并将我视为一个所谓生动的教育榜样，要各部队将领都来学我的坚守精神。到达沈阳时，更迫使好几十万人民开会欢迎，成为沈阳空前未有的所谓盛况。可事隔不久，等我去到南京一转的时候，陈诚便请求蒋介石撤我的职，并且要查办。一方面是他报复我的仇隙；另一方面是他妒忌我的所谓“功劳”。当时，蒋介石虽未明确答应他的请求，但暗中还是顺从了陈诚，而把我调任一个国民政府参军的闲职。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所属各部队，都为之破然，士气受了很大的影响，认为我替政府立功这样大，尚且如此下场，以后谁会出为来打仗呢？尤其归我指挥的部队的高级将领，都写信给我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不再在东北

流一滴血，白替蒋介石、陈诚等少数人牺牲了，这点对于促使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有点间接作用的。

我调为参军以后，除了一度被派为西北慰劳团团长，率领一部分军官到达西北，进行对各部队慰劳工作外，始终在南京闲住，过着十分无聊的日子。在西北慰劳的部队，都是蒋介石的最亲信部队，属胡宗南指挥的，我每到一部队，便集合讲话一次，除了讲些代表中央慰劳的话外，主要还宣传我守四平的经历和我个人的下场，这里面的作用是恰恰与鼓励军队士气相反的，因为我守四平的经验和精神，当时一般的将领都认为值得效法；但结果我竟被免职，这又是使一般将领寒心的。由于这个影响，后来胡宗南部队的将领们多少都存在了一点动摇心理；思想上也起了一点转化，这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也多少是有点关系的。

我在南京闲住了好几个月，在淮海战事将起的时候，刘峙和杜聿明都曾来到我家，三次找我出来担任徐州方面的一个兵团司令；同时，胡宗南打电话给蒋介石，也请我当西北方面的兵团司令，并且他一面亲自从西安来电话找我，一面又派人送旅费给我。我当时对于他们这些怂恿，都拒绝了，表面上推诿说要听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我暗中另有自己个人的打算。因为这时白崇禧正在组织华中“剿匪”长官部，也曾找我担任武汉警备司令，我认为如果到徐州或西安去，地位为兵团司令，虽然符合我的欲望，但杜聿明、胡宗南之流，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的所谓蒋的嫡系，他们的作风我都知道，我在他们之下，比较难出风头，不易达到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目的；如果到汉口去，则地位虽不很相当，但蒋、白间素有距离，我大可利用这个隙缝，从事发展，权力比较容易发挥，当我自己决定不去徐州和西安以后，我便把发展的方向对着汉口方面，并且请刘为章、孙国荃两人替我在白崇禧面前活动。活动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把名义更改，地位提高，我知道白崇禧找我出来的意思，还是希望我能以坚守四平的精神来坚守武汉，而我也就针对他们对我的需要，向他提出地位问题，首先由孙国荃向白表明，认为警备司令的地位不相当，要白建议蒋介石恢复武汉警备总司令，只要是发表为总司令，我便去的，白崇禧既是需要我守武汉，恐怕我为了地位名义而不去，也就同意了我的要求，打电话给蒋介石提出地位名义的问题，并且说，以前武汉警备司令是阮齐等一班资望较浅的人，而我的身份与阮齐等不同，应该改为警备总司令才对。蒋介石也为了我到白崇禧处担任警备工作，可以钳制白崇禧并与之接近，对己有利，于是蒋接受了白的建议，下手令委我为武汉警备总司令。但手令到侍从室经国防部正式报请发表时，侍从室方面认为白崇禧既是“剿匪”总司令，不能在他下面再有一个总司令，认为这个名称不妥，何应钦对于这个意见也表示同意。我在那时认为这与我身份不相当，便不肯干。何应钦说：“你去当剿匪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好了，我认为这倒是一个转圈的办法，初步答应下来，但还要求兼一个兵团司令，以便确守武汉。何应钦原则上同意了，但说马上成立一个兵团不妥，先给我成立一个军，暂兼军长，以后随时继续扩充。我认为既有了副总司令的头衔，又有警备司令和军长的实职，成立兵团也经何应钦答应，这一方面可以满足我个人英雄主义的欲望，另一方面自己掌握了一点力量，也可以拿作将来自救的资本。因此，在南京我便决心不到杜聿明、胡宗南那里去，而愿在白崇禧下面另开一条独树一帜的道路，企图有所发展。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便到汉口就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和二十九军军长。没有多久，政府又于二十九军之外，恢复七十一军，加起来成立了一个第一兵团，发表我为第一兵团司令官。这时，我身兼四职，有权有势，真是可以为所欲为

了,但是我那时候,对于武汉警备司令的职务,并不怎样重视,仍是集中精力对付军队方面,企图先把部队数量充实,好好训练,将来可以在混乱的局面中,举足轻重,操纵自如。当时,兵团虽然成立,但只有两个军的实力,应该起码有五个军,才够兵团的条件,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回湖南打主意。因为当时中央决定在湖南编练三个军,我料想,如果我回湖南,则这三个军自然会归我指挥。因此,我自南京到汉口以后,天天存了回湘的念头,并没有久留汉口的打算。同时,那时思想上又存在两大矛盾:一方面是要应付中央的任务,警备武汉;一方面又幻想参加和平运动,希望自己能在和平中找到一条自救的出路。

由于我在南京便萌生了一种厌战、企望和平的心理,到汉口后,白崇禧又利用和平作幌子,暗中进行倒蒋运动;而当时北京、南京间的和谈也在发展,我在汉口那段时期,思想上便慢慢有些动摇,倾向和平的心理日渐滋长。对于当时警备的任务,我便是消极应付了。例如:(一)在汉口,因为能够掌握一部分特务方面的人事关系,我曾经尽可能减少对于革命分子的危害。有一次,武汉地方特务分子,曾佩挂警备司令部证章,未奉命令,擅自拘捕了武汉大学学生数人,我得悉后,立即打电话嘱告鲍志鸿参谋长,不要押送警备司令部,另一方面通知武大周鲠生校长,赶急保释回去了事。(二)与白崇禧联名致电蒋介石主张和平,希望真正使和平实现,同时建议白崇禧释放了一大批关在牢狱中很久的政治犯。(三)拒绝接受武汉防守责任,摆脱了武汉防守司令的职务,积极设法把部队向湖南移动等。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与我当时的自救思想有关系的。但是,当时的所谓自救,纯粹是一种个人利益的打算,并无政治理想,与人民利益更是毫无关系,就是到了我已经将部队移驻湖南的初期,也还是在打湖南兵源的主意。以为黄杰等

正在湖南训练新兵，可以设法补充一点兵力，作为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并没有预备在湖南起义的企图。及到湖南以后，由于湖南和平运动空气浓厚，程潜主任又暗中给我以不断的启发，我便渐渐有了较为具体的觉悟，倾向和平的心理一天天增长，不过只是单纯凭自己主观的直觉，认为战争已不能再有了，希望追随程潜主任努力把国家弄好，虽然当时对共产党没有认识，单独投降，心中还很畏怯，但我认为只要能够救人民、救湖南而牺牲小我以成全大局，我是愿意的。我下了决心之后，便向程潜主任保证不再变更，我个人内心也从来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和退步的想法。因为那时程潜主任乃是所谓湖南人的家长，又是我的老师，我要对他负责到底，不能欺他、卖他，况且慢慢从各方面或多或少听到一些关于共产党作风的消息，我弟弟明信从东北被俘释放回来，也证实了共产党的种种好处，这使我逐渐提高了、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恐惧的心理也减少了。我自汉口到湖南，首先是只任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不久又兼一个省府委员，当时我处在程潜主任和白崇禧两人之间，表面上受白的指挥节制，暗中靠近程潜主任，总是以他的意志为意志，对于和平运动曾经尽可能设法掩护，不使之受到摧残；对于白崇禧的战争企图，则尽可能暗中阻止或破坏。例如：白崇禧主张要在长沙建筑防御工事，我便多次婉词推诿，说是根据我自抗战以来的经验，各地历次所作的工事，都未起过作用，等于一种浪费，尤其我认为不能很早地事先作好，而要到了应用的时候，按照兵力配合的地形来作，则比较运用灵活，如果作多了而无兵力运用，更是徒劳。对于这些意见，居然白也采纳了。另一方面，我还对原来街道居民自动建的一些所谓应变工事，也藉口妨碍交通和作战部署，一律命令强迫拆除，这样便逐渐打消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威胁。过后不久，我又和程星龄、唐星、温汰沫等开了一个秘密

座谈会，虽然当时我的真实动向没有表示，但站在湖南人反桂系的立场，我们曾共同主张，改组长沙警备司令部，建议程潜主任将原司令刘进调为第一兵团副司令，而以萧作霖继任警备司令。因为如此，对于掩护和平是有帮助的，但是在四月二十一日，南京、北京间和谈破裂后，蒋、白仍然挟着中央的命令，宣布要继续作战下去。程潜主任事先未和我秘密商量，便于当日下午在省府大楼，召集了许多军政方面高级干部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湖南应取的态度，认为湖南可以单独主和，而忘记了白崇禧的力量还在武汉，我们主观条件尚没有成熟。我当时鉴于时机还早，认为妄动反易失败，尤其看到许多特务分子如潘佑强、刘应古、杨继荣等和反动分子如刘嘉树等也都在场，根本不宜谈到这个问题，于是我以伪装面目出来表示反对单独主和。我说：“我们要服从政府，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的领导之下作战到底，不能再有其它企图。”他们原以为我是湖南的实力派，希望我能同情，见我这样说，于是大家失望，会议也就不欢而散了。后来，萧作霖等竟又想在五一劳动节，发动十万人大游行，显示和平力量，企图单凭一股空洞的热情，吓走桂系。我仍认为时机未到，将会弄巧成拙，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恰逢白崇禧要我把长沙警备司令部接过来，我因为正要藉此来掩护，以利于今后的布置，也就很迅速地就了职。就职后为了坚定白对于我不生疑心，为了伪装主战到底，乃在接事后严格宣布，取缔一切和平运动的活动，乃至白崇禧对于长沙已经表示放心了，然后，和平活动才又慢慢地高涨，以致促成我的起义，达到长沙和平解放的目的。

当时，程潜主任的主张和平，白崇禧大概是知道的，但都不知道我的内心怎样，总认为我是可靠的。我窥知了白对程的不放心，而对我很相信，为了既要暗中维护程的安全，又要坚

定白对我的信任，于是建议程主任离开长沙，把省政交我代理，虽然当时有许多人不明内情，认为我是在逼宫，但我坚持主张，定要如此这般。后来决定这样做了，就在七月二十二日那天上午，程主任乘汽车往邵阳去了，白崇禧等程主任走了才放心在当天下午乘飞机去了衡阳。他认为程既离长，我便从此没有顾忌，可以放手主战到底，专心致志于作坚守长沙的打算了。不到几天，白崇禧为了拉拢我，鼓励我，又建议广州国民党政府将我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接着又发表了一个所谓湖南省绥靖总司令的名义。我兼代省政府主席后，形势日渐紧张，白崇禧主张实行所谓空室清野，希望长沙市民迁避别处，以便作战到底。当时，市民也有准备转移或正在转移的，我为了安定人心，立即向长沙人民发表了一篇谈话，在不露痕迹之中，表示了我不在长沙城作战，决不使长沙闻到枪声，要市民镇静下来，不要惊惶，不要转移。我这篇谈话发表以后，除了白崇禧当局者迷，没有警觉，仍然对我深信不疑以外，其余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领会我的真意，多少知道我是不会在长沙作战的。从此，长沙市民也就没有转移的现象了，大家都暗中满怀信心地等待和平之来到。这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先后拘捕的一些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分子，都经过华中长官公署判了死刑的，他们要我执行，我都以等到紧急的时候再来处理为托词，尽量地拖延而没有执行。白崇禧要我破坏交通和江面的船只，我也表面接受而暗中嘱咐下面，一律不准乱动，尽力加以保护，结果都达到了完整保全的目的。只有下面这些事，是没有做得圆满的。

一、宪兵团团长姜和瀛曾经掩护一批地下工作人员，参加宪兵团酝酿和平，营附某（即第二营营附赵冠湘，见姜和瀛《宪兵十团起义始末》，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编者注）去向白崇禧处告密，说姜团长组织非法团体，企图伙同宪兵叛

变，并将各种证据交白。当时白勃然大怒，立即命令我缴宪兵团的械，并将姜团长及有关人员扣押起来。我对于姜等的行动，本是知道的，不能不设法救全，于是竭力说明这是营附某捏造事实，挟嫌诬告。结果，把白崇禧缴械、拘人的命令撤销了，而将罪过推给营附某身上。白认为营附诬告，那还得了，于是反过来要我枪决营附。我主张送给宪兵司令部处理，后来，接到宪兵司令部来电，仍然是要我就地枪决。但这时我想到事实，犯了温情，不忍下手，终于把他放走了，这种对反革命分子的宽恕，在今天是值得检讨的。

二、湖南省卫生处寄存了一批价值很高的药品在湘雅医院，卫生处长龙伯坚事先未将此事报告省政府和向警备司令部备案。经人告发，认为他私藏公物，企图贪污，于是派人强迫封存，继而因为部队也正缺乏药品，提取一部份分发部队，又提取一部份发给各县卫生院，虽然没有从中贪污，但我这时事忙，没有细心详加考察，偏听了警备司令部主任陈天喜一面之词，任他们乱加处理，使整批药品遭到分散，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而分散之中，不免还有零星的损失，同时，后来听说，陈天喜对于龙伯坚还有粗暴的态度，引起当时舆论的不满，这充分说明了我当时对人民财产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今日应检讨的。

不到几天，广州方而又派黄杰、邓文仪两人飞到长沙，带来蒋介石、李宗仁等的信，鼓励我坚守长沙。蒋介石的信还要我坚决死守，万一守不住，然后再退往湘西。他说他会积极给我不断支援的，他还要我杀尽长沙方面的民主人士，肃清和平势力，更要我大义灭亲即对程潜主任加以危害，我表面上都接受了。及到八月四日，人民要求和平的空气空前高涨，时机相当成熟，我便下决心通电宣布起义，促成长沙和平解放成功。在我人生的历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最光荣的一页，从此，自己也

获得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我的经历很多，而且复杂，以上只是我生平几个主要部份，其余不可能琐碎地全部叙述出来，就是这些主要经历，也因为年数太久，其中不免有些遗忘，不能详尽的。例如：人名、地名、时间、数字等，都很难得完全正确，但事实内容是真实坦白的。

我 的 一 生

方 鼎 英*

一、童年景况

一八八八年（戊子），一岁。二月二十六日生。

一八九一年（辛卯），四岁。发蒙读书。冬丧父。

一八九二年（壬辰），五岁。读家塾，习四书五经、学八股小题至十岁。因家道艰难，立志奋发图强，不敢懈怠。

一八九七年（丁酉），十岁。进白溪市大成书院。学策论，看史地，上县府出考幼童。

一八九九年（己亥）年，十二岁。至省进明德学堂乙班，习普通学科，看到新化陈天华著《猛回头》小册子，痛言清政府腐败无能，祸国殃民，瓜分亡国，迫在眉睫，便想学陆军带兵革命，挽救国家危亡。适湖北武普通（即武备学堂）招生，因报名投考，头场被取；第二场复试，未等发榜，回家过年。

一九〇〇（庚子）年，十三岁。正月十五元宵，深夜得信，复试被录。定十八日上午验貌，只两昼夜矣，因连夜兼程赶走五百里，如时到场应验。不料是虚报十八岁（考试限制要上十八岁才许报名投考），身高不够一根枪杆高，被屈。复于是年三月，考入新办的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高工，读一学期，即获免费。以后读书皆是公费，不要家庭负担了。

二、考送日本留学实业

一九〇二（壬寅）年春，十五岁。湖南巡抚赵尔巽，飭由

*方鼎英（1868—1976）系湖南新化人，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代理校长等职。解放后任湖南省参事室主任、司法厅长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各校选送一批学生五十名，赴日本留学实业。吾由实业学堂选送考试，被取，申送日本东京。初入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兼补习普通学科。不久迁神田区新化同乡会事务所与创办《民报》时担任编辑的陈天华同住，即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

一九〇四（甲辰）年，十七岁。留学生陈天华，见日本《朝日新闻》社论：“清国留学生良莠不齐，应请政府加以取缔”的文章，因而愤极，写了两昼夜的绝命书数万字，以警告我国留日学生，蹈东海（品川）而死。激起“取缔”风潮，留学生全体愤而归国。后来日本政府出面调停，开放学陆军的名额（原限定只能由北京练兵处，即后来的陆军部保送），各省督抚亦可协商保送，因得改学陆军。

不料到振武学校检查体格又因眼病（害沙眼）就医，推迟了一年，始得进去。

三、改学陆军

一九〇五（乙巳）年，十八岁。入振武学校（学军事的预备学校）合格。但体力不强，器械体操，见而生畏，因发奋锻炼，每天熄灯后起床，潜往树林中操一小时，用二十磅至一百磅的铁哑铃一对，锻炼举起。然后冷浴搓身，不到半年便体强力壮，对任何器械体操，无不运转如意。

一九〇八（戊申）年，二十一岁。振武学校毕业。在国府台野战炮兵第十六联队入伍，当士官候补生。

一九〇九（己酉）年，二十二岁。离开联队，进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肄业。

一九一〇（庚戌）年，二十三岁。参加同盟会的小组“求知社”。当时许多人主张回国后靠搞兵变进行革命，入社的同志军、政界的都有，而以军人为主，军人如蔡锷、唐继尧皆是，政治家如宋教仁、张耀曾等皆是。

四、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辛亥)年春,二十四岁。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计留日九年)。初任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入伍生总队(因当时北洋军队有打军棍习惯,恐学生受不了,故特设此队集中入伍,后便为陆军预备学校)炮队教官。

是年秋武昌起义,南下参加汉阳之役的炮兵司令部(曾继梧任司令,曾系求知社同志)的工作。

一九一二(壬子)年,二十五岁。任湖南岳阳镇守府司令部参谋处长兼教练科长。不久,驻军袁润庵(日本士官第五期同学)旅所辖团、营、连、排长,都系曾继梧任湖南混成协主任参谋时招训的一批湖南陆军速成学生分发来协见习的,由曾亲自主管考勤,要求很严,引起他们的不满。曾继梧鉴于岳阳为湖南门户,为预防北兵入侵,恐兵力不够,曾呈请省政府批准添招新兵两个补充团,藉教练科的教练员(有广西干部学生百余人)来训练成军,以固北防。袁润庵受部下怂恿,伙同捏造谣言,说曾不相信该旅,特地招来补充团,准备撤换他们,竟带兵将司令部围住,抢劫一空,逼迫曾继梧下令解散补充团,遭到曾的怒斥。吾代曾晋省,控诉该旅造谣惑众,犯上作乱。主张严加惩办,藉申纲纪。……后因无结果,愤而辞职,到陆军部去当个小科员。

五、在陆军部做伏案工作

吾到陆军部后,在学习炮兵科当个一等科员(中校阶级)。

一九一四(甲寅)年,二十七岁。痛遭母丧。入部不久,常搞编辑陆军炮兵操典射击教范及军士、兵卒教科书籍,用部令颁行全国等伏案工作。初以为首都大部,不合理的事总会少些,谁知北洋军阀,自袁世凯以下,更是一群豺狼当道,无法无天。袁世凯公然欲做皇帝,洪宪筹安会,日益猖獗起来。其时,求知社同志蔡锷(反正时云南首义都督),由袁羁绊在

京，任经界局长已久，密谋倒袁护国，特遣士官五期同学石陶钧，赴美与黄兴密商，其联系信件，由吾亲手转蔡。这时蔡在北京，特地肆意冶游八大胡同，并在家与妻吵闹不休，以表示意气消沉，绝无大志。久之俟袁防他稍懈，乘间潜返云南，发动护国军进攻川贵讨袁，迫使川督陈宦（陈离京入川时，曾向袁行三跪九叩首大礼，三呼袁大皇帝万岁）亦通电响应。袁被活活气死。洪宪祸国，始告结束。

六、再度赴日留学

一九一七（丁巳）年，三十岁。吾厌伏案工作，枯燥无生趣，乘北京派员赴日留学陆军专门（陆大交涉尚未办好）之议，携眷带薪，再度赴日留学，计入东京陆军炮工学校普通、高等两科各一年，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一年，东京帝大造兵科研究一年，一共四年。

七、回湘援鄂

一九二一（辛酉）年春，三十四岁。湘督赵恒惕（求知社同志）等人，联名电邀吾回湘，任湖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这时赵在湖南筹办自治，就是想独立自主，搞得轰轰烈烈，使鄂人亦感到北洋军阀王占元，盘据湖北多年，贪污搜刮，搞得民穷财尽，不胜亡省之痛，纷纷向湖南请求出兵援助邻省自治。赵于是倡言联省自治，而有出师援鄂之役。吾任援鄂总指挥部参谋长，在赵李桥、羊楼洞，击溃王占元主力部队孙传芳部。不料洛阳吴佩孚乘王占元向他求援之机，派其师长肖耀南（鄂人），率部轻易将王占元赶走，攫取湖北地盘，并假言调解，亲率靳云鹗、寇英杰等部，阻击援鄂军于汀泗桥，背水为阵，以示必胜。经过十一天的苦战，已将其全部击溃，退过咸宁去矣。因援鄂军当时正围缴北军未曾退出的五个团于汀泗桥的左翼，未及乘胜

追击，致使北军获得整顿机会，复于次日拂晓，被其救援部队猛攻，终致全线动摇而失败。吴佩孚于全线溃败之余，正扫兴过河，登车大叹“完了”，“完了”，欲返洛阳，一闻前线转败为胜之讯，复乘兵舰，疾驶岳阳，炮轰援鄂军退路，迫使赵笠城下之盟，投降了吴佩孚。吾再三劝赵，表面上可向吴虚与委蛇，骨子里还应站在革命立场，向广东看齐。但赵受到政学系的包围，有“再不要听荒（方）唐鬼（指我）、送（宋）它子军师（指宋鹤庚）的话了”之语。对吾建议口诺而心违，甘心背叛革命。从此便死心踏地地为北洋军阀吴佩孚做走狗，并勾结陈炯明和北洋军阀方本仁等，专搞破坏广东革命的勾当，而忌视湖南革命同志矣。

一九二二（壬戌）年，三十五岁。吾由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派赴日本看秋操，归途过沪，晤谭延闿，告以赵已坚决降吴，不可救药，非由广东来根本解决不可。劝谭随孙中山革命，到湖南发动倒赵，声讨其背叛革命，投降北洋军阀之罪。待湖南各军反赵拥谭酝酿成熟时，请孙中山下令讨贼，便可回湘，号召反赵各军，实现湖南的革命。适孙此时正在沪上，谭便竭诚投孙，即相随入粤，另由陈嘉会、刘步青诸人奔走联系，在湖南各军酝酿反赵。

八、参加讨赵

一九二三（癸亥）年，三十六岁。湘西蔡锷部，因烟土过路问题，公开反赵，赵遂翻脸出兵讨蔡。谭乃奉孙大元帅令入湘讨贼。委宋鹤庚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鲁涤平为讨贼军第二军军长，吴剑学为讨贼军第四军军长，蔡锷为讨贼军第五军军长，谢国光为讨贼军第三军军长，直趋衡阳，通电讨伐赵恒惕。于是谢国光、吴剑学诸部与赵恒惕的死党叶开鑫部，交战于衡阳湘潭之间。这时，第一军军长宋鹤庚在湘乡原籍，观望不表示态度；第二军军长鲁涤平亦不明白表态。宋、鲁内心，皆因

部队不能完全掌握，只好如是以藏拙也。吾见势成僵局，乃以“拥赵、拥谭、自干、滚蛋”八字，即四个建议，派军法官胡耀湘，持赴湘乡，请宋任择其一，表示决心，以便实施，否则，吾将先行，恕不奉陪也。宋乃请吾面谈。相见之下，笑谓余曰：“吾将决心滚蛋，赴沪休养。”遂以讨贼第一军军长任命状印信交余代行。并写信数封，招呼其所能掌握的部队负责人，要他们服从我的指挥调度，就相与分道扬镳而别。吾乃直赴衡阳，密嘱家属，即奔汉口暂避。但不久后，我的家被赵的亲信蒋锄欧带兵抢劫一空。

九、“九一”政变

吾南走衡阳晤谭，询及战况，知已成相持之局。适来衡途中，见到叶开鑫部朱耀华团（叶部有三个团，其中两团已上火线。朱是张辉瓒的内侄）正开赴前线，吾问张辉瓒曰：“你对朱能掌握否？”张曰：“这伢子，平素对余，倒是无话不听的。不过叶对他很厚，他是否有所顾虑，则非敢断言也。”吾因嘱张曰：“你马上派一亲信驰告朱，要他将部队就地停止，在炭团子附近宿营，他自己即来龟头市与我碰头。”吾乃与张先行驰赴龟头市相候。及与朱见面，吾劝朱马上率部回头开往省城，将赵恒惕逮捕，解送衡阳。朱坚持不肯。余一再晓以大义，乃允将部队开赴省城，把赵吓走，是可以的。只好如此再说。遂于九月一日同朱进城，向天鸣枪，赵果被吓走，不知去向。这就是所谓“九一政变”的实况。

吾一面召集宋所能使唤的部队，一面探索赵的行踪。第三天，确知赵已逃往醴陵车站。乃要朱派轻装部队一连，驰往捕赵解衡，朱又不肯，方感自己无兵的痛苦。这样在省主持了省政十三天，终以孤掌难鸣，无所作为。赵此时已请得吴佩孚的援兵，开到岳阳，又将一、二两师各旅扩编成师，齐集岳阳。随

即向长沙攻击前进。

十、讨赵之战

赵卷土重来，其势甚大。吾只好弃城过河，在岳麓山一带，将吾所召集诸部及朱团，与赵部隔河相战，继而有株洲、昭陵、淦田、朱亭等地之战。吾于淦口过河时，遭到唐生智的袭击，几濒于危。长沙好友邹序彬，闻之此讯，以为吾已死，竟望河而祭。内战时期敌我之分，原来就是如是，足见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也。这样苦战了三十三天，最后到了朱亭之战，鲁涤平亦因唐生智杀了他的妹夫，赵恒惕毫不帮他讲句公道话，遂愤而反赵，亦参加了朱亭之役。忽因陈炯明兵围广州，谭延闿奉孙中山电令，即率所部，驰解广州之围，遂中止战斗，全部南撤入粤。这支战得精疲力竭之师，甫抵北江，饷糈械弹，衣物费用都缺，急待补充；而江西方本仁军在陈炯明犯广州的同时，已南侵北江，将驻防滇军压过南雄、始兴，到了周田，只差一日路程，便欲夺取韶关矣。时已深秋，亦只好忍饥挨冻，顶住赣军，计分两路。鲁、谢、吴以其二、三、四军主力，沿始南大道堵击；吾则以第一军各部，由始南大道右侧，翻山越岭，向始兴河中流地段急进，以威胁新军的左翼。但因地方偏僻，人民乍见兵来，皆被吓得坚壁清野，躲入碉堡，使我军求食为难，吾曾每天尽吃红薯。几经困苦，经过了十一天的战斗，终由我派狙击部队，于第十一天的拂晓，突击始兴城东侧高地，俯射县城，并威胁始兴、南雄大道的道路，才把战况扭转过来，逼得敌人狼狈逃退。遂一直追过大庾岭，将战事告一段落，并收降了赣军劲旅第九旅高凤桂部，报请谭延闿转请孙中山电令改编为赣军第一师，即以高凤桂为师长；并要余带高晋见。孙对我当面嘉奖，并赠手提机关枪八挺。陈炯明围广州之军洪兆麟部，皆系湘人，闻谭延闿带了卫队营入广州，以为

湘军大部队已到，便齐声喊道：“我们湖南人不打湖南人。”随即自动撤围东去。这次战事就告结束。我在广东的湘军中，代理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之职。

十一、东 征

一九二四(甲子)年，三十七岁。是年春，湘军休整未遑，孙中山令以湘军为主力，配合滇粤各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乃有河源、新丰之役。滇粤军之辅攻惠阳者，至博罗便停止不进，以致湘军突进新丰，又逢炎暑季节，新丰河流域，瘟疫流行，湘军又因南来不久，水土未惯，病死过半，遂致无功而还。

十二、北 伐

是年十月，西北军冯玉祥等组成国民军，举行“首都革命”，赶走曹錕、吴佩孚。冯等倡议孙、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共商国事于北京。孙命谭延闿为北伐军代总司令，率领湘、滇、粤、陕、闽、豫各军，由江西北进。吾适病发不起，所部军队，由宋鹤庚(这时宋已来粤，其内心对革命恐怕不是那么坚定的)兼领入赣。不料宋、鲁大闹意见。谭连叹：“伯雄(方鼎英号)在此，决不致此。”所谓将帅不和，指挥便乱，竟中方本仁诱敌深入之计。我部伙食担子走在前头，无准备、无目的地一直跟敌踪到达吉安，忽遇方本仁来了个猛虎洗脸式的反击，便若山崩瓦解、狼狈不堪地垮了下来，益发不可收拾矣。迨湘军跨过赣州，吾病稍愈，闻讯赶上，到南康遇谭，见面之下，便紧握吾手，叹问：“如何是好？有何面目见人！这样垮下去，所剩残兵败将，将何辞再向广东要钱呢？”我们一路同行，至大庾岭古庵观梅，谭再次追问怎么办才好，吾乃谓谭曰：“办法好歹总会有的，所怕的是您不能实行。”盖谭是有名的八面玲珑，不能不这样先打个招呼也。谭慨然曰：“我绝对负责实行，请拿出办法来吧！”吾乃要他下

令所有官兵，都到南雄某中学待命，建议“整理”之策。吾于当晚将“湘军整理处”条例及编制表拟好，主要是一兵一枪地进行点验，以团为单位组编，有几团编几团。整理处设总监一人，谭自任之；副总监若干人，各军长任之；副监若干人，各师长任之。另设讲武堂一所，轮训官长。次日开大会提出讨论，一致通过实行。马上开始点验，编成七个团带一个营，军容整奩，焕然一新。

十三、任北伐军特遣总指挥

是年冬，“湘军整理处”成立后，吾任副监。时病体尚未复元。而所部第一师，约有枪五千余，人上万数，由宋鹤庚率领。宋受赵恒惕勾引，带往湘粤边区的汝城县停止不进，迭派代表来要我前往领导。吾明知其不肯回粤，谭亦极不愿我离开，但感于公谊私情，不能不一往，伺机另谋出路，以尽友道。适在大本营参谋长方声涛处，看见国民二军司令岳维峻，自河南发来约谭再度出师北伐，会师武汉，共同解决北洋军阀余孽肖耀南之电。因问方曰：“此电回复了吗？”方曰：“你们湘军是主力军，此役搞得这样费不成军，还能会师武汉吗？”吾因汝城部队企图再度北伐，便建议说：“吾有计划，稍缓一个时期，当可实现此举。但须先请大本营给我以‘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的明令。吾将率汝城之师北伐。并希大本营参谋长亲缄赵恒惕，请其许我假道赴湘西。吾保证不出三个月，会同盘据该地的熊克武（熊号称五万之众）、蔡鉅猷两部东下与岳会师武汉。这样答复可否？”方欣然照办。吾就率随身的卫队营驰赴汝城，宣布此策，博得全军欢声雷动。因遣专人持方城，驰省要宋鹤庚（宋已做赵的座上客）面赵交涉。说明假道如得成功，赵可收回湘西数十县的地盘，是乐为的。但赵的回电，只是满纸欢迎我晋省欢叙，不及其他。知有变化，就向地

方筹办一个月给养，电赵请准以田赋作抵，自选湘粤桂边区由宜章—临武—蓝山—宁远—东安—新宁—洞口—安江—辰溪—沅陵之线，用战斗行军前进。不料朱培德部王均，以北伐时在谭延闿指挥之下担任先锋，已超越吉安，谭忽溃退，并未通知他，故受极大损失，因而极恨湘军，乘我部通过他防地乐昌至九峰时，竟迁恨及我，而尾跟我部，放冷枪捣乱。迨我先头越过九峰，遇到唐生智部何键堵住去路时，使我进退维谷，只好爬到湘边高山之巅的一处平地集中，交给旅长汪磊领导，暂往长沙，牺牲一切，为部队收编向湘赵交涉，并嘱大家好好团结，不要乱动。自带徒手卫队一排，向衡阳唐生智的师部前进。不久，部队便被何键编散。吾晤唐生智，承其特别礼待，派专轮送我晋省，并赠光洋三千元。

十四、老友曾继梧保护吾脱险赴汉

吾抵省后，即往油铺街成劲吾家，吾友曾继梧，已闻信先在相候。见面之下，慨然谓我曰：“你既冒险来省，赵恒惕想公开杀你，是不敢的，但要防他暗害。吾今拚了这条老命，来保护你安然脱险就是。现在已五点钟，我们对好了手表，吃过晚饭，你就去省府会赵，到七点钟准定要回。如过时不回，我亲来省府接你。”吾于是与曾这样约好而去。至省府时在座的，赵以外，有宋鹤庚、唐义彬、邹序彬三人。相见后，赵即开口曰：“我们湖南的士官同学，人虽不多，可是想为桑梓做点事的心志是都有的。自你第二次留日，我们在湖南的十几个人联名打电报给你，请你回来，想大家同心同德为地方尽点心力。不料适得其反。对以往的事暂且不去谈，即如这回你带队伍到了汝城，我们连电欢迎你回长沙来叙谈，又不料你文不对题地答非所问；最后唐生智来电报告，说你有异动，你一意孤行到这种地步，我就只好回电围剿了。”赵言至此，便闭声不

响。吾才接腔曰：“你还有话要讲吗？我是不是也可以讲几句呢？”于是宋、唐、邹齐声说：“可以，可以。我们今晚是同学谈心，大家随便谈，请即畅所欲言吧！”吾乃开腔曰：“我们以往对桑梓所作所为，如你所说，暂且不谈，是功是过，听后人评论去。但言这回我到汝城的事，早有大本营参谋长方声涛托宋转交你的信，说得很明白，但求你假道，给我率部赴湘西去，保证不出三个月，即协同熊克武、蔡鉅猷诸部东下，与国民二军岳维峻会师武汉，将湘西数十县的防地交还给你，难道这也是我的一意孤行，值得你一剿吗？”吾言至此，宋鹤庚才从袖口里，双手抖颤，将信捧出曰：“唉呀！信还在我这里，忘记没有交啊！”吾才又曰：“既是这样，那末，就请看看这封信吧！”吾看手表，已快七点，乃起身曰：“曾风老已与吾约好七点钟准定要回去。若到时不回，他就亲来省府接我。今七点快到了，我即请告辞。”并说吾尚有病没好，打算日内即回汉口家中休养，恕不再来辞行。我就这样起身，向外边走。他们虽无挽留，但吾已边讲边行矣。及到家中，刚好七点钟，曾便要陪我马上搭汽车赴湘潭，谓有一日轮已去湘潭，我们到湘潭购票上船，免人注意。迄抵湘潭，该轮因水浅中途折回长沙。于是又返长沙直趋轮船码头，购票上轮。风老犹不肯回，必待轮船开走，他才回家。于是他站在趸船上，我在大餐间前台，两人又相对谈了一个时候，直至轮船开动，曾才谆谆致意保重而别。此老侠义，不减少年，吾每回忆及此，不禁热泪盈眶矣。

十五、再度入粤

一九二五（乙丑）年春，三十八岁。吾在汉口家中养病。谭延闿来电催回粤。一直延到夏天，吾由国民军二军岳维峻的参谋长刘化南（求知社同志）约往河南参观巩县兵工厂。复见

报载奉军委登选（求知社同志）督皖，杨宇霆（士官同期同学）督苏。于是又到蚌埠晤姜，到南京晤杨，察知北方力量虽厚，但皆军阀习气深，感到要革命，还是南走粤的好。这时孙中山、廖仲恺皆已西逝。吾于是年中秋前始返广州。见谭问曰：“承您一再电催返粤，不知有何驱使？”谭曰：“系蒋介石相催，要你去帮办黄埔教育。此事本来总理在日已派廖仲恺前来接洽过，因那时你在湘军带有部队，不能抽身，遂未相告。今见你已在汉口休养，故尔迭电相催。”云云。吾乃问：

“黄埔校长是蒋，教育长是邓演达，欲我去执粉笔耶？吾乃有病之躯，如欲我再为冯妇，实在是敬谢不敏。”谭曰：“本来当初廖来找你时，邓尚未来。后来见你暂难去就，汪精卫才介绍邓去。但蒋既找你甚殷，想必是另有妥当安置的。”吾乃曰：“既是这样，且看看吧！”吾正与谭谈话之间，蒋介石来晤谭。一见我在座，便欣然曰：“好呀！你来了。祖庵先生想已详细告知你了吧？我想明天就派王茂如（王柏龄号）来，接你去黄埔好吗？”我说：“好吧。待我稍事休息一下好吗？”蒋曰：“这好办。我叫茂如来，和你商量好了。”第二天，王柏龄果来，吾仍以稍事休息一下为辞，既未拒绝，也未即行。这样又拖了一个时期。适召开各军统一军事教育会议，当时广东的一、二、三、四、五、六军，皆有军事学校，湘军办的讲武堂，吾以湘军整理处副监名义，在那里帮忙，因此参与这个会议。

十六、组织黄埔军校入伍生部

一九二五（乙丑）年冬，广东召开统一军事教育会议，蒋以陆军总监身份，主持这个会议。会议结束时，蒋命邵力子以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的任命状给我，言明归校长直接领导。盖当时教育长邓演达只是少将级，而吾在湘军

已任过代军长兼师长，并曾任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已是中將以上的级别了。前此谭延闿之所谓蒋会另有安置者，大概就是指此说的。吾于是重新组织新生入伍生部，副部长都定少將级。这时，第三期尚未毕业，第四期入伍生已成立两个团。后来，第五、六、七各期，每期都是四千余人，到第七期止，黄埔军校遂结束了。

十七、代行校长职务

一九二六（丙寅）年，三十九岁。当时黄埔本校，派系斗争激烈，主要有孙文主义学会（右）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左）两派。廖仲恺在世时，以党代表身份，遇到出了问题，即往讲一次话，都能顺利解决。廖死之后，便无人能起此作用。蒋介石身为校长，并无威信。盖孙文主义学会，骨子里就是蒋支持的。后虽由蒋勒令双方解散，但暗里斗争依然如故。是年北伐，蒋要我代教育长并以学校全权交我代行。又新派李济深为副校长。吾即拟定副校长的职权两条送阅。蒋以红铅笔圈掉，说：“我只给他挂一空衔，于你办事有益。若付以实权，则你将一事也办不通了。”但吾不肯接受校长职权，要求回第二军，参加北伐，到前方作战去。蒋谓：“本党命脉在黄埔。今以党的命脉交给你，责任何等重大，而你却欲回二军去带兵北伐！只要你把学校办好，将来还怕没兵带吗？”吾以实感派系斗争无法解决对，蒋复谓我曰：“这是一个党政问题。吾将党的问题拜托中央党部主席张静江先生；政的问题，吾将拜托行政院长谭祖庵先生。你遇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发生时，可去找张、谭二位代为解决。你只负带好学生的责任好了。”吾才说：“那末，吾对学员，就不能带有色眼镜看人，就是说，不论他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我都一视同仁。凡是好的，都要嘉奖；凡是不好的，都要惩罚。必须这样，才是公道，你同意

吗？”蒋曰：“当然同意。”吾才接受下来。

十八、清 党

一九二七（丁卯）年，四十岁。吾在学校，开诚布公，全校师生，干劲冲天。到五月间忽然清党。蒋将后方广东的清党交李济深主持。……吾乃说：“既是清党，我有三点要求：

“一、请给我一个时间。”李济深问曰：“要多少时间？”我说：“三天。二、请给我一点经费。三、在我要求的时间内，请对黄埔学校范围三里以内不要派一条兵舰、一个士兵来。这三件事能答应的话，我在清党期间内，绝对有把握，不致出乱子。”李问：“要钱干什么？究竟要多少？”我说：

“这就是我的清党之法。在清党三天之内，不论何人，都可以请假支三个月薪，自由离校。如有困难，可支到五个月的薪。不过，这是要经过我的批准。将来报销时，不要为难。此乃不清自清之法。至云我有无调查，吾于接受代行校长职务时，有约在先，我对任何派系，都一视同仁。平素并不调查，这是得了校长同意的。惟政治部主任熊雄，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他的主张，认为国民革命乃共产革命必经之路。他在学校，是一有功人员。吾要他出国。他的需要，不在三、五个月支薪之列，要以出国川资及在外国能生活一年为度，这样来决定付给他的数目。”吾言至此，李皆一一点头同意。吾才回校，照样执行。三天之后，由本校特别党部，组织清党委员会负责清理。我这三天的清党，所有问题严重的人差不多都已离校他去。不过，后来李济深受破坏分子胡靖安（第三期生、江西人）等少数人的包围，使黄埔范围内（尤其是入伍生团）的清党，搞得乌烟瘴气，乱捕滥关，毫不通过负责的团队长。吾一直力争无效。向蒋恳求辞职，亦不准，只好电恳赴宁面报。及抵宁后，面恳坚辞，仍是不准。我说：“这样假名清党，违法乱纪，我

无法再办。”蒋才说：“既有假借名义违法乱纪的话，请回去按纪律制裁可也。”吾才答应办完第五期毕业为止，无论如何，必须离校。蒋说：“好吧，到那时再说吧。”吾才回校，整饬纪纲。及到校时，那班违法乱纪之徒，早已离校他去。吾才安然将第五期办完。

十九、组织新编十三军参加北伐

一九二七年冬，蒋介石出国赴美。李济深为新桂系领袖。正值南京特别委员会，即李、白等人当权的时候，第八军唐生智骄横遭忌，七军李、白与六军程潜联合讨唐，自南京溯江西上，进攻武汉。李济深本欲挤我离开黄埔，遂利用我志在北伐已久，由其所率领的国民政府后方留守总部主任，委我组织新编十三军（该军辖广东新编第一师，师长黄慕松，是黄埔军校高级班副主任；许克祥为第二师；湘西陈渠珍为第三师；黄埔教导总队改编为第四师），以该军为基础，另以粤军李福林的一部，桂军黄绍竑的一部，滇军范石生的全部，编成北伐军中央军，由我率经湘南郴县，向长沙北进，再东向与第六、七两军会师武汉，夹击唐生智。吾已自郴县到了耒阳东溯墟之线。蒋介石忽自日本回到上海，发电探问我部行踪，并问我对他将要回南京复职有何意见。吾即复电：“如要复职，惟继续北伐，才有政治生命。吾当率部追随。”蒋复电称：“一到南京，即行宣布北伐。”要我速返韶关，再转道赣浙，赶来南京参加北伐。

我部乃中止北进，转向韶关南旋。先头将到韶关，发现帽子峰有滇军范石生部的朱德团在那里监视我部行动。吾嘱戒备前进时，朱团便在我部前头，相隔一日行程转进。我部返抵韶关，原拟休息三天，再转通北进。不料一到韶关，即接李济深电，谓已派参谋长张文提款二十万元交来慰劳，并要我部即随

张开返广州。吾知李、蒋暗斗已尖锐化，但吾志在北伐。因即改命部队，于次晨拂晓开拔，向南雄北进。迨张文抵韶时，吾已北走一日路程矣。而范部朱团，依然在我前头行进。吾不知范对我是何用意，老令朱团走我前头。范见我不待张文，又不同他打招呼，便一再派人追我约见，吾更不理他。方知朱团是脱离了范的掌握，特借我部为掩护，使范不能追及。吾与朱共同进至赣州。朱乃西向赣湘边区上犹、遂川、井冈山一带前进，安然与范脱离开了。吾则向东北经都、宁都、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上饶入浙转趋南京。许克祥师即被张文留住未来（后交李宗仁指挥，第二次北伐成功到了北京，李宗仁当面要我收回许师，吾但谢谢而罢）。李济深乃通电斥我为共产军，要沿途堵截。这时广东军人的暗斗非常激烈，惠州镇守使兼第十八师师长胡谦（日本士官六期同学），竟被师长李汉魂杀害，迫使该师官兵（营、连、排长尽是黄埔学生）北走，前来投我，吾乃令其向赣川集中待编，而以许克祥师的番号给他们，改编为新编第十三军第二师。

二十、被任津浦路运输总指挥

一九二八（戊辰）年，四十一岁。我部开抵南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接驻苏皖北一带前驻军的防地。蒋复派我为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吾正拟组织运输总指挥部，忽在谭延闿处看见蒋来急电，说济南惨案发生，问谭如何应付之策。谭接得此电，正急得团团转，一见我去，便交电给我连声问曰：“军阀尚未打倒，鬼子又来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吾料这是日欲亡我，到了最后阶段，必然暴露的狰狞面貌，除了准备和它拼斗以外，是别无办法的。因而笑谓之曰：“祸既临头急有何用。我且讲句笑话给你听，好吗？”谭怪问曰：“这么大的事来了，你还有笑话讲吗？”我说：“我这笑话与这件事有关

联的啊！”谭曰：“那么，请快讲吧。”我说：“我们新化有句俗话，双手只能捉一条鱼。不知你们也有同样的话否？”谭说：“那还用讲，难道双手能捉两条鱼吗？”我说：“那么问题就得到解决了。现在我们双手用全部精力捉军阀这一条鱼，尚没有捉到，而济南惨案这一来，是从东海又来了鬼子这条大鱼，更非双手所能轻易捉到的。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继续北伐。济南惨案，暂由外交途径对付。待北伐成功后，再用新的办法去解决。”谭曰：“你这意思，我也曾想过。不过，这么大的事，如此对付，如果舆论攻击起我们来，又将何词以对呢？”

我说：“这很简单，如果有人攻击的话，就请他来对付，看他有何高见，拿出来大家讨论。我恐怕谁也拿不出第二个办法来吧！”

谭乃曰：“好吧，这就请你向前方去走一趟，向蒋介石当面去说，看他怎样决策。我们在后方，实在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来。”吾乃赴前方，向蒋转达此意。

蒋亦怕舆论攻击。经我同样解释，才决定将济南惨案电召王正廷去负责交涉，对北伐作战，继续不变。

二十一、接任第三军团总指挥

济南惨案交涉结果，日军答复强硬，非先惩办祸首，没有谈判余地。适吾正带军需处长漆英，找蒋商组津浦路运输总指挥部事宜。蒋复要我马上赴前线，接任第三军团总指挥职，继续作战。并要我力劝贺耀组顾全大局，接受处分。

吾乃将四十六军军部事，命参谋长周斌代拆代行，仅带卫士八名，驰赴战地高唐、禹城之线，与第二、四军团商讨作战方案后，又与第三军团的高级将领商讨今后作战任务。随即向当面之敌攻击前进。

二十二、北伐告一段落

在我当面之敌，如孙传芳、张宗昌、白宝山之部，皆是湘人手下败兵之将。吾自临战场，率部向平原、三唐、德州方面之敌进攻。第二、第四军团沿铁路左侧（铁路除外），吾沿铁路右侧（铁路线在内）地区，追击前进，敌竟不与我军接触，一个劲地逐步向北撤退。我军一直追到南皮、冯家口、孟村之线，忽遇风沙弥漫，自北而南满天飞扬，举目不见咫尺，正是我军北进最难，而为敌人向我袭击的绝好机会。我全军方虑此着，不如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地反向敌人猛扑。谁知敌人亦早料及此，竟不南来，反而亡命北窜天津，逃到山海关外去了。这样一来，便使京汉线上之敌，受到退路将断的威胁，纷纷北撤抢过天津。而称霸北京已久的张作霖，亦仓皇北退。竟被炸毙于山海关外之皇姑屯。第二次北伐之战，就此告一段落。

二十三、蒋桂暗斗

第二次北伐告一段落之后，各路总司令、总指挥皆齐聚于北京，李、白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本在武汉按兵不动，心想“胜则请相随，败则来缴械”，今见蒋介石已胜利，即假情假义地跟来北京，向蒋建议说，这次北伐，四集团军没有尽到力，愿追击奉军，以收拾残局。李、白所部，大都是唐生智的老底子（因唐的主要将领多系桂籍，并未撤换），他自己的嫡系桂军，仅带来一个团作卫队。其所建议，又是“胜则功归己有，败则是唐的家当。”蒋介石亦将计就计，暗遣何雪竹，唤唐生智回来，给以二十万元活动费叫他从桂系手里夺回所部，以制李、白。

果然，白崇禧得到蒋的同意后，便将其第四集团军沿津奉线的丰台、天津、塘沽等地摆着，自己则暗约奉军杨宇霆于山海关

相会，订立以关为界，互不侵犯，互相呼应的密约，并同其参谋长叶琪在火车上商议，计划到廊坊下车向驻军讲话。不料车刚进站，尚未停住，叶忽发现站上所立欢迎唐总司令的牌楼，巍然犹在，因惊叫曰：“唉呀！唐孟潇回来了。你看这牌楼！”白转头看时，吓得喘不过气来，连呼：“莫停车，莫停车，速开车，速开车！”便将乘车一直开回汉口。从此桂系李、白所篡夺的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部队，又轻轻地回到了唐生智的手中。蒋桂战争，也就如箭在弦上，不可避免了。

二十四、西山建议 特任胶东军总指挥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停在北京西山古寺上层。蒋介石以中山信徒自命，到北京后，即住此古寺的中层守灵，开会办公会客都在此举行。吾于其客少闲暇时，根据孙中山的遗嘱，向蒋建议曰：“总理遗嘱要我们打倒军阀，完成北伐。这次战役告一段落，可以告无罪于总理在天之灵矣。今后，我们所应做的便是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了。我认为帝国主义者很多，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将帝国主义者中最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我们的首要之敌。今后应该采取‘攘外以安内’之策，请对日帝定一准备十年的军事计划。济南惨案是日欲亡我，砍在我们脖子上的第一刀，如再不准备对付，则他的第二刀、第三刀随时可以砍来。眼看大好河山。将在我们手上送掉。这岂是总理信徒们所应该有的行为吗？吾以为只要能以党、政手段对内，绝对避免军事行动，不搞内战自相残杀的话，有了十年的军事准备，日帝虽强，我敢包打。现在奉军主力虽已退出山海关，但还是悬挂五色国旗，据关顽抗。吾已派人与张作霖父子最相信的总参议杨宇霆联系了三次，奉军愿意前来投诚。但请你写一亲笔信，交我带赴山海关，把杨宇霆喊来见你，一切由你当面交代。则奉军亦可不战而来归矣。”讲到这里，蒋很兴奋

地以拳捶桌曰：“好，当然我们应该这样做。”吾闻其声，如此爽利，非常高兴，以为总理有灵，亦当欣然色喜矣。但没隔几天，蒋忽找我谈话说：“刻下山东胶济路上有一股匪刘黑七，拥众数万，已有投诚之意。这个关系，在何雪竹手里，我要他交给你。可将第三军团，再加派缪培南的第四军，归你指挥，开赴该地，把他收编下来。胶东乃山东膏腴之地，有江南风味，什么特产都有，你去把他收编之后整顿起来，是大有可为的。”他一面讲，一面下手令，特任我为胶东军总指挥，要我率领第三军团，加上缪培南的第四军，马上开动。吾比即说明现任山东主席孙良诚是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一个总指挥，刘黑七是他防地内的一股土匪，难道孙自己不会收编吗？如要我去帮他忙的话，冯、孙是否同意呢？如果孙不乐意，我这一去，不免有挤夺他的地盘之嫌。将来他一多心，遇事与我搞起麻烦来，那时候，莫怪我不会办事才好。因我知道蒋已不满这次北伐，冯、阎都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山东、河北的地盘（商震是阎的一个总指挥，做了河北省主席），独蒋一无所获，是欲为此亡羊补牢之举也。吾窥其实意在此，又在播下内战的种子，而置吾西山建议于九霄云外去矣，故特提醒之。但蒋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吾也只好受命而行。当即返沧州总部，布置部队开动。部队过了德州，正向山东境地开拔，忽接蒋自良乡（冯这时在此）发来一电，要我部中止胶东之行，将部队复员，各返原防，布置妥当后，走海道回南京相见。吾知定是冯有意见，故尔改变，果不出吾所预料也。

二十五、编遣会议后内战开始

编遣会议期间，废军改师，各集团军均在编遣之列，各怀成见，不欢而散。蒋不能行己意，尤感不满。吾知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如一经发动，则将不可收拾，而济南惨案是日欲

亡我之先声。此时各自保全力量之不暇，谁也不会存此国家危亡的观念了。吾即以病恳请退休，一再不准，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不久，部队调动频繁。吾知内战开始，必先西向讨桂，再北进讨冯，跟着讨阎，从此神州大地盖无宁日矣！

吾自北京初回南京时，谭延闿见我，便问曰：“你刚回来，可又要走了，几时走呢？”我反问：“走到哪里去？”谭曰：“中常会通过你去当福建省主席，介石没告知你吗？”我说：

“内战的序幕已开，现在打仗要紧，其他一切，恐怕都谈不上了。”杨树庄（现任福建省主席）且派代表肖某（在日本留学海军的）乘兵舰到上海来接我上任，皆不得要领而归。不久，我部调驻安庆，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即北伐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久住北京未归。报纸纷纷登载我将任安徽省主席，并刊登我的照片。这些消息一传，陈更不敢回任，搞得我非常不安。同时，宋子文（财政部长）、俞飞鵬（总司令部军需处长）都约我谈话，吾都淡然置之。因急电催陈速回息谣，实则吾内心早想摆脱一切而去。如主持省政，更难脱身。故任蒋对我怎样安抚，我都无心考虑，对前途也就未去推测。只因部队在身，交不出去，内心非常苦闷。

盖吾这时与蒋，已是貌合神离矣。

这些情形，怎好透露出去，谭又何能知道呢？

二十六、讨 桂

一九二九（己巳）年，四十二岁。春初，蒋的部队西开讨桂之先，吾部开驻安庆待命。蒋忽在湖口兵船上以电艇接我相见，说湖北的胡（宗铎）、陶（钧）已被收买（代价三百万元一个）反桂，致讨桂之战，急转直下。欣然有喜色。要我从九江上岸，直插粤汉路之咸宁、汀泗桥，去截击南撤之桂军；并谓湖南何键降桂，受桂系之命为湖南省主席，非常可恶。意欲加以讨

伐。吾认为这样一干，是驱何死心踏地去降桂系，不如由中央亦加委他为湖南省主席，起码可以使何两面讨好，减少其对中央的敌意，充当中央与桂系之间的一个缓冲地，使我留有余地来应付整个局面，是有利的，蒋乃同意，就改变计划，以致造成何键向蒋、桂两边讨好而统治湖南达九年之久的局面。真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至今思之，吾真愧对三湘父老矣。

二十七、讨冯任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

讨桂结束后，我部自鄂西沙市、监利开回武汉，待轮东下，吾在汉口等候了一个时期。有人求我保释马世材（号子谷），说是一个爱国青年。其兄马元材，曾在黄埔军校做过事，我都不认识。但吾向来爱护青年，不遗余力，一闻此言，立即找湖北高等法院院长张孚甲（与吾有旧），托他查明，确有其人，关在监狱里。当即将马保释并赠二百元托张转交，嘱莫来见，赶快离汉远走。不久，何应钦来当武汉行营主任，张孚甲往见时，何问：“你们法院里关得政治犯否？”张说：“有的。”何嘱造册送阅。张即将先后所关男女青年共五百余人，都造名册送阅。何即批：“一律枪决。”比命机枪连，用机关枪一下子尽行扫射毙命。马子谷后来说：吾慢保出来几个星期，当与此五百余人一路归西矣。吾闻及此事，痛恨何应钦杀人不眨眼。闻何由日本士官毕业回国时，正值王文华因系贵州省主席刘显世的外甥这种关系，得揽全省军权，练新军三个旅，曾将何应钦及其同期同学谷正伦，张春圃委为旅长，委朱绍良为参谋长。何竟遗弃前妻巴结王文华，与王的胞妹结婚，从此更得王的信任。王有野心，欲挤乃舅的主席位置，密令何先去乃舅侍为左右手的财政厅长刘某处，将刘全家男女老幼，连婢仆一起共数十口，尽行杀戮。其残忍毒辣，灭绝天良，至于此极！其在汉口屠杀爱国青年，固是他的家常便饭，并不

稀奇矣。后来，王文华被仇人刺杀于上海一品香旅社，何亦被刺于昆明（因贵州地盘被袁祖铭夺走，他们亦被赶走，逃难至此间）澡堂门口，子弹射入肩膊骨内，至今不能取出，成了两肩一高一低的残缺畸形。吾深恶张孚甲之只顾做官，太不管别人死活了。部队开往扬州不久，又移驻蚌埠随即准备讨冯。我奉命和方策先将态度暧昧的方振武所辖鲍刚、阮玄武两军解决。鲍在安庆，由方策执行，结果方反被鲍挟走，后经我派蒋伏生团尾追月余，始将他救回。吾负责解决阮玄武军，因我部自讨桂不久即移驻蚌埠，对合肥、巢县一带地形比较熟悉，如何布置，早已胸有成竹。恰好阮部皆驻合肥、巢县一带，一经我部包围，阮玄武便被我软禁起来。阮知情况不妙，便严令所部不要乱动，静后解决。这时，蒋恐我亦蹈方之复辙，一夜之间，连来四次急电，要我将阮玄武枪毙，以绝后患。阮似亦有所察觉，一再向我表示服从，并指灯泡为誓，谓如有二心，将来定遭红炮子穿心。吾鉴于唐生智（唐任西征军第五路总指挥，吾任第一路总指挥）已在黑石关，与冯部交火，吾如因毙阮而激起他所部叛乱，势将影响讨冯大局，故利用阮之怕死，要他好好约束所部，听候改编。这是我内心的打算，非蒋所得而知。故我对阮绝对担保，使其部队得安然开赴河南临汝战地，将冯所属宋哲元部击溃后，我部即尾追至潼关。我的总指挥部也移驻洛阳，以待战事结束。

二十八、脱离部队

宋哲元败退陕西。讨冯之役正告结束时，唐生智忽在郑州拥汪反蒋，自称总司令，将讨冯各军收买笼络，独对我部断绝接济，并密电洛阳警备司令万选才，以五万元悬赏换取我的头颅。幸其军长杨杰在我身边，杨与万有旧，万向杨透露消息，使我悉得此情。吾正因蒋发动内战，与我志趣相背，即藉此机

会电蒋请求辞职，将部队交给副军长，俾便与唐联络，而使部队得以保存不致受困。吾乃与杨杰化装自偃师渡河。原想到焦作后，以日本同学关系同赴太原访阎，及见阎在河北对中央严密布防情形，知唐败之后，阎必反蒋，这时冯在山西。阎骗蒋说是冯已被他软禁，实则完全相反。冯阎正谋合力反蒋，吾认为兹事体大，匿往北京转道南回，见蒋之后，将所见告之，请速作准备。唐的问题不大，如欲用兵，不要十天，准能解决（后来只有七天便全部解决）。惟唐一解决，阎冯合反，恐非一两年是不易解决的。蒋闻吾言，急得满面通红。适宋子文来，吾就起身称病请假赴沪，从此便永远脱离蒋政权了。时在一九二九年的年尾。

二十九、革命同志社

一九三〇（庚午）年，四十三岁。吾抵沪不久，即组织“革命同志社”，主办《怒潮月刊》，力反内战以对日，宣扬内战是自杀政策。一面向有关部队密取联系，唤醒大家不要忘记济南惨案血迹犹新，到必要时，不论中央与非中央，凡有部队的，都应采取统一行动，枪口一致对外，决不再为敌人造机会。

三十、抗日会

一九三一（辛未）年，四十四岁。“九·一二”、九·一三”两日，蒋作宾被任为驻日大使，接连来我家找我去做大使馆的武官，说是在总理陵前，奉蒋介石面谕，要我来找你帮忙的。我说：“你好大胆子，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你便敢去当大使，请问你，这个使命怎样完成呢？”蒋曰：“所以要请你去特别帮忙呵。”我说：“这个忙，我敬谢不敏，望另请高明吧。”这样被我坚决拒绝而去。九·一八事变时，这位蒋大使刚抵南朝鲜的釜山，尚未渡过海峡，进入日本的国门下关后

来见面，蒋谓我曰：“你真厉害，看问题这样准呀！”我说：

“济南惨案，不是很明显的事吗？至于事出在那一天，巧合罢了！”事变不久，同情我搞“反内战”的徐谦，谓我曰：“蒋介石是不会抗日的。国难既已临头，抗日工作还是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推动吧。”固将“革命同志社”的二、三百同志，和他的“劳资合一小组”亦约二、三百人合并起来，搞一个“抗日会”。提出“凡是抗日者皆为友，不抗日者皆为敌”的口号，与他分负军事、政治工作的责任。当时程潜亦在沪闲住，几次开会，曾请他担任过临时主席。有一次，徐谦小组内的一位阮典，提议请宋庆龄先生来参加这个会议，由于内部意见没有统一，宋终于未来。不久，闻李济深自汤山被释放出来。吾已久不去南京矣，为此特地三次前去与李晤谈，才请得李来领导会务，进行工作。后来为了预防蒋的破坏，李返香港家居，后就将抗日会转移到香港活动去了。

三十一、抗日会的活动

一九三二（壬申）年，四十五岁，一九三六（丙子）年，四十九岁，这五年间，差不多都在香港活动，间或到沪，都极秘密，不敢出面。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驻福建，不久，便在香港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皆来港协商。李济深、徐谦与吾亦同参与其事。后来酝酿成熟，公推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吾则被推专返湘西，去组织湖南抗日政府，与粤、黔、桂诸省联合行动，领导湖南的抗日运动。后来抗日会指定朱蕴山与中共指定的董必武互相联系。

三十二、湖南抗日政府

一九三三（癸酉）年，四十六岁。李济深、陈铭枢等由香

港赴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吾亦组织一批人，由广西桂林、龙胜入湘西南的通道到靖县，已约好在湘、鄂、赣、粤、桂、黔边区的一个正规师（皆由抗日会联系的黄埔军校学生负责掌握的），待吾抵洪江，发出通电，立即响应，来推动湖南的抗日运动。不料，国家主义派的头子曾琦、李璜为了报销他的成员黑龙江省主席朱庆澜所捐二十万元，竟不顾在香港各党派会议所决定，凡在湖南的抗日部队都应通过湖南抗日政府的统一指挥的约言，擅以五万元（私吞了十五万元）驰赴安江市，发给驻在该市的该党成员、保安团团长某。该团长仅以一万元（私吞了四万元）发一关饷，作为发动费，竟向驻洪江的保安团旅长陈子贤部（是吾旧部，已约好只待吾去通电来发动的）作以卵击石的进攻，结果一触而溃，被抄去许多香港文件，报由何键呈请南京政府通缉。靖县县长孟鼎鉴亦系国家主义派成员，知道此事，据以相告，并说：“何键已电陈子贤旅所属的谢龙团（系何键的马弁出身，不大听陈指挥的）带便衣队二百人，前来迫害，离城不远矣云云。因即仓皇爬山越岭而逃。路过南宁时，李、白告知：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搞社会民主党那一套，辱骂国民党，撕毁孙总理遗象，致被蒋介石作为借口振振有词地讨逆，打得鸡飞狗散云云。这样费了很多的力策划的抗日运动，竟被扼杀，好些人几丧生命。此次事虽失败，而吾之愚忠已尽矣。

三十三、抗日大同盟

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丙子），抗日会改组为抗日大同盟，在国内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并推动了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和继冯而起的方振武的抗日，又联系和推动了东北义勇军马占山的抗日，以及东北正规军李杜的抗日。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日时，抗日大同盟才敢公开到上

海南京等地进行活动。

三十四、战地党政委员会

一九三八(戊寅)年,五十一岁。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正式宣布抗日,国民党政府由南京先后迁到武汉、重庆,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介石自兼,实由李代行)。吾亦由李济深派充第九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吾本意只欲负实际责任,名义可以不拘。但主任由薛岳自兼,权亦独揽不放。吾仅于九战区党政分会成立时,到长沙参加过一次会议。以后,便从未与闻过分会的工作,薛亦乐意如此。因此,经常到衡阳小孩方定欧(与人合伙经营汽车运输)处或回新化家中闲住。看到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非常痛恨。但一直坚持抗战信心,直到完全胜利。

三十五、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后的生活

一九四五(乙酉)年,五十八岁,到一九四九(己丑)年,六十二岁。这四年间,吾经常在新化过家居生活,但因多年在外未归,老屋颓废无存,上海、南京、汉口的住宅,又系吾在部队期间由元配刘氏清华一手所置,本人毫不知情(吾向来不屑治家生产,实亦无暇顾及);抗战前后,吾又因搞反内战和奔走抗日活动,亏累甚巨,长沙油铺街及汉口宝庆街住宅,已在沦陷前夕全家回新化时脱售用尽;所剩沪、宁两宅,又已抵押多次,无力赎回,只好任刘氏母子先后变卖此两宅偿清欠债,以所余之资,交定欧经营生意以过活,抽出一部分在新化乡下盖一所住房。又见蒋介石疯狂进行内战,怕他疑我有何政治活动,便将屋场扩大,兼营一小农场,表示我不再与闻政治,以释蒋疑。故除间或到长沙、上海看看外,其余时间都是住在乡间的。

但在此期间内，湖南省参议会中有黄埔同学多人，想为我在政治上谋一说话地位，欲拥吾为议长。吾不以为然，觉得我现在正在隐居以遂吾志，乌可再为冯妇。

一九四七（丁亥）年，六十岁。在上海有一黄埔军校六期学生盛子苓，认识美国人陈纳德，便异想天开地邀集李明扬一班人，集资搞个中美渔业公司，定欧（时正脱售房屋不久，手中有些资金，在湖大毕业后复进军校十七期毕业，在远征军杜聿明及税警团伍光宗手下任过上尉参谋等关事）被拉进去后，便把我也套上一个监察长头衔（我那时对美帝的认识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每到上海，便邀我去过几次。这两件事，实皆非我本意所乐为的。这是我在这四年中事不由己，听人摆布的一种糊涂生活。

三十六、解放战争期间和迎解工作

一九四八（戊子）年，六十一岁。夏，我派梁觉去香港，与李济深联系。李已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要我在湖南搞地下活动。这时，上海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吴成芳来长沙，要我在湖南与唐生智合作搞迎解工作。吾正恨蒋介石专事内战，妄自尊大，专搞独裁，遂欣然同意。比即请介绍给在湖南的地下工作同志，以便就近联系。吴谓我为你直接通天，何必另找联系。旋与马子谷、邹务三等同商谈。盖以马曾受过我的营救，应能特别相助来共同迎解也。邹则为吾旧部，且系当时的新化警察局长，段楚贤（锑矿大王，喊为银菩萨）赖其保镖。邹向我建议曰：“既要迎解，必须经费，段楚贤是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要他帮助。当即邀其代理人刘翎参加商谈。刘谓段可帮助八百吨锑作迎解经费。吾即计划布置分别行动。其时，南京政府蒋已下野，桂系当权。代总统李宗仁有意调程潜去粤任考试院长，欲取消其湖南省主

席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之职。马子谷得此消息便通过程星龄，要程潜委任唐星为长沙绥署副主任，去找刘斐向李、白讲话，因得挽回不动。解放大军南下到达湖南后，四野司令员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吾才派人与之联系，复斌要我与其已到湖南的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接洽。在汉口与之晤面，承其转呈毛主席派我为四野顾问。此前，吴成芳要我和唐生智合作在湘搞迎解，曾与唐约：湘南由唐，湘西由我；湘中则由唐与我共为之计。在新化同一工作的有：王中、王果圆、段荫南、方滇卿、孙祖祺、伍微照、曾国珍、罗志一、黄人、方步蟾、方发祥、胡念坤等二十余人。我们虽因条件限制，也做了下述几件工作：一、委任陈渠珍为湘西迎解军第一纵队司令，廖湘芸为湘西迎解军第二纵队司令；武思光为资沅迎解军第一纵队司令，向承祖为资沅迎解军第二纵队司令；黄人为资沅迎解军第三纵队司令；李浴和为资沅迎解军第一支队司令。二、策动驻新化国民党军师长周笃恭、副师长黄玉谿等起义。三、印发《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四、印发告黄埔同学书劝其起义投诚。五、组织新化自救分会。六、支持进步人士的革命言论，派刘一禾等创办《三湘日报》，对抗新化县党部控制的《新化民报》。七、支持当时新化县长拒抗替国民党军队派伏派粮。八、策动新化警察局、自卫队、时雍乡公所起义。九、与驻安化解放军前站部队（地下党委任负责人）熊少安取得联系，迎接解放军等。以上这些工作，对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是微不足道的。我自感惭愧。为了进一步进行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我曾派人去河南信阳，向南下解放军四野林司令员取得联系。后来林司令员驻军汉口时，我又冲过两道防线，遇到种种困难，才得到达汉口，面报我在湖南的迎解工作。一九四九年冬长沙军管会肖劲光司令员又要我去邵阳、湘西，协助驻军收编散兵游勇。但工作都做得不够。

三十七、解放以来的转变

一九四九(己丑)年,六十二岁,到一九六八(戊申)年,八十一岁。这二十年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天变地变人则更变的新中国。吾以旧社会过来的旧军政人员,年龄既大,中毒益深的昏庸老朽,解放以来,得到党和政府照顾和教育改造,使多年来的废物渣滓,一旦投此高热熔炉,虽欲不化,不可得也。

一九六九(己酉)年,八十二岁到一九七四(甲寅)年,八十七岁。这六年间,因一九六五(乙巳)年七十八岁,患前列腺肥大症,施行手术,虽运动有恒,用手按摩,坚持不懈,但血压仍常波动,时患头昏耳鸣目眩。如休养得好,可马上平稳下去。医嘱绝对静养,防其突变,发生脑溢血中风等症。除重要会议非出席不可外,惟有加强学习,多读马、恩、列、斯、毛著作,做一个盛世的超百龄的革命老人来欢度晚年,以自勉也。

方鼎英墓志

陈树华撰 方辉生书*

方鼎英先生号伯雄，湖南新化县人，世居县东北的圳上区（今圳上镇）。一八八八年四月七日，即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生于一个穷秀才家。他四岁死了父亲，母龚太夫人鼓励他刻苦上学，十岁时读完四书五经，应幼童考，十二岁赴长沙考入明德学校，受陈天华所著猛回头等影响，立志反清救国。因家庭经济困难，十三岁时考入有公费的实业学堂学习。一九〇二年十五岁考选赴日留学，初入宏文学院，与陈天华同寓，结识与陈来往的革命人士，先后被介绍加入同盟会、求知社、文学社等组织，从事反清革命。一九〇五年考入陆军振武学（堂）校，循序升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至一九一一年春毕业。回国后，在保定军校第一期任炮兵教官。秋，武昌起义，约同士官同学三十多人南下，参加了汉阳的作战。后在岳州镇守府司令部任参谋处长兼教练科科长，不久入陆军部当科员，从事炮兵典、令及兵学书刊等的编译。时袁世凯阴谋称帝，羁留蔡锷于北京，蔡与方鼎英、石陶钧有求知社同志关系，又是宝庆同乡，（宝庆在清末时为府治、新化旧属宝庆府——编者）相与密谋派石陶钧赴美联络黄兴倒袁，所有联系往来，都由方鼎英秘密递转，于倒袁斗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袁倒后，北洋政府仍是一丘之貉。方于一九一七年再赴日

* 陈树华现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方辉生系美籍华人、方鼎英之子。

留学,先后入陆军炮工学校的普通科、高等科,又入野战炮兵射击学校等校,毕业后,再入帝国大学造兵科从事研究。一九二一年赵恒惕在湖南,要在湘的士官同学促方回国,任为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兼援鄂军总指挥部参谋长。于击溃王占元部后,吴佩孚坐收渔翁之利,以兵舰袭岳州,迫赵降吴,方以为耻。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命谭延闿入湘讨赵,相持于衡阳附近,谭委宋鹤庚、鲁涤平为讨贼军一、二军军长。鲁中立不就职,宋托病,把军师长职委方鼎英全权代理,所属旅长均拥赵拒谭,方受命赴衡阳访谭后,遇朱耀华团向衡阳前线开拔,因说服朱耀华反戈回长沙驱赵,方以代军长入城维持秩序,是为“九一政变”。经两周后,赵请得吴佩孚援军,并招集所部反攻长沙,方以临时凑合的劣势部队,退守湘江西岸自岳麓山至湘潭之线,相持三十多天,几经激战,方屡屡亲自发炮挽回危局,军中多传方已战死,赵部旅长邹天山甚至望江遥祭。方见义勇为,英勇奋战的精神,为双方将士所称许,终于使鲁亦放弃中立拥谭。适陈逆(炯明)围攻广州,并约江西敌方本仁攻北江,孙先生急调湘军回援,时赣敌已抵周田,韶关危急,湘军以主力从正面阻敌。方率第一军由右侧奔赴始兴,攻敌侧背,经十一日苦战,敌溃退,追至大庾岭,收编其高凤桂旅而还,深得中山先生嘉奖。那时谭率湘军卫队营赴广州,陈逆洪兆麟部闻风逃去,广州之围亦解。一九二四年春方又参加东征,进出于河源、新丰各地,湘军因水土不服,瘟疫死亡过半,方亦染重病。至秋天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复遣谭延闿从江西北伐,方病不能从征,后闻湘军深入吉安被敌反攻溃败,才扶病赴上前方,协助谭在南雄收容整理,将机构臃肿的四个军整编为七个团和一个讲武堂,编余军官归讲武堂收训,谭亲任整理处总监,方任副监兼讲武堂教育长。

一九二五年广东全省统一,部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军官教育亦统一归并于黄埔军官学校,方调为黄埔军校入

伍生部中将部长，不久改任教育长。一九二六年北伐，蒋上前方，又委方代理校务，利用他在军学界的资望，得以广为罗致教学人才，编纂各种军事教本并注重政治教育，对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反帝、反对封建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不料在北伐胜利进程中，突然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事件。方鼎英没有计较个人的安危，坦率主张和平清党，不要流一滴血，并要求给予经费和三天时间，以便说服共产党领导人。暗示在校共产党如期自动请假离校，可按一般先例批给每人三个月工资，但对政治部主任熊雄例外，至少应礼送三几千元请他从沙面出国。李济深沉思了一会儿，才答应照方的意见去办，从而保护了部分革命力量。可是在三天过后公开宣布清党时，右派分子胡靖安假借清党委员地位，勾结卫戍部队对黄埔学生入伍生还是滥捕滥杀了一些，搞得乌烟瘴气。方忍气吞声，向蒋控告他们在校违法乱纪，他们反控告方庇护和放走共产党人，方只好自请他调。到秋天方调为暂编第十三军军长，一九二八年蒋复职，调方去苏北，改任四十六军军长兼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参加所谓第二次北伐。济南惨案后，又调充第一集团军第三军总指挥，沿津浦路击破敌人，进出于德州、沧州地区。张作霖向关外撤退，宣告统一完成，当蒋到北京碧云寺守中山灵时，方建议蒋今后不要再向国内用兵，以便积蓄力量对付帝国主义，首先是日帝，说：若能埋头建设十年，将来以东北的力量，即可对付日本。蒋表面不反对，但实际上鼓励白崇禧去打东北。哪知白把部队调京奉线上即与杨宇霆勾结，蒋只好再起用唐生智去拉白的部队。白吓跑回广州，蒋桂战争就表面化了。蒋要方把部队调到安庆直趋武汉，一面收买桂系内部，很快瓦解了桂系。方进出于沙市、监利地区，战局结束，方部复员到蚌埠后，立即被命为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参加蒋冯之战。方于临颍附近击破宋哲元部，追至潼关，蒋冯之战告一段落。唐生智又在郑州宣布讨

蒋，方看到这种茫茫无了期的混战，内心万分痛苦，乃决心退避三舍。当一九三〇年蒋冯间序战开始，暗示方上前线时，方敬谢不敏，避居上海。果然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与胡汉民又分裂，西南方面又组织了政府，日军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不抵抗主义下葬送了东北四省，蒋还要以“安内攘外”政策自相残杀，全面对苏区红军进攻。这时，方感于国家民族危亡，才决心组织革命同志社，联系主张抗日的人士，来推动抗日斗争。旋与徐谦、朱蕴山等合组抗日会，由徐与方分负政治、军事方面之责，朱负责与中共及其他群众团体的联系。李济深在汤山解除软禁后，方专程赴南京请李担任抗日会的领导，工作进展，颇得各界人士的支持。方主要是联系蒋军内部旧好和黄埔学生为基础。邓演达先生牺牲以后，原来追随他的学生也转而随方活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时，商定李赴福建，推定方从湖南统一邻近各地力量，夺取长沙，出武汉。由于联系协调不够，方刚到湘西靖县，有个小部队没遵照原计划抢先发动，影响了统一行动。同时福建迅速失败，方只好退经广西回香港。后来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终因“七七事变”掀起全面抗日战争，方坚持团结抗日到底。曾出任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日胜利后拥护和平建国方针，迄蒋悍然发动内战，常与李济深、章士钊联系，从事反内战活动与和平自救、迎接解放的工作，衷心赞助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和平起义。解放后，先后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司法厅厅长，湖南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长期在统一战线调动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努力学习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加以贯彻执行，争取为伟大的社会主

又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热切地希望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祖国的完全统一。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午从餐桌起来时，脚碰上桌子腿而摔倒。随即失语，经湖南医学院附属一院（即湘雅医院）检查为脑血管破裂，抢救到六月一日上午，心脏停止跳动，终年八十八岁。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寄予哀思。一九八一年八月又协助其子女由长沙移送骨灰归葬于新化圳上方氏祖山。

记外祖父王礼培的生平事迹

易新夏*

王礼培，字佩初，晚号潜虚老人。湖南湘乡人，世居湘乡洙津渡后峰，是清末民初我省著名的藏书家和诗人。他是我的外祖父。我因父母过世很早，童年即在外家抚养。外祖父去世时，我已是一个初中学生。外祖父生于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初一，一九四三年三月初三去世，享年八十岁。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办理丧事时，张挂了许多挽联，其中一首写道：“摇笔动星辰，看虎将三朝哲嗣；拔云起风雨，哭龙城一代诗人。”当时，我并不很懂得，后来我因学习文史专业，抚其遗泽，并与表兄公绥、公望共同回忆，走访有关单位，撰述了这一篇关于他的生平事迹。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不以亲属称谓而直书名讳。

王礼培的叔祖王鑫是湘军创立人之一，到了他这一代，弃武从文。他在十岁时，随伯父寓居长沙，曾就读于思贤讲舍，后又读书于致远楼，并曾求教于湘潭著名文人王闿运。一八九三年二十九岁，中乡试举人。次年赴京应试不第。他这次赴京应考，对他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小小挫折，据闻，他在试卷中引用的是《墨子》一书的典故，而为主考官所黜落，他不服气，持《墨子》一书与主考官抗言申辩，主考官为之理屈，以

* 易新夏是王礼培的外孙。文中内容多系作者亲见亲闻。现为广东省韶关大学中文系讲师。

好言劝他还乡。

一九〇五年八月，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兴学校。”湘乡县也开始办起了新式学校，设有师范、中学、小学三班，合二百余人，王礼培出任学监。此时，他与湘乡著名革命党人禹之谟交往密切，受禹之谟影响倾向革命，并秘密加入了华兴会。一九〇六年，禹之谟因主持了陈、姚二烈士归葬岳麓山之事，为清政府所注目。湖南巡抚为扑灭学生运动，下令长沙各学校提前放暑假。禹之谟于假期中和湘乡籍学生一起返乡。此时湘乡学界中发生了抗争盐捐浮收风潮，所谓盐捐浮收，即食盐附加学捐，向来由贪官及地方劣绅，伙通经收盐税的畅远盐行经手，他们狼狈为奸，化公为私，共同分赃。而教育经费又由旧派把持，旧派以程希洛为首，以劝学所为中心，新派王礼培等以湘乡中学及师范学堂为中心，两派斗争激烈。新派查出盐捐浮收背后的黑幕，组织力量进行清算。恰值禹之谟和省城学生返乡。于是，在六月三十日（农历五月初九）由禹之谟、王礼培率领学生至县衙门请愿，要求追回赃款、惩办贪污犯。他们向知县陶福曾提出：“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款，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之款，移充学堂经费，免入私囊。”在交涉中激于义愤，砸烂了县衙的“明镜高悬”匾额。知县陶福曾恐事态扩大，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拘畅远盐行行伙高岳峰收押追赃，责令出具甘结票据，陶福曾亦当众保证所追赃款全数移作教育经费。学生散去后，陶福曾即密报湖南巡抚庞鸿书，要求逮捕禹之谟等，而清政府正想抓禹之谟却无恰当口实，至此，即决定以“哄堂塞署”罪名逮捕禹之谟。禹由湘乡返长后，即感到了危险。也有人劝其他往，少避毒锋，但禹并不畏惧，并抱定牺牲决心，而对同志则表现了他的关心。当时，王礼培在湘乡盐案发生后也到了长沙，禹在黄泥堰（今之黄泥街）遇到王的家人单俊杰，要单俊杰转告王礼

培，速离长沙。王礼培得信后，即和其六弟筹资乘船去汉口，并由汉口乘船至上海，泛海至日本。禹之谟则不幸于八月十日（农历六月初二）被捕，移解至靖州，由酷吏金蓉镜严刑拷掠，虽惨受酷刑，始终未透露一个字，最后壮烈牺牲。

禹案在湖南成为大狱，王礼培亡命日本，先住东京靖国神社之九段坂，补习日文，后入帝国大学学习法政，在留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于一九一〇年得见孙中山先生，得到中山先生赠送的亲署“礼培同志存，孙文”字样的八寸大照片。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后，十一月，留日学生开全体大会，决议一齐回国，王礼培于这年冬由日本回国，曾到湖南省铜元局任职。湖南虽是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但起义后，政局较乱，王礼培产生了退隐思想，在铜元局不到半年即辞去，与亲友数人，赴城隍庙起誓，不入仕途，不担任任何官职，有诗说：“遂须埋名小招隐”，“引退江湖只自吟”。所以，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招隐馆”，又名“扫尘斋”，“紫竹荆舍”。

此后的十几年内，他来往于平、津、沪、宁等地，访求古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异书一时获，外物更何求。”他家原有藏书并不丰富，但经过他后半身近三十年的搜集、收藏，蔚然可观，收集了相当多的珍本、善本。为搜集、整理、校订古籍，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有限的财力。他没有多少财产，不象叶德辉那样，亦绅亦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靠印书赚钱。他变卖了祖上的有限的遗产用来购书，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经营古玩字画，一个担任小官吏，也不能在经济上给予他以多大的支持。他无钱购置昂贵的宋版书，便去坊间收集散页、单页，花不多的钱买回来，自己亲手整理、裱装，订成《宋元留真谱》两册（现藏湖南图书馆），保存了古代珍贵的出版、印刷史料。后来，三十年代寓居长沙时，他

常去玉泉街的旧书店浏览，买回一部古籍，加以整理评注，又卖出再买另一部，他便是采用这样的穷办法来从事古籍研究工作的。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藏，在当时湖南书贾述清末藏书人家有“叶氏藏书第一，王氏藏书第二”的称誉。

他生平爱书如命，二十年代，溥仪大量抛售清宫文物时，他为文物的散失深表惋惜，在《废帝欲售内廷古物、奸商多窃天禄官书，事有同慨》一诗中发出了“铜仙金鞵智愚哀”的感叹。他以有限的经济力量在他的藏书中就收藏了散入民间的盖有“乾隆嘉庆御览之宝”的宫廷古籍。二十年代末，他曾到南京次子传麟处小住，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曾亲自上门，请他去国民政府的国史馆任职，又动员他将藏书捐献出来，均被他拒绝。为避免他们纠缠，他即避居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亦曾登门拜访，愿出高价借阅他在上海的部分藏书并拍照，他虽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也拒绝了这个要求。

一九三一年，他应河南大学之聘，任文学院教授，主讲目录学、版本学。在河大任教一年，后该校任命牛津大学毕业的许君武为文学院院长，他因学术思想与之不合，乃去。

从河南返湘后，寓居长沙，继续从事古籍之收集、研究工作。一九三三年，他被湖南船山学社选为副董事长，一九三四年被选为董事长，任职到一九三八年止。他与船山学社关系很深，早年曾就读于船山学社前身思贤讲舍，王船山民族思想曾给予他以很大影响，在他的诗中，就有赞颂船山先生的篇章。他主持船山学社工作期间，除社务外，还作学术讲演，他的著作《谈艺录》一书即此时讲学的若干记录。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船山学社社址被国民党宪兵三营占用，他多方奔走交涉，达三年之久，对国民党政府摧残学术文化事业深表愤慨。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轰炸长沙。一九三八年，船山学社迁往湘潭，他辞去了董事长职务，回湘乡洙津渡旧宅，从此乡居，未再外出。他在家整理藏书，并和居乡的王季范、郑家溉（清末翰林）、肖仲祁、胡子靖、胡子清（均系清朝举人、留日学生）、凌敏刚（原保定军校教官）等往还。晚年，他的书房内藏有十大柜珍本、善本书，其中有珍贵的孤本、手抄本。在旧宅大厅内，另有三十六个黑漆书柜，柜子系从广东用优质木材定制，内壁用绸子裱好，以防虫蛀。这些书柜系用秦代三十六郡郡名编号，柜门上由他亲笔篆书三十六郡郡名，并由木工雕刻。他每日早餐后，即进书房，整理藏书，他还将所有藏书重新用棉纸装上封面，用丝线装订，并将破旧之处补好，封面及书挡恭楷写上书名，他虽已是古稀之年，这一切都亲自动手，不假手别人。

他常叹息自己既无足够的经济力量买书，又因家居潭宝要冲之地，屡遭兵燹，藏书不易保存。他的藏书曾三度被毁，一次是二十年代初，旧宅为兵所据，藏书散失，大半被驻军当了柴火；另一次是“一·二八”事变，他在上海收购的书籍全毁于战火；第三次是他去世后，一九四四年日军陷湘乡，藏书虽由家人转移了一部份，但多数还来不及搬走，日军驻扎在他的旧宅，走时，一把火烧掉了这所老屋，藏书一并焚毁。劫余部份，于解放后土改时送到了湖南省图书馆，他的藏书目录《校壁书目》（亦藏湖南图书馆），著录了古籍一百余种。珍本、善本书除前所举《宋元留真谱》外，有明刊本《独断》二卷（汉蔡邕著）一册，系清翰林院藏书。《后汉书》有两种明刊本，一种是明万历四十七年钱塘钟人杰刻本，一百二十卷，二十册，先后经嘉禾谢东墅，枫谿谢壻等人收藏，一种有唐朝李贤的注，只存列传八十卷，此书为袁氏卧雪楼故物，书首有王礼培得此书的经过题记；明刊本《仪礼》十七卷，二册，亦

为袁氏卧雪楼故物。此外有明竟陵派大师《钟伯敬先生遗稿》四卷和《续钟伯敬先生遗稿》。后者已成为海内秘籍孤本。以上几种现均藏湖南图书馆。明版书《宋六十一名家词》、《昭明文选》等，清版书《全唐诗》均有王礼培亲笔批注，手抄本《西汉文》、《文文山全集》等由其亲属保存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后被抄下落不明。所藏字画中，如近人尹金易（别号和白）费时四十天精工绘制的《白云红树图》、张大千赠送他家的四幅画，均有王礼培的题跋，亦于“文革”中被抄失散。王礼培的主要著作，有诗集《前甲子诗篇》、《后甲子诗篇》，文艺论著《谈艺录》，散文《扫尘斋文集》、《雨思集》、《家传》等。在他生前出版的只有《后甲子诗篇》、《谈艺录》两种。《后甲子诗篇》收的是他六十至七十岁的创作。

他的诗属晚清“同光体”诗派，主张学宋诗，宗法黄山谷，诗风古朴，清刻、奥衍。陈三立说他的诗“奥邃精严，志深而味隐，能收拾涪翁坠绪益自振拔，蔚成气象者，寥廓天壤，此为照影独步矣”。这个诗派的盟主陈三立民国以后虽然自居遗老，但芦沟桥事变后，以八十高龄绝食殉国。这就不是用“遗老”一词能盖棺论定的。王礼培则参加过反清斗争，民元以后退隐，不与北洋军阀政府及国民政府合作，而在他的诗集中，有不少爱国和忧民的篇什，有“草檄相如身老大，思玄平子意傍徨”的感叹，他写了二十年代初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一九二五年“叶某（指叶开鑫）军藉冬防，以一师之众屯驻乡城，预征田赋十五万，余家以除夕，迫于追逼，为之废殯”之事。他写了军阀统治下东南六七省的大水灾，有“北渚新愁南浦恨，有人清泪湿江篱”的哀痛。对大革命也曾一度寄予希望，在《送友人之广州从军》中写道：“地入南荒尽，城悬海月孤，折衡慎帷幄，老眼慰新漠。”蒋介石叛变，他深感失望，写道“割据英雄业，谁怜貉一丘。”在国民党

统治下，他写了“十步严兵哨，千人弱吏威，更闻蚕妇叹，岁晚倚空机”，“存者依新鬼，谁与种祸胎，连村三月火，吟望肺肝摧”的不幸景象。他的《续春陵行》，“哀民生之日蹙”，抨击了新军阀的混战，“问道中原四十州，涨天尘埃战未休，健儿横尸血未冷，饥鹰下啄掠金眸”，“君不见，中原莽莽争逐鹿，猛将如云飞食肉”。三十年代，他目睹“九·一八”事变发生，写了《东事二首》、《锦州围急》等诗，序言中指出“东事起，不战而失地数千里”，“日本既夺吾辽东三省，遂进取热河”，“马占山守黑龙江乞援不应”。这些篇章中均流露了一个老诗人爱国、忧国的深情。王礼培早岁攻举子业，后来又参加反清斗争，加入同盟会，民国以后，不作官，以研究、整理我国文化古籍为己任，用他个人的力量对保存、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熊希龄的一生

周秋光*

一、少年科第 春风得意

熊希龄，字秉三，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出生。原籍江西丰城县，先世屡官湖南湘西州、县，遂入籍凤凰直隶厅（今凤凰县），故人称熊凤凰。父兆祥，号云卿，自幼从军，承袭云骑尉，历任守备、副将，官至澄湘水师营统带。携家居于沅州府城芷江县。母吴氏，苗人，系蓝翎守备吴支文的长女。熊希龄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军人的家庭。

熊希龄的父亲从军的年代，正是太平天国起义在国内兴起的时候。当时曾国藩在湖南创建的湘军，文人治军，其部下和幕僚多系四方书生策士，俨然形成一个书生集团。在当时湖南人的眼中，已成其为表率，于是蔚为风尚。熊希龄的父亲在如此环境和气候的影响下，自愧出身行伍，难入其流，便希望能有个读书的儿子，以光耀门庭。于是他把心力倾注到年幼的熊希龄身上。

希龄是熊家长子。他禀赋聪颖，很得父母爱重。在塾师的训导和母亲的督促下，不数年，四书、五经，竟被他诵背得滚瓜烂熟。能开笔作文，后来有一些传说，认为他是湘西神童。

* 周秋光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近年协助林增平教授（兼我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编有《熊希龄集》。本篇史料是根据调查访问所得和档案材料写成，并得到了林教授的指导。

一八八八年，江苏宝山朱其懿任沅州知府，设沅水校经堂招收学生。熊希龄的父亲与朱其懿有同寅之谊，将熊希龄送往附读，希龄从此师事朱其懿，在沅水校经堂攻读三年，深得朱的器重和雅爱。

一八九一年，朱其懿将熊希龄送到长沙湘水校经堂深造，临行前在拱北楼赠诗训别。末句云：“熊生俊美年尤少，乍入繁华慎立身！”业师的殷殷企望，使希龄铭记在心。入湘水校经堂后，他用功益勤，见闻益广，学业大大长进。同年秋天应乡试，竟以第十九名中式，成举人。湖南学政张亨嘉特加赏识，称许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陲，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为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朱其懿亦称他“五七人中最少年，名高先达冠三边”。这位刚满二十一岁的湘西才子，一时誉满三湘。中举的第二年（一八九二），他又入京会试，连捷，以第六十五名中式贡士。按清代典制，会试放榜后一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点定一、二、三名，区分一、二、三甲等第。殿试对策，理应按内容评骘高下，但实则积习相沿，专重书法。时张亨嘉在京，他看到熊希龄书法尚不合殿试格局，恐致挂误，因而嘱他暂时不要应殿试，先住在北京一个庙里练练书法再说。

此期间熊希龄得以与廖氏完婚。直到一八九四年，他才去应补殿试，中了进士，名列第二甲第六十三名。朝考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熊希龄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少年科第，春风得意，成为湘西凤凰这个偏僻山区的第一位玉堂金马人物。不幸他的元配廖氏在婚后的第二年（一八九五）突然病逝，业师朱其懿惜才如命，遂将同父异母的幼妹朱其慧许配给他为继室，昔日的师生，从此结为郎舅，传为美谈。

二、跨入维新运动行列

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将中国推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深渊。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志士，提出了变法主张，一时维新思潮大盛。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的熊希龄，有感于民族危机的刺激与新思潮的启迪，遂由湖北返湘，思欲有所作为。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等地开展各种活动，于是，怀抱经国济世大志、亟待脱颖而出的熊希龄，迅即跨入维新运动的行列。他多方筹议设立学堂、创办报纸，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的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于是聘请梁启超来学堂充任中文总教习。同时组织“南学会”，延请经学大师皮鹿门（锡瑞）先生主讲。熊偕谭嗣同、唐才常等任议事会友，负责议定会中事务，制订章则。又创刊《湘报》，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职旨。《湘报》推唐才常任主编，熊与谭、唐等八人为董事。其他如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会社，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和制订保卫局章程，以及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熊均参与筹划。

但是，湖南的维新运动，一开始不久就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破坏。熊希龄作为湖南维新的主要倡导人之一，又深得陈宝箴信赖，便成为顽固派攻击的主要对象。当时顽固派作了一副对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前者讽熊，后者诋陈。南学会皮鹿门先生讲学时，熊希龄亲自为这位年近五旬的老先生摇铃上课，顽固派人士叶德辉又作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虽是谩骂，却使有识之士警策到当时新旧斗争之烈。

那时湖南有岳麓、城南、求忠等书院，皆为顽固派把持。新政凡有举措，无不砌词反对。或为揭帖榜语逆嚮，或聚众滋闹，扰乱秩序，终使新政受阻。梁启超在湘难以立足，熊希龄亦被迫辞去了时务学堂总理职。一八九八年八月，清廷电召江标，熊希龄入京陛见。熊正想趁此机会离开湖南，参与北京的变法活动，只因父亲在衡阳编练水师，启程前须先去衡阳与父亲辞行，于是推延了北上的时口。不料在去衡阳的道上，他突然因饮食失慎，骤发痢疾，竟大病卧床不起。“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也许正是这场大病救他一命。九月，戊戌政变作，在北京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被指为康梁党徒，幸未入京，仅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至此，湖南的新政，皆被顽固势力摧毁。熊希龄只好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从一八九八年秋至一九〇二年夏，他被迫蛰伏四年。

三、在“严加管束”的日子里

熊希龄自戊戌革职回家后，终日侍奉两亲，闭户读书，不闻时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〇〇年，以唐才常谋自立军起义一案，熊希龄因与维新党人曾相往还，亦受到牵连。顽固派欲借是案置希龄于死地，嗾使湘抚俞廉三密令辰沅道捕之。友人闻风急告熊希龄出走，熊希龄彷徨无措，入室对朱其慧说：“一身何足惜，其如父母何？走为老亲累，何以为人子！”就正襟坐在外屋里，以待緹骑。幸得内兄朱其懿苦心营救，方免去株连。

一九〇二年，朱其懿调任常德知府。为了不使熊希龄感到寂寞，他在常德设了一个西路师范讲习所，请他出来帮办学务。他倾全力帮助朱其懿主持西路学务，未久，又帮助朱其懿开办了西路师范学堂，并于一九〇三年，联合常德、桃源、汉寿、沅江四县，开办了常德府中学。当时就学青年，多为湘西

隽秀，如宋教仁、覃振、蒋翊武、刘复基等等，风声所播，人文蔚起。熊希龄对于发展湘西的教育事业，起了很大作用。一九〇三年初，赵尔巽担任湖南巡抚，访知熊希龄在常德办学有成，觉得这位湘西才子废弃可惜，就特地为他上了清廷一折，折上说：“熊希龄自获谴以后，闭门思过，德性与学问并进，恳请免除严加管束的处分，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清廷准其所请。这样，熊希龄得以解脱“严加管束”处分，获得了政治自由。赵尔巽仅令他担任西路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据说，赵尔巽不让这位新上任的学堂监督教国文和历史，只许他担任体操教习，一则熊希龄出自将门之家，曾在湖北帮办过军务，有军事体操方面的本领，再则便是赵尔巽怕熊希龄教国文和历史时言论上或有疏忽，被顽固派人士抓到把柄而又兴风作浪，对其不利。平心而论，赵这样做还是为了保护他的。

办了几年学务，固然有所成效，但在熊希龄看来，这并不是他认定的当务之急。他在写给他的同年汪康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饱经阅历，实见国民程度太低，非专制不足以变法，而国是不定，政体不立，一切学校教科不能确定方针，如为教育，实无所益，以此决意专注实业。”他开始把实业看得比教育更重要了。一九〇四年夏末，熊希龄东渡日本，打算对日本的实业和工艺作一番考察。到了东京，除了向老朋友梁启超请教外，也经常与黄兴、宋教仁、杨度等人见面。他去了日本北海道及其它一些地方，考察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工业振兴的缘由本末，以及日本工业的各项具体设施，作了十分详细的记录，以备借镜。回国后，他先在本府沅州提倡实业，捐出自己的住宅，设立务实学堂，培养实业人才；又以东洋瓷器美观，广销国际市场，而本省醴陵瓷业历史虽久，制造上却低劣粗放，以致蹶而不振，日趋衰落。于是亲自到醴陵作了实地考

察，发现磁土产地沔山等处土质甚佳，只要改革窑式和釉药，掌握先进技术，就有可能生产出很好的细瓷来。为此，他联合醴绅，请湘抚拨库银开办瓷业学堂，聘请日人为技师，改革和创兴醴陵瓷业。并且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措施。醴陵之所以有细瓷，以至于醴陵的细瓷在后来能扬名天下，于一九一〇年参加南洋劝业会赛会 and 一九一四年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并获优等奖牌，实得力于当年熊希龄经营筹划。此外，熊希龄还联合湘绅创办华昌矿务公司，用以开发湖南矿产。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间，是熊希龄在湘省从事实业活动的炽盛时期，他的努力和建树，使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湖南近代实业开发和创办的先驱人物之一。

由于熊希龄在湖南实业上做出了成绩，赵尔巽抓住时机，打算为他开脱另一个处分并加以提拔。一九〇五年，赵尔巽擢升盛京将军，甫经奉命即上清廷一折：“庶吉士熊希龄请加恩免其永不叙用，发往奉天差遣委用。”但随即熊希龄又被奉命进京的湖南巡抚端方所看中，极力保荐他充当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的随员，任二等参赞官。自此之后，熊希龄的政治桎梏得以全部解脱，而且开复了官职。

四、出洋考察与立宪活动

随五大臣出洋，这对于熊希龄来说是一件极为光彩的事情。因为五大臣的随员都是以具有新思想和知识而入选的。但是熊希龄忽然想到，五大臣此行出洋是挂名考察宪政，自忖自己前此所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多在教育与实业方面，对于宪政的了解还极有限。为此他向戴鸿慈、端方等人建议：“我们出洋考查政治，时间如此局促，不易收集到东西各国的政情资料。即使收集了资料，各国国情不尽与我国相适合，一时也难于整理就绪。依我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位平日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

家，叫他先打个底稿，我们回国后加以整理、补充，以之上报朝廷，似乎方便得多。”五大臣甚以为是，要熊代觅枪手。

熊希龄心目中的宪政专家有两个人，一是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清廷所通缉的重犯，熊不敢直接去找他。杨度则比较适合，于是他去东京时找到杨度，半开玩笑地说：“哲子，你的机会到了，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一无所知，请你执笔写几篇宪政文章，五大臣做你的外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将来朝廷立宪，就等于你的抱负发挥了，这是不朽的功名！”杨度为之动容。但杨度自知对宪政的理解还不及梁启超，于是又把枪手的责任分出一半给梁，请梁写《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自己则写《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

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五大臣一行先后游历了日、美、英、法、德、俄及欧洲其他诸国。熊希龄无心随这帮大臣和随员们去游赏海外的繁华闹市和奇花异景，他仅仅随同到了美国，就重返日本，等待梁、杨的宪政文章脱稿。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五大臣一行先到达上海。二十五日，熊希龄由奉天抵沪。枪手的文章到了，八月二日，出洋一行启程回京。回京后，大臣们对梁、杨的文章加以整理，便成了立宪奏折。经御前会议讨论通过，清廷下达了预备立宪的诏书。熊希龄以此行出洋有功，由戴鸿慈、端方奏保以道员銜分省补用，记名为四川补用道。

熊希龄的出洋，既帮了五大臣的忙，也帮助了梁启超等一批流寓海外的立宪派人士。并且消除了此二者之间的隔膜，使之产生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关系。戴鸿慈任法部尚书时，曾就法部与大理院之间的关系向梁启超请教。而梁启超则通过熊希龄作为桥梁，依靠清朝大臣们的暗中赞助和支持，开展了立宪活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熊希龄去日本调查浚河工程及商务，

借便至神户同梁启超谈论了三天三夜，讨论了组建立宪党的问题。交谈之中，熊希龄认为这个党的名称宜称作“帝国立宪会”，梁启超表示同意，而在国内则称“宪政会”。“宪政会”由梁启超、杨度、蔡智由、徐佛苏等署名发起，暂不设会长，虚席以待康有为。先在东京成立，然后本部迁至上海，举干事长主持，拟推杨度担任。熊希龄不出名，以便进行活动。回国后，熊希龄进行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允作该会的暗中赞助人。熊还打算运动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在筹款的问题上，熊希龄允筹十五万两，以五万办《北京报》，以十万作为会中的基金。这十五万两中的半数袁世凯、端方和赵尔巽所出。由此可见，在国内设立宪政会，其决策和筹款的核心人物是熊希龄。梁启超的立宪计划，是通过熊的帮助和配合来实现的。一九〇七年，宪政会成立，但名称改为政闻社。熊对该社的成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政闻社成立后，熊仍是以秘密身份参与活动的。梁启超曾写信给康有为说：“政闻社事万乞勿牵合秉公，否则令彼一步不可行，至为可虑。”为此，熊以代名文福兴与梁通信。但是后来梁启超忘记了自己所说的话。他以熊希龄近年来经济收入不错，又与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人关系密切，筹款和处理人事关系均较便利，拟请熊出面在武汉办一《江汉公报》和一法政大学，曰《江汉公学》，这无异是将熊希龄的身份公开暴露出来，熊希龄当然不会同意。刚好此时杨度另立宪政公会，与政闻社竞争，在武汉争夺舆论阵地甚为激烈。熊与杨度素来交往深厚，自然也不愿意转入到他们两派争斗的漩涡中去，所以办《江汉日报》和《江汉公学》事，以困难甚多而未能实现。

五、从实业家到理财能手

熊希龄随五大臣出洋回国，被授以分省补用道，虽记名四川，却是个候补官员。清廷还没有将他正式放到一个地方去担任实职。但以他的才具，一时竟成为内外大臣竞相延揽的对象。当然谁再也无法将他从盛京将军赵尔巽手中夺去了。赵尔巽两度解脱熊希龄的政治桎梏，对他恩重如山。熊希龄知恩图报，又正值赵尔巽抢先奏调他去奉天参赞军幕，他只好应命。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熊希龄到达奉天。赵尔巽委任他担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住在赵的将军衙门。其时，熊希龄已将家眷迁至上海居住。

赵尔巽调熊希龄到奉天，实际上是请熊帮他办理新政。赵尔巽有一个关于奉天农工商局振兴实业的大纲，这个大纲是熊希龄以自己游历欧美两洲的考察和精研所得，结合奉天的实际情形，从八个方面提出的规划和设施。洋洋数千言，表现了他在实业方面的精明强干。随即熊希龄又草拟成奉天农工商局应兴应改事宜清折，制订出奉天农工商局大概章程，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除了振兴实业，熊希龄又根据日本北海道移民垦植的经验和作法，提出了移民开垦满州以求振兴农业的具体方案。他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

鉴于奉天商务一直萎靡不振，熊希龄专门就上海与营口之间的商务做了调查，洞悉病源所在，然后提出“振兴商务，对华商减轻厘税，用补助、保护的办 法，扶其成立，轻其成本，用以抵制外货，与列国竞争”的意见。并且，熊希龄还上了赵尔巽一个呈折，请设立环球通讯社，出版洋文杂志。此外，熊希龄条陈了整理奉天财政、林政、开浚辽河、设立各类学堂及其东三省善后的种种办法，很有一番弃旧图新的气概。

在奉天约莫一年，适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调任为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由徐世昌担任。赵不愿赴川，正在周折之中。面对人事关系的变化，使熊希龄感到留奉不便。正好署江苏巡抚陈启泰极力奏调熊希龄到苏，熊便趁机去了江苏。当时端方担任两江总督，他知道熊希龄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熊一到苏，他竟与陈启泰争相委用。结果陈启泰委熊担任江苏农工商总局总办，兼苏属咨议局会办；而端方则委熊担任督署总文案，兼宁属咨议局总办，还命他办理南洋印刷官厂。兼差之多，为同时候补缺官员所艳羡。此时，熊希龄可谓红极一时！他不仅身兼五职，奔走宁苏各地，而且他还在参与当地绅士曹典初等筹办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还兼顾着湖南醴陵瓷业公司的许多具体事项。一年四季，碌碌道途，极少回家居住。他的那种兴利除弊、振作创新的抱负，勇于任事，通权达变的才干，为同时人所折服。故当时任安徽学政的沈曾植与梁启超谈论当世人物时，认为熊希龄是“并世无两”的人才。

然而，熊希龄毕竟没有三头六臂，他终于忙不过来了，不得不请求陈启泰和端方免掉几个职务。可是陈启泰在他的辞呈上批道：“该道才可兼人，故资臂助。毋再固辞。”端方的批文说：“南洋印刷官厂开办伊始，该道谊无可辞。至咨议局筹办处为本省舆论汇归之地，逐年筹备各事，于宪政前途大有关系，如该道开通练达之才赞襄其间，尤不可少。其本署文案系赞助本部堂综理三省政务，咨询参酌，倚赖至深。以上各项差使，该道仍应照常视事，尽心擘画，均不得稍涉推诿。”就这样，熊希龄在江苏一直奔波了二年。直到一九〇九年春，度支部尚书载泽因为二年前收到熊希龄上他的一个《论财政书》的呈折，深为熊希龄折中所陈述的八条整理财政的意见所叹服，值清廷清理财政，于是奏请清廷赏给熊希龄四品卿衔，派充东

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至此，熊已身负重任，端方与陈启泰亦不敢再留，只好让他打移交。

一九〇九年六月，熊希龄来到奉天履任，开始做清理财政方面的工作。一九一〇年，湖广总督瑞澂奏保他简任湖北交涉使，熊基于在江苏的教训，未赴任。是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兼任督办全国盐务大臣，便又奏保熊希龄担任奉天盐运使，仍兼正监理官。这样，熊又得以经手做盐政方面的工作。一九一一年，赵尔巽由川督回任东三省总督，委任熊希龄兼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和奉天造币厂总办。三年之间，熊希龄经历了财政、盐运、制币等多方面的训练，从一个引人瞩目的实业家又变成了名重一时的理财能手。

六、拥戴共和与出任财政总长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清朝专制被推倒了。面对这一新的形势，熊希龄也开始了他从主张立宪到拥戴共和的转变。

武昌起义发生后，熊希龄尚在奉天任事。当时清廷将东三省定为陪都。赵尔巽作为清廷的遗老，一时不愿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而转向共和。他的手下还有雄厚的巡防军实力，其中有四大军事统领，欲拥戴他为勤王军统帅，并且还欲推举熊希龄为勤王军营务处总办。熊希龄坚辞不就，借口回乡探母，先往营口，转大连候轮南下。他的行踪和意向被一位名叫赵曰生的幕友探知后，急往告赵尔巽。赵尔巽说：“吾虽旗籍，实为汉军，决不与汉人为难。秉三欲往南，吾亦赞成，四统领之意，吾已制止。但秉三经手事多，为谋安定东三省，而免糜乱，亟须秉三回沈办理交代，来清去白，决不至再强其勤王也。”赵曰生驰赴大连，转述赵尔巽所云。希龄喟然长叹：“吾负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矣，归当请死。”于是即行回奉办理经手诸

事，至于事讫。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熊希龄离开赵尔巽来到上海。有人问他为何离开，他答称：“吾尝以策干赵尔巽，赵不从，则是居与不居等也，故辞归耳。”在上海，熊会见了黄兴、宋教仁等人，表示拥护共和。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正会长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学济以次一百五十人，致电袁世凯说：“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主而战，实有悖民意。”“满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实无再为君主之资格，必须迅速避让，免致涂炭生灵……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清明诏退位，勿误大局，天下幸甚。”熊希龄能够在武昌起义后离开清廷，离开两度为他解脱政治桎梏、破格擢用的赵尔巽，毅然转向共和，史家以为毕竟是识时务、顺民心、全大节的爱国义举。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黄兴拟推熊希龄担任临时政府的财政总长，因孙中山已推陈锦涛担任，故未成。三日，熊希龄加入章太炎等倡首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三月二日，中华民国联合会上海开全体会议，议决更名统一党，选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五人为理事。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权位后，即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深悉熊希龄善于理财，便邀熊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熊力辞五次，未获允许。遂写信对唐绍仪讲了一个条件：“俟到北京后，条陈政见，请开阁议，如不能通过所拟之政策，即随时准其辞退。”唐复函：“当遵示办理。”于是，熊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九日在上海就职。

既经接手财政，熊希龄便集中精力谋求解脱财政所面临的匮乏困境。而要济燃眉之急，就不得不多方与英、美、法、德、日、俄六国银行团磋商贷款。五月十四日，熊与银行团议

定了第一批贷款，数目为一千二百余万两，缓和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却因为借款条件上开列了“银行团与财政部各派一人为核算员，稽核贷款支付的用途”一项，一时招至舆论哗然，群起反对。黄兴亦来电切责。熊于是向唐绍仪提出辞职。随后各方继续抵制借款，黄兴倡议募集国民捐，拒借外债。熊于是又引咎求退。至六月中旬，唐绍仪因袁世凯发布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军宣抚使的命令未经内阁副署，愤而离京赴津。熊因辞职未经允准，又有共和党代表劝勉继续任事，故仍与银行团磋议。终以条件太苛，停议。至七月十四日，袁世凯批准熊希龄辞职。

熊希龄从正式受命到辞去财政总长仅三个多月，他所干的事情主要是筹措军饷、磋商借款。其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需款孔殷，银行团贷款条件太苛，各方诘责指为卖国；袁世凯专断掣肘，偶不遂意，即一意孤行。因此，熊希龄处处都感到棘手，无法施展他那“理财能手”的才干，最后只好带着郁郁负气的情绪离开了内阁。

七、组织“人才内阁”

熊希龄辞去财政总长后，袁世凯任命他当热河都统。一九一二年二月下旬，他到热河就职。在热河约四个月，曾筹划热河建省、修筑铁路和修葺避暑山庄等要政。

热河是清朝的避暑山庄，存放着许多清宫故物。熊在职期间，曾延聘清朝知名人士连同本籍绅士设立行宫古物整理清查委员会，编列号码分别保藏。并会同装运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这一件事，后来引起了一些麻烦。

一九一二年五月八日，熊希龄以自己在热河身任军职，宣布脱离前此他所加入的共和党，但不久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还是将他选为名誉理事。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追查凶手，牵涉到内阁总理赵秉钧，袁世凯不能避其嫌。真相大白后，国民党与袁世凯剑拔弩张，于是发生了“二次革命”。刚成立不久的进步党站在袁世凯一边，“促令政府迅速戡乱”。故袁世凯在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后，欲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乃利用进步党组阁。进步党的领袖本是梁启超，可是袁世凯对梁存有戒心，怕梁一旦组阁后像宋教仁那样，挟持进步党的国会议员的多数，不利于己，于是他就选择了与进步党有点关系，而又可以控制的熊希龄出来组阁。当然熊希龄是不愿意轻易就职的，他曾三番两次地力辞，其中有一辞电这样说：“今日以浅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之社会，虽有孔子复生，无从为力。拟俟边局稍定，即归营社会实业之事，不愿与闻政治，并望总统致此世于郅治，龄得享共和幸福。”袁复电说：“纵不能如孔子之期月已可，亦当念孟子之舍我其谁。想公弘毅，常勉是言。余虽不能冥忘世事，但若孤立无助，我将先公归甲……，公即不忍就职，望来京一行，计议大局。”熊推辞不了，只好从热河到北京。

经国会通过，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熊就任总理职。熊原想把自己的内阁组成一个全国第一流的“人才内阁”。袁世凯对于内阁中的财政、陆军、海军、外交、内政、交通几个部门都不放手，夹袋中另有人选，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三个部给熊支配。结果财政总长由熊希龄自兼，请梁启超长司法。熊请老友杨度入阁长教育，对杨度说：“请哲子帮帮忙，屈教育总长如何？”杨度冷冷地说：“我吗，是帮忙不帮闲！”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一日，熊希龄的“人才内阁”草草组成，这个内阁当中有梁启超、张謇、汪大燮，加上熊希龄本人，也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名流内阁了。

熊内阁组成后，倒是有心要干一番大事业，发表了洋洋洒

洒的《大政方针宣言》，可是，他们的这些计划和设想，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袁世凯之所以命熊希龄出组内阁，并非看重这个内阁的经纶大才，而是利用进步党人去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实无推行民主政治的念头。袁世凯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想利用熊希龄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从而为他扫除专制独裁道路上的障碍。当然，这一手是不容易达到的，于是沉毅狡悍的袁世凯便将所谓“热河行宫盗宝”案作为王牌打出来，说是熊希龄担任热河都统时，曾经盗窃了热河行宫中的宝物。一时引得舆论哗然。袁世凯专门派了前司法总长许世英去热河调查。许调查回来说果有此事，写了材料向袁世凯呈报。

十一月三日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谒袁，其实这都是预先布置好的。袁让熊到他的办公室里稍候。熊入室，空无一人，见袁的桌上放着许世英查报热河宫物指控熊希龄的呈折，熊一见顿时脸色苍白，神态极为不安。袁世凯进来，故意关切地问：“秉三，为什么脸色这样难看？”熊搪塞了几句，就诚惶诚恐地问有何指示。袁恳切地说：“内阁的事，一定要请秉三先生勉为其难。”一边说，一边走到书桌前，将那个呈折撕得粉碎，扔入纸篓，连声说：“笑话，笑话。”接着袁世凯就对熊希龄谈起了国事不好向前推进，凡事都因国民党故意刁难，令人痛心。他的意见，决计将国民党解散，取消其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问熊希龄意见如何？熊当此情势之下，内心有所恐惧，迫于袁的威慑，只好任其摆布。袁立即将已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摆出，熊俯首在上面签字副署。署毕，袁立即又传令已预先在邻屋里等候的阁员们一个个进来签署。次日（十一月四日），袁世凯就颁布了解散国民党的命令。由于解散了国民党，取消了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遂造成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的局面，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袁世凯又颁发了解散国会的命令，

亦经熊希龄副署。

熊希龄受袁世凯挟制，在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这是他终身不可告人的憾事。袁世凯既经达到目的，觉得熊希龄这个内阁总理是多余的了，便决心赶他下台。起先他是用“热河宫物盗宝”案逼熊就范的，赶熊下台依然用这个绝招。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群强报》第二版《国事要闻》栏内，公然披露熊希龄在热河都统任内盗窃前清行宫内的古瓷器、书画二百余件，并称：“现被世续查明，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堂堂的国务总理居然与盗宝案有关，报纸竟不给情面，其后台是谁呢？当时熊希龄很生气，函请内务部转知检查厅查究此事。然检查厅竟在信上批了八个字：“飭具诉状，原件却回。”对现任总理胆敢如此，除了袁世凯的授意谁能如此胆大！当此之下，熊希龄便只好辞职下台了。一九一四年二月六日熊上辞呈，九日被免了财政总长，十二日免除国务总理。

八、护国运动中的湘西宣慰使

熊希龄卸国务总理职后，一九一四年三月三日，由袁世凯任命为“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此时，袁正一心一意搞帝制复辟，并没有探测开发石油的心思，故荏苒经年，所谓勘探煤油一事，无非虚应故事，实无成效。而政局杌隳、帝制复辟的逆浪逐日暴涨。熊希龄知事无可为，于一九一五年八月请假返湘省亲。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随后就演出了帝制自为的闹剧。

熊希龄请假回乡之后，袁世凯害怕失去对这位前任国务总理的控制，对他推行帝制复辟不利，便屡次电催熊返京销假。熊因其家室在京已遭监视，虽一再延宕，也不得不首途北上，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抵达北京。时护国战争已经打响，熊

在京与袁虚与委蛇，不满一月，又以老母由家乡避难至汉口为由，于三月八日再次出京南下。袁当然知道这是熊的“脱身之计”。不许熊带家室离京，另又给熊一个指令，要他乘便赴沪，向梁、蔡方面疏通意见。熊出京之后，并未去上海，他给袁世凯拍了一个电报，说：“党人意志坚决，无可调和，请速定大计，沪行已决计作罢。”三月十一日，袁突然任命熊希龄担任湘西宣慰使，次日，由财政部拨给熊希龄活动经费现款六万元，任其所用。几乎难隔几天，便有袁世凯发来的电报，催其进京，内容大抵为：请熊来京备询要政，组织内阁问题，仍责成熊希龄担任；解决南中兵事问题，尚有征其意见之处，如此等等。

熊希龄已经吃够了袁世凯的苦头，他不愿再上当了。既然袁世凯命他做湘西宣慰使，他就逃往湘西而去。住常德，并设宣慰使署于常德青阳阁李雨田家。他是想借此机会保护桑梓，避免家乡遭受北军的破坏。当时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北军在湖南、四川均告失利，熊以大势所趋，遂暗示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在湘西宣布独立。

一九一六年四月上旬，袁世凯又来电促熊返京。熊电告说自己病了，不能启行，现住常德。再电催促，熊便提出辞职。四月下旬，熊从湖南来到天津住宅。袁闻知即派专车迎熊入京，意在请熊出面调和南北局势。熊留津不行，上书袁世凯坚请辞去所有一切任职（即煤油督办、参政院参政、湘西宣慰使），并电劝袁世凯为大局计，当宜极早引退。直到袁世凯死后，熊方由津返京。随即力请恢复民元《约法》，表明他始终维护共和国的立场。

九、期成和平与联邦政治

袁世凯败灭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沌的政治局面。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命熊希龄任北洋政府平政院长，熊辞而不受。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拥幼帝溥仪复辟，熊多次发电声讨，不旋踵而张勋逆谋破灭。冯国璋又继黎元洪而任大总统。

冯国璋任职期间，有冯（国璋）、段（琪瑞）府院之争，直、皖两系矛盾激烈。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一手遮天，日无余子”，步袁世凯后尘，不仅摧毁了民国《临时约法》和旧国会，而且提出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发动了护法运动。盘踞在南方各省的军阀，也汇集在护法的旗帜之下，借以抵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于是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军阀的连年混战，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熊希龄本着消弭战祸夙愿，多方斡旋，调停南北战事。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偕蔡元培、张謇等二十四位名流，联衔宣告成立南北和平期成会，呼吁止戈息兵，实现和平统一。十一月三日，和平期成会在北京成立，熊希龄、蔡元培被举为正、副会长。此后，熊希龄便南北奔走，苦口婆心地对军阀们实行劝告。终于，他们“期成”了一九一九年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可是在这次会上，南北双方仍然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和会”终以不和而散，南北双方仍然兵戎相见，熊希龄期成南北和平的愿望算是成了泡影。

既然南北统一无望，熊希龄便继续坚持着他一九一八年初就提出来的联邦制的政治主张。他的联邦制主张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打破武人专政，划清国、省权限，实行军民分治，这是实行联邦政治的前提和条件；第二，确立全国各地的海陆军由中央统一指挥调度，由中央统一下令，将全国分成大小若干军区，脱离省治，全国各省均设省长管理行政，军队不干预地方；第三，组织联邦会议，制定联邦宪法。熊希龄提出这一主张的动机和愿望无疑是良好的，它用以抵制北洋军阀的

黑暗统治，废除武人专政，使地方和人民得以享有较多的民主和自由，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他的主张既然是以打破武人专政为前提，而当时他又没有找到打破武人专政的一种力量，因此他的这个愿望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反之，谭延闿和西南各省的军阀则利用他的这套理论和主张，上演了一场“联省自治”的活剧，这也是熊希龄始料所不及的了。

十、造福于社会 and 人群

熊希龄自涉足宦海和政坛以来，几度浮沉，历经炎凉，有说不完的感受和体验。渐渐地，他对政界的生活感到厌倦，决心多为社会和人们做点实际的有益的事情。

一九一七年八月，京畿直隶一带发生大水，水患成灾，受灾一百〇三县，田亩二十五万余顷被淹，灾民逾六百万人。九月，冯国璋任命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奉命后，熊希龄不辞辛劳，致力于抚辑流亡、赈济饥溺、浚河修堤、平复耕地，京畿、直隶灾区活人无数。这是他对于北方社会和人民的最大贡献，也是他造福于社会 and 人群，从事社救、慈善事业的开始。

在从事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过程中，熊希龄得知被灾区域留下许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儿意，于是在各县设留养所一百七十处，留养人数近四万。又专门在北京设立了慈幼局，收养儿童千余名。这就是驰名一时的香山慈幼院的嚆矢。

京畿、直隶水患平后，所收养儿童大部分由家长认领回籍，余下无人认领者尚有二百余名。熊于是请求大总统徐世昌向前清内务府商洽指拨已废弃的行宫香山静宜园为基址，建立慈幼院，收留上述无人认领的儿意，另接收北京贫苦旗、汉儿童五百余人。一九二〇年十月，香山慈幼院成立，熊自任院长。

香山慈幼院的主旨在济贫抚孤，属慈善性质。办理一年

后，感到贫苦儿童中天资聪颖者大有人在，于是决定改变方针，以施以教育，造就人才为主。从幼稚园起，次第设立小学、师范，还准备设立中学和大学（以经费困难未成）。凡经慈幼院收留的儿童，从襁褓起即施以教育，从婴儿园升幼稚园，进入小学后，满十二岁即安排到农工实习场从事农业和手工劳作，半工半读。高小毕业，大多数分发到农工各场当徒工，计工授食，满三年后技艺精熟，即毕业出院独立谋生，一部分入幼稚师范，少数学业优异者，可资助入中学。不论院内院外孤贫学生，可给以贷款升入大学，毕业后分期偿还。香山慈幼院当时被称作孤苦儿童的幸福乐园，它的影响及于国外。

除办香山慈幼院外，熊希龄还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和人们的事情。综计他从督办京畿河工善后事宜起，历任的各种社会救济、慈善福利和教育事业等机构的职务有：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天津红十字会名誉会董、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临时正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社长、水灾筹赈会会长，湘灾筹赈会名誉会长、永定河工督办、北五省赈灾委员、陕甘赈灾委员、全国赈务委员、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组织华南救济队赴闽、浙救济难民，赴爪哇出席国际禁贩妇孺会议。此外，还曾倡办湖南义赈会、临时妇孺救济会，与西人合办华洋义赈会、赞助西伯利亚大饥荒国际赈灾等等。

熊希龄后半生把相当一部分心力倾注在济贫施教、改良社会的事业上，表现了他同情贫苦大众，期望教育普及、社会进步、民安物阜、国富民强的心愿，是十分可贵的。

十一、晚节可风

熊希龄晚年更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是他爱祖国爱民族的浩然正气。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激发了熊希龄强烈的

反对帝国主义凌辱中国人民的义愤。他曾倡首发起“沪案失业同胞救恤会”，于六月十三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成立会。二十五日，“救恤会”约各界群集天安门，设台陈列沪案死难诸烈士灵位，由熊希龄主祭，追悼死难者，会后结队游行，队伍达十万人，形成了一次反帝爱国的宣传运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熊希龄与朱庆澜等人组织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十二月致电张学良、冯玉祥各将领，请坚持抗日、挽救国难。电文中说：“愿诸公立赋同仇，联集战线，正当防卫，拼死抗争，以护我疆土，以保我民族人格，本会誓为后盾。”是月杪，熊希龄又组织湖南国难救济会，并领衔发表主张抗战的宣言书。次年一月十日，熊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宣传抗日，不禁声泪俱下。十三日，他又与马良（马相伯）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指责中央政府在“大敌当前之下，不急起抗战，反而‘散处雍容、视同秦越’，要求他们‘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战事发生，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国民军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奋起抵抗，熊希龄感佩系之，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致电称颂和鼓励：“贵军将士为国家保领土，为民族争人格，奋起杀敌，捐躯赴死，极深敬佩。希龄拟集社会资力，共商抚恤遗族办法。凡殉难将士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无力赡养者，均为设法照料。其无父母之子女，则尽并入各慈幼院及其他孤儿院为之教养，以慰忠魂，而励将士。尚乞转告前敌将士，力撼强敌，保卫疆土，其所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抚恤，均为国人后死者之责，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

为了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支援前线，二月十二日，熊希

龄又发布了《香山慈幼院通告》，开展了全院性的抗日救国总动员。《通告》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沪上国军捐躯赴敌，敌方压迫，增援不已。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吾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日也。空言愤激，无济于事，实际工作，端在此时。吾人须知不走死路，决无生路。必有少数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大多数人之能生。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荣辱之间，有如反掌，虽然，徒以效死望人，而已身不为之先，是懦夫也。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机，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之总动员；于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余一家救国总动员。兹以决定办法，次第告之，尔曹其各遵照办理可也。”这段文字，洋溢着献身救国、效死当先的爱国激情。在《通告》里，他分别安排了自己一家动员的具体作法，组织院内师生二百人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女生则加入红十字救护队，往战区医院帮同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熊希龄由天津地方协会推为代表，专程赴上海，与上海市商会等有关方面洽商援助东北义勇军事项，并赴南京访国民党要人，敦促切实抗日救亡。四月，他利用北平红十字会的力量，设北平第一后方医院，救护受伤抗战官兵，又设公墓收葬抗战阵亡军民。这时，日军于侵占热河承德后，进犯长城，我军民亟起抵抗，激战于古北口、石匣、喜峰口等地。熊希龄携长女熊芷一行，组成救护队，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在古北口、石匣等地，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老人，臂缠红十字袖章，朔风吹拂着白髯，仍形态矍铄，出没于负伤军民之中。

一九三七年夏，熊希龄到青岛，主持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的工作。筹备事毕，而“七七”事变发生，已无法

北返，于七月二十一日乘轮赴沪。八月十三日，日军进犯上海，友人劝熊离沪远避，熊感到“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良心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会同人从事救护工作”。一月有余，计设立临时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处，共救出伤兵千余人，难民十五万余人。在战火纷飞中尽瘁救护，只因医院太少，伤兵太多，未能尽量使之全活，熊希龄为此感到愧疚。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上海、南京先后沦陷，熊避居上海租界，亦为敌骚扰，使他感到精神异常痛苦。而长江航运已断，遂于十二月十六日乘轮去香港，拟绕道广州返湘。十八日抵港，因劳累和起居不适，二十五日突然脑溢血，不治逝世，终年六十七岁，葬于香港。

一代名医易南坡

易肃如*

易南坡，字逊叔，湖南浏阳县人，生于一八八二年，卒于一九六六年，享年八十四岁，是著名的小儿科医生和中医教育家。

南坡医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后去京、沪等地，参加了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系湖南同志会会员。民国建立后，回长沙行医，达五十余年。解放前，历任湖南国医馆副馆长，湖南省政府医药顾问等职。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医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医工作，他极为感奋，虽年近古稀，仍积极从事中医活动。一九五二年秋，为整理和发掘祖国医药宝库，曾经撰写了建议书数万言，专程去北京，受到了刘少奇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南坡医生出身贫苦，幼年丧母，十五岁时，即在当地一周姓财主家帮工学徒，周某是个老中医，南坡医生拜他为师，帮工不要工钱，学徒不交学费，老板管饭吃，白天忙于做工，晚间自学医书。他生前回忆少年读书情景时说：“我是从《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本草备要》等启蒙的。那时候的古典医学书籍，既没有标点，也没有注音，全凭借助字典，勤学苦读，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习以为常。”南坡医生还重视书法，他说，“读书人的字是块敲门砖，当医生要开药方，几个字写不好，怎么能行？”他经常躲在楼房练

*易肃如系易南坡之女，现居长沙市。文中内容多系易南坡生前口述。

字，一笔不苟，每次总要写完一杯墨水后才下楼，长年累月，持之以恒，终于练成了一手好字。他自己开的药方，字体端正大方，笔法雄劲有力，看起来象一幅艺术品。

南坡医生在长沙定居后，首先在马家巷一个慈善堂里做医生，坐堂应诊，几年之后，才单独开设诊所，专治儿科疾病，许多危难急症，赖以诊救得生，名噪一时。他对贫苦病家，多作义务治疗，有时分文不取。他常说：“做一个真正的医生，不仅要有精深的医术，更应有高尚的医德。”

南坡医生擅长小儿科，他对宋代医家钱乙的儿科理论，极为推崇。钱氏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更是他终身爱读之书。他认为：小儿系幼稚嫩体，不论是形态上和机能上，都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年龄愈小，发展速度愈快，同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其体格与智慧以及脏腑功能，均将不断趋向完善与成熟。在病理方面，小儿抵抗疾病能力较差，脾胃消化功能较弱，外界病菌感染或饮食不当，均易导致疾病，且变化较大，如治疗和护理失误，则轻病转重，重病转危，甚至造成死亡。在治疗方面，小儿不会说话，医学上称为“哑科”。诊断时，必须特别注意。小儿内外诸病，由火热燥而致者较多，不宜过用补药，也不必过忌寒凉。南坡医生增减化裁，融经方、时方于一炉，独创儿科寒凉一格。常用方剂有大青龙汤，小柴胡汤、导赤散、龙胆泻肝汤等，进行增减化裁之后，用于临床每获奇效。他还精心创制了许多适应小儿疾病的成药。如：“麒麟福”、“肥儿糕”等，质量好，疗效高，售价低，畅销省内外。

一九三〇年，南坡医生自费创办了一所儿童医院，原名南坡儿童医院，后改为湖南儿童专科医院，在当时这是一项可贵的创举。

创建初期，规模不大，地点在仓后街四十六号，南坡医生自任院长，医师有黄碧居、王道农、陈汝贤、刘禹贵等。每日

登门求诊者，络绎不绝。一九三三年又在广东医院旧址筹建住院部。据当时创始人之一王道农医生回忆说：“该址位于南门外回龙山二里牌，南濒小林子冲，北靠大义山，树木丛茂，人烟稀少，仅有三排矮小平房，均破败不堪。南坡医生租得后，随即着手全面整修，筑补围墙，改建房屋，兴修花圃，遍植多种花木，面貌焕然一新。宁静幽雅，空气新鲜，每日凌晨，走出院门，散步、小跑，或打太极拳，或做五禽戏，别有一番情趣。”

儿童专科医院，由董事会组成，所有董事多系省会医界名流。董事会下设办公室、门诊部、住院部、医务室、图书室。病房十大间，病床数十张。那时长沙市小儿专科医院，仅此一家。

医院治疗，以中医中药为主，但也采用一些西医的治疗方法，如使用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表、注射等，特别重视中医理论和业务学习，聘有专门教师授课。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宁乡崔黄山，系南坡医生挚友，善诗文，工书法，长期住在院里，讲授医古文。他对南坡医生热心祖国医药卫生事业，表示由衷敬佩，并写了三首诗以资赞扬。一曰：“素问灵枢本未焚，阴平阳秘久无闻。钟离已往仓公杳，争向南坡访易君。”二曰：“漫疑青主太慈祥，时有和风扇满堂。生性剧怜贫苦病，五更犹为细民忙。”三曰：“血战连年苦乱离，苍茫天意已难知。满目疮痍人心死，安得先生妙手医。”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北方许多名医因避难途经长沙来院参观访问，南坡医生总是热情接待。如北京施今墨大夫，四川任应秋医师，都先后来院小住，并担任过短期门诊工作。

一九三八年秋，日机空袭长沙，医院数处中弹，房屋大部被炸，设备被破坏殆尽，紧接着文夕大火，长沙沦陷，遂告停办。

南坡医生非常重视医学人才的培养。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与吴汉仙、郑守谦等名医，创办了“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校址在长沙市沙河街五十六号，惨淡经营，备极辛劳，南坡医生出力最多。王道农、陈汝贤两位老医生说：“当时创办国医学校，如果缺少南坡老师那份力量，是难以设想的。”学校建成后，由刘岳仑任校长，吴汉仙任副校长，郑守谦任训育主任，易南坡任事务主任。医专本科生修业期限为四年，毕业后，由湖南省卫生处分配到全省各县市卫生院工作或由教育厅分往各公私立学校充当校医。当时国医专科学校是国内少数培养高等中医人才的学校之一。现湖南中医学院教授谭日强、夏度衡以及名医唐构等，都是国医学校的学生。

南坡医生研究中医学术，有他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历代医家各派，每一种学说或每一份成果，都有糟有粗，只是多少程度的不同，没有绝对的精华，也没有绝对的糟粕。在精华的精华中，还可能有糟粕存在；在糟粕的糟粕中，也可能有精华发现。精华与糟粕，同时并存，都要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来判定。他常常告诫我们说：“古代的医学经典著作要认真研究，努力发掘，但决不能使我们的认识，被传统观念所束缚住了。经典的医学理论，即使是正确的成份，也只是人类认识的历史长河中一定阶段的经验总结。”

南坡医生晚年著有《儿科证治》一书，总结了他五十多年的小儿科临床实践经验，不幸毁于十年浩劫，未能刊行于世。

回忆我的伯父杨端六

杨宜福*

—

我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

一九一七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

一九二一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以长袖善舞著称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又后来，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另一位现代会计学的创始人潘序伦博士比他小七岁，从事会计教育的时间迟三年。

杨端六生于一八八五年，今年是他诞生一〇一周年。

* 杨宜福是杨端六的侄女，四十年代初期杨端六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教授时，她在该系读书，对其伯父有较多的了解。现居长沙市。

二

杨端六是我的二伯父，也是我的老师。

我们家原籍江苏苏州，大约在清朝中叶，有一位祖先分发到湖南候补官职，就在长沙落籍了。候补官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以后，家里的人口日多，生计也就渐渐艰难。我父亲这一辈共有兄弟姊妹六人，端六伯行二，他原名杨勉，后易名杨超。由于他是旧历端午节次日生的，故他的母亲给他取名端六。他爱他的母亲，后来就不再用“勉”、“超”等名，而以杨端六名世。

我听到我的祖母和母亲说，端六伯七岁入家塾读书。一九〇〇年，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在一个月內相继去世，家无恒产，剩下一大群孩子，只好分别去投靠亲戚。我大伯去习幕，我父亲去乡下学徒。端六伯与他的表弟俞笏山（峻）考入了有奖学金的、由名儒皮鹿门（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端六伯又转学到完全免费的省师范馆。一九〇三年就在长沙乡下（以后又在浏阳乡下）当小学教员去了。

那时，清政府两湖总督署招收一批留日学生（公费）。湖南有一些名额，他的表弟俞笏山考取了。端六伯则因在乡下教小学，误了考期，但他决心赴日求学。他历来成绩优异，会作文章，人又十分沉静，很得亲戚的器重，故在亲友的资助下于一九〇六年与表弟一同赴日。

据长辈说，那时长沙的风气十分闭塞，对于“飘洋过海”还很神秘，官宦人家并不愿子弟去冒这个风险，考起官费的多是清贫学生，由抚台衙门先付一百两纹银作安家费才有人去，至于自费生，则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了。

端六伯到日本后，先在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宏文学院”学习现代中学课程和外国语。一九〇八年得到清政府驻日本管理留学生机构的批准，补为公费生，

旋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来又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端六伯在国内基本上读完了四书五经，在日本学了中学课程和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这样就能够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东方和西方的事情了。

我虽是他的亲侄女，又在他身边读了四年大学，而且他还是我的系主任、院长，但他很少同我讲这些往事。伯母袁昌英偶尔和我谈起，她说：“你伯伯是一个自学成材的人，一个十分勤奋的人。他读了许多学校，似乎并未从这些学校毕业，主要是自学。”

有一次，伯伯偶然和我讲起他在日本东京读书时，留学生有几千人，形形色色，但他们除了读书，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和他的同学皮宗石、李承干等人秘密地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发生了。参加了同盟会的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回国了。那时，武汉战事方殷。端六伯回到上海和同学们组成了“海军陆战队”，由他担任秘书长。不久，清朝政府退位，这个“陆战队”大约也没有作战，端六伯就因省母回到了长沙老家。

三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峰、陈作新的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相当于后来的厅）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端六伯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

任撰述。

一九一二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多是老同盟会员）办一张反袁报纸，即《国民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松桥，汉寿人）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端六伯任经理，据周鲠生的女儿周如松回忆说：她听见她父亲讲过，在那家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

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国民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国民日报》攻击袁氏尤其不遗余力，袁世凯当然要捕杀这个报纸。袁世凯的亲信通过当时湖北黎元洪政府，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端六伯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一九一三年初到了英国。端六伯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四

伦敦大学是英国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现在有六十多个学院了，政治经济学院是最早设立的一批学院之一。据说她和牛津类似，鼓励学生自学，可以注册入学，也可以不注册。端六伯属于后者。我的堂妹杨静远（端六伯的爱女）在一九八四年去苏格兰讲学，有意寻找她的父母在英国学习的资料，她在她母亲袁昌英求学过的爱丁堡大学，找到了母亲住过的宿舍（Bu-

chanan House) 和注册记录, 但是没有找到她父亲在伦大的注册记录。

端六伯一去七年, 主要在伦敦, 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 生活很清苦。一九一八年大战结束, 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奋。当时在英国的端六伯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 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 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这件事与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种种爱国行为是一致的, 但作为他的侄女, 我从未听他说起过, 而是顾维钧记录在他的回忆录中了。

端六伯到英国时已是二十八岁, 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 在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认识了后来成为我伯母的袁昌英女士。袁昌英比他小十岁, 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 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 也是理财专家, 端六伯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 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 但志趣相似, 由恋爱而订婚, 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 伯父三十六岁, 伯母二十六岁, 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在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 有几对受人艳羡的学人(作家)夫妇。如任鸿隽和陈衡哲, 吴文藻和谢冰心, 陈西滢和凌叔华, 梁思成和林徽音等, 杨端六和袁昌英也是其中一对。

五

端六伯是一九二〇年由英国回国的, 还在英国时, 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 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 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

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hon Dewey）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到达长沙，端六伯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罗素以后的演讲由赵元任先生翻译）。端六伯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即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负责组织接待这个演讲团的单位之一）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同志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我的小姑杨润余回忆：“八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到四达里杨寓，端六兄因筹办武汉大学不在上海寓所，毛泽东同志把我和其他一些湖南学生，送上赴法国的轮船。”毛泽东也没有忘记杨端六，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从延安寄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殷殷问及一些“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旧朋”时，其中就举了杨端六这个名字（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六十八页）。

我在这篇回忆中述说这段往事，并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企图说明，尽管端六伯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二十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联系的。不过这一段经历，

他从未对我讲过，甚至他的儿女，我的堂弟妹们亦不知情，是我最近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的史料后才得知的。

六

一九二六年，端六伯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不久，端六伯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但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受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八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我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

端六伯在上海居住了约十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他的寓所与周鲠生紧邻，我还记得，我父亲当时也在商务当小职员，与伯父住在一起，我母亲因家务事忙，周鲠生伯伯的女儿如松大姐还常常带领着我。但是，直到解放以后，我读鲁迅先生的著作，才从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得知鲁迅夫妇和端六伯夫妇交往的记录，那时我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七

一九三〇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端六伯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

一九三二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

八年。端六伯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一九三〇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我们的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四十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

据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回忆，一九三一年，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二十三人分批地为蒋讲课，端六伯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端六伯去当厅长。端六伯曾对他的女儿说过：“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指武汉大学），不离开讲台（指每期上课教书）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端六伯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是蒋介石政府里唯一没有穿过军装的“上将”。一九三八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

抗战爆发后，端六伯夫妇和他的同事们（例如苏雪林教授）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伯母署名撰文表示毁家纾难的热忱。

一九三七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端六伯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端六伯的家被炸毁，加上国民党政府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

分拮据，过着穷教授的清苦生活。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姊妹先后进入了武大，我和我的堂兄叔湘在经济系，我的妹妹安祥和端六伯女儿静远在外文系，开湖南同乡会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坐在一排，同学们戏称我们为“杨家将”。

可是，伯伯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我是一九四〇年在湖南沅陵福湘中学毕业后参加湖南辰溪区统考考入武大经济系的，叔湘是在安化七星街一中毕业后参加蓝田区统考考入的，两个妹妹也是以优异成绩考入的。解放后他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伯伯是院长，他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我和叔湘是他的直接学生，他对我们的教育与对其他学生一样，从不给我们开“特别餐”。我们系里的同学都很尊敬他。我深深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九四四年六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虚岁），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的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

一九四八年冬，端六伯接受他的同学陈剑脩的一再邀请（陈的前妻是蔡元培的女儿，后妻又是伯母袁昌英在法国的同学）到桂林去讲学。那时妹妹静远刚从美国回来，端六伯夫妇过长沙时曾与小弟弘远在我家小住。一九四九年初静远妹和她的新婚丈夫严国柱也到了桂林。据当时在广西大学读书的表弟俞润泉回忆，端六伯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伯伯和伯母都没有开课，伯伯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

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伯伯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六十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

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

我的堂妹静远说：“解放后，给我父亲第一个印象是人民政府很快地制止了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很快地走上了正轨，他曾经梦想了几十年的事，短时间就实现了。”静远和我谈起她的父亲时还说，这是他转变的基础。因此，他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五十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五十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参加了“民革”组织。一九五七年，袁昌英伯母被错划为右派，伯伯深知伯母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是伯伯素性木讷，无法为她申诉，精神受到刺激。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他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也没有留下骨灰，得年八十一岁。

我今年也有六十五岁了。在杨端六教授诞生一〇一周年的时候，我回忆他的一生，谨述所知，作为对我伯父兼老师的一点纪念。

（俞润泉 郭小余 整理）

附 录：

杨端六著作（不含论文）简目：《信托公司概论》（1922，商务），《货币浅说》（1930，商务），《银行要义》（1930，商务），《中国改造问题》（1930，商务），《商业簿记》（1930，商务），《货币与银行》（1930，商务），《罗素论文集》（1930，商务），《公司概论》（1931，商务），《社会政策》（1931，商务），《六十年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1931, 中央研究院), 《记帐单位论》(1932, 商务),
《现代会计学》(1946, 商务), 《工商组织与管理》(1947,
商务),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1962, 三联书店, 1977年香
港广角镜再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静远提供)

我们所知道的陈嘉勋先生

黄时冀 黄曾甫*

陈嘉勋(1885—1972)字绥荃,湖南湘阴县人。清末早期留学日本,为老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都有交往。归国后,曾在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留学预备班德文班任教,湖大校长胡庶华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陈少怀教育救国之志,为了深造,不久又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毕业后,官费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得政治经济学硕士、数学硕士等学位,与张奚若、马寅初同窗。一次,陈在美参加哥伦比亚中国同学会聚餐,顾维钧发言,口操英语,自我介绍为“威灵顿顾”,并建议聚餐用西餐。陈嘉勋当即发言驳斥曰:“我们在外国,是留学哥伦比亚的中国人,一月难见一、二次面,既是中国同学会,我主张讲中国话,用中国本名,吃中国饭菜。假如讲外国语,用外国名字,吃外国饭菜,那又何必叫中国同学会呢?”陈的发言,博得全场鼓掌,相继发言者皆表示拥护。当时留美同学中,只知他姓陈,湖南人,从此以“湖南陈”呼之。陈自美归国后,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教书,他精通日、英、德、法等国语言文字,商专学生左宗廉、黄鉴泉等生前,犹称道不置。大革命后,湘阴任凯南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恢复文、理、工三科,延陈主持文科工作。后因故离职,陈亦同时离开湖大,赋闲家居。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孙科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黄时冀和黄曾甫系陈嘉勋的侄辈,又同是陈的学生。现居长沙市。黄曾甫为我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问题很多，欲觅陈襄助，因孙与陈曾在哥伦比亚同学，深知其为人，但只知为湖南陈，而不识其名，特派铁道部次长黎照寰来长访问，半月之后，偶遇当年留美同学梁某，梁云：湖南陈的真名，我亦不知，但是他有一哥哥，曾任十四军军长，名陈嘉祐，还有一弟弟，曾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名陈嘉任。黎因之找到长沙北门学宫街陈家，得晤陈嘉勋本人，交付孙科亲笔书信，孙当时仍以“湖南陈”先生称之，陈允先去上海看看。陈为人方正，治教严谨，认为整饬交大，必须先端正学风，乃写出一本计划书，对如何办好交大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内容从严格招生，不准学生出入舞厅、跑马场、赌场，直到上课时学生必须身着制服，每日必须点名，缺课要受惩罚等等。孙科见之，极为赞赏，一一批准，付诸实施。陈乃出任交通大学训育长数年，身体力行，不循情面。例如孙科之子孙治平，曾报考交大，语文成绩太差，陈坚持不予取录。又如邹鲁之子邹樾，曾三次报考交大，方得录取，邹鲁当时亲笔致缄托陈照顾，邹樾亦登门拜访，会见时，陈对邹樾说：“你为何一定要投考交大？”邹答：“交大系著名学府。”陈说：“你父主长中山大学，他可将中大办得和交大一样好，你去考中大，岂不更好。若你父一定要你考交大，岂非宁可误人子弟三千，不愿误自己儿子一个吗？”陈之耿介固执，有如此者。陈自到交大，经过一番整饬之后，人才辈出，如钱学森等人，皆抗战前交大培养之优秀学生。陈当年在上海工作时，孙科使人授意于陈，只要陈去南京晋謁一次蒋介石委员长，即可提名为立法委员，每月开会二次，可得月薪六百八十元光洋。陈笑而谢之曰：“我生成是教书匠的穷命，无功不敢受禄，太子雅爱，敬谢不敏。”（当时人呼孙科为孙太子）时冀当时在旁，亲耳所闻。

上海发生战事后，陈嘉勋离沪返湘，胡庶华延聘之任湖南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长，一度代理校长职务。湖大迁移辰溪后，

一九四二年出刊一本历年校友名册，陈嘉勋主其事，并撰有序言。

建国后，陈应张奚若之邀去北京，张欲延之到外交学会工作，陈感年事已高，婉辞未就。后客居天津子女处，编写《西洋通史》，尚未付梓，遭逢十年浩劫，手稿损失殆尽。

陈嘉勋先生毕生刚正不阿，事无巨细，均秉公处理，毫不循私，今举两件小事为例，可见一斑。时冀在交大工作时，寄住陈家，一日工余，同路回家，行至中途，陈忽说：“我将办公桌上支红兰铅笔放在口袋里带回来了，你先走，我送回铅笔到办公室再回。”又一次陈家保姆托我写封家信，我用交大公用信封写好，陈见之，正言厉色批评我公私不分。并买来空白信纸信封，嘱咐我以后要注意。

陈嘉勋先生是我二人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姑丈。我们就读湖大时，陈老教过我们的西洋史。后来时冀有幸随他在交大工作数年，亲聆教诲，知之更详。陈一生不做官，不要钱，从事教育，数十年如一日，桃李满天下，而自己却两袖清风，从未购置过一间房屋，一亩田地，工作兢兢业业，生活清苦朴素，这是值得我们敬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陈的夫人黄陶白，长沙东乡私立隐储女子师范毕业，是我们的姑母。夫妇相敬如宾，白头偕老，都活到八十多岁，七十年代初才先后在天津去世。陈有五子一女，其幼子陈崇铁，现在天津大学外语系任教（副教授）。去冬将其父母骨灰送回长沙南郊石马铺公墓安葬，湖南大学及长沙校友会闻之，均派人到车站迎接，并献花圈。陈先生之高风亮节，至今为湖大校友所怀念。

周介禔先生事略

周仁济*

周介禔（1886—1951），字筠翹，号朴庵，湖南善化县人，曾祖周平湘，乾隆时举人，历官山东知县，终任兖州知府，以廉吏名世，传至祖父，家道中落。父亲周家鼎，字益吾，是一个饱学秀才，是当时以授徒为业的著名塾师。一家十余口，靠微薄束脩和借贷度日，家无长物，环堵萧然。母亲左氏，出身于河东官僚世家，是一位知书识礼、与丈夫同甘共苦、抚养多子女而不辞劳瘁的贤淑妇女。他俩安贫乐道、勤俭朴实的家风在儿女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介禔先生兄弟八人，还有一个姐姐。大哥介祉，字佛生，比他大二十岁，于清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年）入泮，以词章和八股文受知于当时湖南学政元和江建霞先生，名列善化第一。光绪壬寅（一九〇二年）中北闈举人，与黄兆枚、谭延闿、郑家溉同科，以四品知州衔署广东四会县正堂。二哥介祺，考秀才时也名列第一。所以当时名书法家刘澐挽左太夫人联中就有“独君家兄弟联翩，先后冠军隆誉望”的赞语。当时文坛，传为佳话。介禔先生在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励志苦学，年仅十七岁即中了秀才。他在少年时代，不仅能写一手气势雄健的策论，而且能用颜楷书写春联，深为街坊邻里所赏爱，争相购买。自此求书者络绎不

* 周仁济系周介禔先生的侄孙。现任湖南第一师范副教授、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文中所述一部分系作者亲见亲闻，一部分是周介禔先生女儿周昭怡的回忆。

绝。

自清末至抗日战争年代，在漫长的岁月中，先生参与了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度过了长时期的政治生涯。清光绪末年，朝廷罢科举，兴学校，湖南设立警官学堂和法政专科学堂。先生考入警官第二期，和林支宇、姜济寰、王钺同以秀才学警务。旋入法政专科学堂治经济政法之学。毕业后出任巡官署长，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维护地方治安，颇具政声。一九一二年，谭延闿督湘，任命林支宇为全省警察厅长，先生为秘书长。数年之间，由于先生办事干练，三次被任命为湖南省会警察厅长，一九一七年，又晋升为湖南省警务处长。蔡锷护国军兴、袁世凯阴谋称帝失败后，其余孽北洋军阀割据中原，东北各省号称北军，代兴迭起。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为南军，以广东为根据地，当时形成南北对峙之局，而湖南首当其冲，为两军争夺要地，南北混战，军旅纷扰，湖南人民，实备受荼毒之苦。一九一八年春，皖系军阀张敬尧率兵入湘，统治两载，先生随谭延闿退回广州。一九二〇年，南军驱张敬尧出师奏捷，收复湖南。谭延闿两次督湘，先生被任命为全省印花税处处长。其时，先生遭母左太夫人之丧，谭延闿亲临吊唁，其挽辞云：“公瑾本同年，愧虚拜母登堂约；王孙终复楚，知慰倚闾属望心。”这副挽联包含两种意思：一是他和介社先生同年，早应登堂拜母，只以军务倥偬，未能如愿。一是赞扬先生与他以驱张退居广州，终于收复湖南，当能慰贤母倚闾之望。足见他们之间友谊是很深的。当时谭督军幕府中有林支宇、姜济寰、曹孟其和先生，号称四大金刚，为出谋画策、驰书草檄的智囊人物。旋林支宇出任省长，先生复任湖南全省警务处长。一九二一年，先生卸职，寓居于武汉、广州、上海等地，鬻字为生。

北伐战争伊始，鲁涤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军长，聘先生为军部顾问，参加北伐。一九三一年，鲁涤平任江西省政府主

席，次年任先生为省政府秘书长，不久即调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先生宦游金陵数载，清暇便潜心书法艺术之研究。

这里插叙一段先生与谭延闿之间的宦海轶闻。林支宇继谭督湘，复任先生为警务处长。林谭之间的政治嫌隙，使谭对先生亦产生友谊上的裂痕。后来谭官远亨通，迁至行政院长，而先生却官居闲散，未被重用。在鲁主赣政时，先生未被任为省府委员，即其一例。后来谭延闿逝世，先生挽辞中有“论事功堪比咸同诸贤，以未尽延才为恨”之语，褒谭之事功，讽谭之不能任贤，感慨系之。

一九三七年，贺耀组任甘肃省府主席，聘先生为秘书长，于各项政务，多所擘画，深为贺所倚畀。抗日战争爆发，先生卸职回湘，隐居于长沙河西张家冲老屋，自此不复出山。抗战中期，日军犯湘，先生转徙于零陵、道州、嘉禾、汝城、桂东一带，避敌不遑，生活贫困。湖南省主席薛岳、吴奇伟、王东原均以省府顾问名义致俸，以助生活之不足。抗战胜利后，先生买棹南归，于河西老屋辟静室以居，几年间博览书史，每日勤于砚耕，或对联、或中堂、或寿屏、或牌匾。求书之卷轴积桌盈尺。先生则怡然自乐。不以为疲。

先生早期，担任过教育工作。民国肇始（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礼聘先生兼任经济学与书法课教席。湖南教育界人士陈奎生、李云杭、文士员、黎升洲等皆出其门下。据陈奎生教授回忆：先生授业时博学多辩，口若悬河，论证问题深入浅出，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先生善谈吐、广交游，过从皆一时俊彦。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前后，与林伯渠、姜济寰、徐特立、黄俊（癸卯举人）、曹孟其诸先生过从颇密。晚年与皮浩白、任凯南交厚。在书法研讨方面，与当时著名书法家曾熙、谭延闿泽闿昆仲、郑家溉、汪貽书等建立了深厚友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初

期，先生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期间，适中共中央派谢觉哉同志为驻甘肃代表，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而先生以同乡之谊，来往频繁，晨夕倾谈。谢老对当时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多所阐发；对国民党腐败无能多所抨击。使先生深为折服，加深了对旧政权的认识，对他放弃仕途、翩然归隐起了一定的作用。

先生为笔者的七祖叔。由于长时期的相处，面承教诲，对先生之为人处世，接触较多。兹就数端作如下的忆述：

（一）不满旧政 向往新政

一九四三年前后，先生居于河西老屋，笔耕自娱。当时国事日益凋蔽。当政者欲网罗社会名流参与政治。藉以维持残局，粉饰太平。此时薛岳将军主持湘政，屡派要员方学芬等登门请先生出山。初欲先生出任省府委员兼长沙市长，先生坚辞不就；继之又请先生出任省参议会议长。又为先生所婉辞。当时权门清客，议论纷纷：“周某有官不做，人家想做而不可得。”不知先生几经宦海浮沉，已感厌倦。对旧政府的所作所为，已感失望。是不是先生不愿出仕呢？非也。长沙一解放，万众欢腾。先生对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有着美好的愿望，因而激起出仕的强烈要求。一九五〇年初，先生以一师教员的身份上书毛主席致敬，并以颜真卿书“乞米帖”的故事向毛主席乞米，意即希望毛主席为他安排一个工作，能在晚年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毛主席于同年三月十九日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信是这样写的：“周介赓先生信一件寄上。请商颂公或首道酌予处理。我因不明周先生情况，未作答复。周信内说，希望得米。程颂公不给，又称须得毛委任方有效，似乎社会舆论对他不太好。究竟情形如何，是否应给予帮助，请先生按情酌定。顺致敬礼。毛泽东。”

由于先生以清高自许，未能亲访程颂公一叙旧谊，而颂公亦以新政伊始，百端待举，未能及时延揽，以致政府正拟优礼之时，而先生竟以脑溢血症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先生居乡时，每遇乡里百姓有难，不惜身入公门，为老百姓排难解忧。犹忆一九四三年，当时市政府强征河西部分土地。不少乡民有流离失所之危，上书政府请愿，要求缓征。先生体念民情，亲自我市长王秉丞交涉，王以维持政令为由，不允更改，先生拂袖而起，说：“我找薛长官去！”终于得到薛的批准，从缓征用。乡里百姓，无不赞扬先生见义勇为之精神。

（二）居官清正 一丝不苟

先生早涉仕途，然秉公办事，不弄权，不媚上，清节自持，深得朋辈好评。举其两端，可以概见：一为赵恒惕任湖南省长时，先生任省警务处长，当时省会警察厅长陈山毓贩卖鸦片，经警署查出，上报先生处理。先生向赵省长进言，认为陈知法犯法，有损官箴，非严惩不可，而赵省长却暗示先生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先生为此愤愤不平，竟挂冠而去。二为贺耀组任甘肃省主席时，先生为省府秘书长，当时求官者知先生不肯受礼，有一个人竟将狐裘一袭自窗口掷入，内藏求荐之书，先生发觉后，原物璧还，使对方深为感动。

（三）友爱兄弟 严教子侄

我祖父介祉公比先生大二十岁，友于情笃，先生以父礼事之。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我祖父担任省河厘金局长，先生在南京任参事，唯恐长兄行动不便，将自用的包车远道寄回长沙。一九三六年，祖父病笃，先生乞假归省，亲侍汤药；祖父病逝，先生守丧弥月；祖父出葬茶子山，先生亲临墓穴复土，居墓庐月余，竣工始返。这种鹬鸽之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

记得祖父临终，先生写了一首挽辞：“一生心血苦持家，垂死未休，空剩桔洲偕隐宅。近岁别离时送我，教兄无术，谁复河梁慰弟人。”意挚情真，感人肺腑。

我家是一个几代同堂的封建家庭，先生的二、三、四、五兄及八弟都早逝，遗孀孤侄的抚养，教读婚配的负担，一家数十口主要靠先祖介祉公与先生撑持。即使这样，先生对子侄后辈的教育注入了不少精力，从政之余，示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与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而对于子侄后辈的治学、读书、习字，要求尤严。我记得十来岁时，学春秋三传、屈赋、韩文、说文部首皆为先生所亲授。他重视晨读，每日清晨，要到房中督促，闻书声琅琅，始含笑而出。他讲书时不仅讲清文章之义理，而且讲文章的章法和辞藻，以求文理熔于一炉，先生确是一位良师。他还亲自教我写古文。有一次，他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报吴仇论”命题。我为了构思别出心裁，做了一篇翻案文章，说“向使吴王听子胥之谏而不许其成将奈何”，问了好几句，先生很是欣赏，援笔圈点，打上“文如剥茧抽蕉，笔锋犀利，假以时日，当可大成”的批语。我今天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一点造诣，与先生严格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四）精研书法 自成大家

先生的书法，早在青年时期，已崭露头角，经过几十年的磨炼，对楷行八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湖湘当代书法名家之一。

他的楷法宗颜真卿，兼习南园，融会北碑黑女志、张猛龙、爨龙颜、郑文公诸碑之长，自成一体。行书则遍临平原名帖争座位、祭侄稿、蔡明远、裴将军等，并深研褚遂良、李北海及宋四家之长，别创一格。在书论上，他提出了“先雄健而后秀逸”，“书贵乎正，用篆隶两分笔意入行楷”，“笔要逆

入涩行。笔笔中锋。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功力乃见”等精辟观点。

先生的楷法深得颜鲁公变化精髓，以颜筋参以北海之俏，以颜神参以黑女之韵，形成了他楷法雄健多姿的风格。谭延闿曾赠一联：“颜公变法出新意，何逊能诗有世家。”“出新意”三字道出了先生书法的独创性。

先生除以楷行见长，亦旁涉隶篆。于隶书则深研张迁、礼器、石门颂、西峡颂诸碑，吸收张迁碑的古拙端庄，礼器碑的瘦劲宽绰，石门颂的超逸豪放，融于自己的笔底，自成一格。于篆书则深研李斯峯山碑及毛公鼎，写来铁画银钩，得道劲古朴之妙。

先生任省会警察厅长时，年未三十，书名已震湖湘。公余作字，对客挥毫，深夜不息。二十年代寓居上海，与湖南名家曾熙、谭延闿等切磋琢磨，日益精进。三十年代，他的楷法，与谭延闿齐名，不相上下。谭在南京曾书册页四幅，跋云：“筠翹先生寄纸索书，杂临如右。知吾书之不进，即以证功力之日疏，君必大乐矣。”足见谭对先生书法之悦服，事实上，湖南学颜真卿者代有名家，清何绍基得其神韵，近代则以谭延闿兄弟与先生为一代正宗。

我在少年时期，与先生相处日久，亲见其作书，亲聆其论书，兹就先生书法特点概括如次。

其一，书贵用笔。

先生的行楷书，都师承颜鲁公。对颜书之骨力、形势、神采、气韵均有深刻体会。清代大书法家学颜者有刘墉、翁同和、钱南园诸家，以南园为第一，于是又从南园法帖中求索用笔之法。这样，他总结出—条经验：作书须是中锋，而中锋必用逆笔，而逆笔要诀在于逆入、涩行、紧收。故先生作书，做到笔笔按、笔笔提、笔笔中锋，具刚劲婀娜之美。

其二，讲求结构。

先生作书，重在用笔，同时讲求结构，他认为楷书结构要布白调匀，用笔端正平稳，布白须注意计白当黑，奇趣乃出。他晚年所作楷书，在结构上吸收颜书的端庄，欧书之严谨，自成一格。

其三，提倡书如其人。

先生学颜，尤重鲁公品德，后世赞扬颜公“精忠贯日月，书法冠唐贤”，古贤名教，感受甚深。先生常以“作书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作为勉励自己、教育后代的座右铭。

先生墨迹遍江南，累经沧桑，所存无几。所书碑记有湘潭石嘴头碑记、张辉瓚神道碑、倭寇万人碑、市内吴济南药室、乃文笔店、詹有乾墨庄、杨裕兴、李合盛等招牌，皆出先生手笔，现在家藏遗墨，仅存《朱柏庐先生家训》楷书一册、篆隶行楷屏一幅，有如吉光片羽。

先生与元配吴淑端夫人（清癸卯进士吴建三之妹）育女四，皆湖南大学本科毕业，第四女早夭。侧室吴氏育子女三人。先生之次女昭怡，为湖南书法名家，现任湖南省政协常委、省妇联常委、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她在少年时期，即从先生学书，日课楷隶，数十年如一日。她的楷行书有乃父遗风，渊源有自。但又有所发展。

笔者写先生传略，赋诗一章，以表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五十年前事，亲聆教诲多。

春秋细评点，屈赋费吟哦。

泼墨挥神笔，辞官隐薜萝。

回思犹似昨，霜鬓已婆娑。

伯父刘兴传略

刘 岳*

刘兴号铁夫，湖南省祁阳县人，生于一八八七年农历十月。先世务农，后经营小商。父亲刘云甫，曾考中秀才。刘兴七岁时从叔父发蒙，十一岁进私塾读书。十八岁到长沙修业学堂读了一期，目睹国力衰弱，立志从戎，便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后受革命思想影响，经友人傅一介绍参加了同盟会。他在陆军小学毕业后进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再入保定陆军入伍生队。武昌起义时，他正在入伍生队，保定离北京很近，戒备甚严，无法响应。于是他托故请假，由保定绕道天津至上海参加了陈英士领导的学生军。不久学生军被遣散，他便回湘，经由湖南都督焦达峰派到祁阳军政事务所任军事科长，组织地方武装。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北京政府成立，军政事务所也就停办了。

一九一二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开办，刘兴又进入该校第一期学习，嗣后参加了国民党。后因学潮，学校被解散，他就去到了北京。此时他想办实业致富，结果未筹到资金，扫兴而归，回家乡教书。

一九一三年，湖南宣布独立，反袁援赣，刘兴的同乡陈则遽任炮兵营长，邀请刘兴任营附。不到三个月，江西李烈钧失败，湖南取消独立，军队被遣散，刘兴乃回乡教书。

* 刘岳是刘兴的侄儿，解放战争中任刘兴的随身秘书。文中内容多系“三亲”。现居长沙市。

一九一四年，北京陆军部通令，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未归队的学生仍进第二期学习。刘兴经多数友人怂恿，再入该校复读，于一九一六年毕业，即被派往山东第五师任见习军官。该师原系北洋军队，旧习气重，行伍出身的多，对军官学校出身的特别歧视，他感到难以相处，就离开了该师回到了湖南。适逢湘人驱逐汤芗铭，公推刘人熙为督军，成立警卫团，唐生智任营长，刘兴得任该营连长。自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六年的十年中，刘兴始终在唐生智手下带兵，屡立战功，次第升为营长、团长而旅长。护法、倒谭（延闓）、援鄂诸役，他无一不从。但当时他对革命的真理并无认识，解放后他是这样评价自己过去的：“我当时对革命的真理毫无认识，干的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是‘某些部落反对其他部落的儿戏一类的所谓革命’。我只是在这些内部矛盾之中尽了军人的职责而已。”

一九二四年，刘兴在唐生智的影响下，曾向唐生智所结识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学佛，他对于自利利他，救人救世，英勇精进，慈悲喜舍这些佛教教义和四宏誓愿与大无畏精神很感觉其伟大，认为用以修养军人的心身是很好的。这对他治军、待人和处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唐生智在衡阳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主席职务。刘兴遂任第八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统率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沿粤汉路北进时，刘兴的第四师担任前敌任务。

一九二七年初，唐生智担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辖有由第四军扩编的第十一军、第四军及由第八军扩编的第八军、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刘兴任第三十六军军长。

一九二七年宁汉分流后，唐生智极力主张东征讨蒋，但因奉系张学良进兵河南，武汉政府决定先行北伐。刘兴率领的三

十六军曾随唐生智在河南与奉军作战。

马日事变后，刘兴对在他的三十六军各级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如夏鸣刚、黄克勤等都资助护送离去。刘兴在解放后回忆他那时的思想认识时说：“我当时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极为赞同，认为必须有巨大的改革，才能使国家强盛。但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深切的认识，只觉得共产党员同志的工作精神值得取法。而后方大规模展开的农运事先缺乏广泛细致的宣传，大家都认识不清，尤其是一般官兵政治觉悟不高，听到家庭受到打击就情绪不安，纷纷要求请假回家，使军事上受了很大影响。况且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几千年的土地问题不容易一下解决，应按照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政策，有准备地、有计划地逐步进行，才能办得好。现在北伐尚未成功，国家基础未巩固，行之太骤，徒滋纷乱。现在看来，我这种认识完全是改良主义的想法和单纯军事的观点，对革命是毫无益处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唐生智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后，派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从郑州回师东征，讨伐蒋介石，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进窥南京。而桂系李宗仁已把蒋介石赶走，把持了南京国民政府，于十一月派西征军讨伐唐生智。唐因战事失利，于十一月十二日通电下野，令刘兴、何键退入湖南，以保存实力。刘兴遂将所部撤回湖南，以作缓冲，并与桂系暂谋妥协。同时，蒋介石又来联系刘兴倒桂，刘就与蒋合作，将部队撤往湘西，而蒋介石并未以实力相援助。而何键却发出求和通电，表示“谨率所部，集结湘西，听候命令，移师北伐”，卒为何键所卖。桂系仍复进兵压迫，刘兴只得离开所部，将部队交由师长廖磊率领，冀图保全整军的力量。然而刘兴所部终于被桂系收编，由白崇禧率领进驻唐山、开平一带。

一九二九年，唐生智与蒋介石合作，蒋嘱唐接长旧部，刘兴随唐生智间道至唐山，潜入原所辖部队。白崇禧闻讯出走，廖磊潜逃，于是唐生智、刘兴又掌握了原所辖部队，并利用蒋介石与冯玉祥战争之机获得了相当实力。是时，唐生智乃在暗中与各方进行反蒋洽谈，十二月三日与冯军达成一致倒蒋的协议。同日，安徽省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在浦口异动，图攻南京。唐生智随即在郑州通电反蒋，刘兴随唐重出倒蒋。唐军沿平汉路南下，将主力集结在驻马店一带。二十七日，唐对蒋军发起总攻，被阻于遂平、确山间。蒋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杨虎城又袭击和占领了驻马店，蒋军师长陈诚也夜袭唐的司令部，使唐受到致命的打击。与唐同时酝酿反蒋的阎锡山，这时被蒋收买，南下夹击唐军。唐的反蒋战争不到一月，便遭惨败。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唐又通电下野，化装逃到天津，流亡港、澳、新加坡等地。刘兴亦解甲归田，寓居汉口。唐生智临行时曾对刘兴说：“蒋介石一意孤行，自私自利，国家是搞不好的，我们不怕没有机会再干。”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复与唐生智合作，唐又对刘兴说：“蒋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总要取得实力再说。”因此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刘兴任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不久又派刘兴为驻永丰守备司令，一九三四年派刘兴为第二绥靖区司令，一九三六年任刘兴代理驻黔绥靖公署主任，调任湘鄂赣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兴都接受了任命，虚与委蛇，不唯没有达到取得实力再行反蒋的目的，反而助长了蒋政权的声势，做了蒋的工具，对人民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解放后，刘兴每言及此，深引为终身憾事。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调刘兴为第十六军团长，旋调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改任江防总司令，后又调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南京撤退后又令刘兴回任江

防总司令。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又调刘兴为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三九年，薛岳主持湘政，邀刘兴出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因薛岳刚愎自用，刘与薛气味不投，仅参加省府行政会议一次，便一直乡居，不问政事。

一九四二年秋，刘兴在家乡祁阳创办了崇汉中学，并担任校长，礼聘品学兼优之士为教师，苦心经营十余年。

一九四五年，刘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曾先后两次到重庆参加参政会，在重庆经陈铭枢介绍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会”（到了一九五〇合并为“民革”）。一九四七年，刘兴到南京开了最后一次参政会，以后就专心在家乡办学。乡居期间，刘兴对人民的疾苦有所感触。抗战胜利后，他对蒋介石蓄意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阴谋也逐渐看清楚了，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更使他认识到反人民的内战绝对没有出路。一九四八年冬，唐生智从南京、上海回湖南，曾与刘兴作过一次密谈，唐将其谋求和平的活动，并将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人员有过接触的情况告诉了刘兴。因此，刘兴对促成湖南和平解放寄予很大的希望。此后，刘与唐时有信书来往。一九四九年三月，刘兴命其侄儿刘岳携带密信去东安面交唐生智，唐当即回信嘱刘兴作好出任迎接湖南和平解放工作的准备，于是刘兴在祁阳整装待命。

一九四九年四月，程潜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共商举行和平起义的大计。唐生智到达长沙后，发出湖南人民应该团结自救的呼吁，并担任湖南各界人士组成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程潜与唐生智接受中共湖南省委地下组织的指示，密商成立湖南永宝警备司令部，派刘兴任司令，担负该地区和平解放的起义工作，随即电请刘兴晋省。刘兴随即带同机要人员刘岳、周宽民到达长沙面见程潜、唐生智接受任务，并会见了中共湖南省委地下组织负责人，面聆指示。刘

兴旋即进行该司令部主要人员的安排和经费筹措事宜，并令刘岳回家乡邵阳变卖稻谷一千五百石作为工作经费。五月，该司令部在邵阳正式成立，开展策动起义工作，此后中共湖南省委地下组织成员刘寿祺同志多次前往邵阳会见刘兴，并指导起义工作。该司令部的核心成员在刘兴领导下主要做了如下一些工作：一是策动该地区的部队起义，特别是组织发动零陵、道县等地方部队的起义，袭扰湘桂路，阻拦白崇禧部队的后撤，以利于解放军歼灭桂系的有生力量；二是抑制破坏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在永属八县组织地下军的阴谋活动，收集蒋伏生的一些活动向程潜、唐生智汇报；三是营救释放被原邵阳警备司令部捕押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革命人士。白崇禧得悉后，于七月威逼程潜下令撤销永宝警备司令部，并调刘兴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刘兴受唐生智指示携带随从秘书刘岳即移居东安县顾山继续做策动起义工作，组织联络零陵、道县的地方武装袭扰湘桂路，阻拦白崇禧部队退守广西，并对桂系进行策反。李宗仁、白崇禧多次派李品仙等到东安威逼唐生智去广州，唐避而不见，均由刘兴和刘岳与他们周旋。白崇禧为此大为恼火，于八月初派一二六军三〇五师进驻东安县搜捕，刘兴全家被捕，刘兴被迫携带眷属到桂林，其随从秘书刘岳亦被迫随同至桂林，受到软禁。刘岳为营救刘兴免遭白崇禧毒手，四处奔走，幸得解放大军进军神速，桂林解放，刘兴始得脱险，暂居桂林待命。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派桂林军管会寻找刘兴下落。在桂林军管会的帮助下，刘兴全家及其随从秘书刘岳得于一九五〇年一月返回湖南。是年刘兴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参事室副主任，旋改兼湖南省体委副主任，直至一九六三年夏病逝于长沙。终年七十六岁。

回忆戴岳先生

潘 监*

我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长沙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当见习官起，即追随戴岳先生，直到上海抗日战事发生，我在陆军第四十六师师部当上校参谋主任止，为时十载。

戴岳先生在解放以后，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等职。下面特就自己的回忆，并参考戴岳的部分日记等资料将其生平记述于后。

一、戴岳的青少年时期

戴岳，字希鹏，原名哲人。湖南省新邵县毫塘乡冰糖村人，生于一八八八年九月二日，祖居农村，家境清苦。他从八岁起发蒙读私塾，为时九年。前六年半日读书，半日牧牛砍柴；后三年在离家三十里以外的雀塘铺读书，经史子集，均曾攻读。十七岁时，到邵阳县立高小读书。十八岁投身湖南陆军小学，三年后毕业，又升入陆军部驻湖北的第三陆军中学。辛亥革命后，参加岳州镇守府独立标，后改为第三营，戴任督练官，不久又升为镇守府的军务科科长。

一九一二年四月，他在粤汉铁路督办公署警备第三营当营附。同年八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编入步兵科第七连受训。一九一三年七月，江西省督都李烈钧发起推翻袁世凯的战争，戴岳响应保定军官学校当局的号召，出任援赣

* 潘监原为戴岳旧部，现为新邵县政协副主席。

军第一混成旅步兵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但在倒袁失败后，他回到保定军官学校报到时，学校当局即以逾期三天为由，将其开除学籍，这对他刺激很大。一九一三年冬，当时的陆军大学在湖南招收学员时，戴岳又前往报名参加考试，初试被录取，但在北京复试时，竟名落孙山。一九一四年三月，他再次投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被录取后，编入炮兵科受训，到一九一六年六月毕业。

二、戴岳在军阀混战时期

一九一六年七月，湖南都督汤芑铭被赶下台后，谭延闿继任湖南都督。戴岳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回湘，被任命为湖南陆军第二师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一九一七年八月升任湖南陆军第一师炮兵团第三营中校营长。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升任湖南陆军第二师炮兵营上校营长。同年五月，戴岳又被谭延闿提升为第二师骑兵团上校团长。当时，湖南省内部，谭延闿、程潜、赵恒惕三派势力，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起，赵恒惕派把谭延闿赶至湖南郴州一带，赵自任湖南省长，湘人治湘，各自为政。这时谭延闿仍当湘军总司令。一九二三年九月，戴岳任湖南第二军第一旅少将旅长。同年十月，谭赵战争结束，谭延闿即率领湘军到广东，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将入粤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建国湘军，设总司令部，戴岳跟随谭延闿到达广东。这时赵恒惕将留在湖南的湘军，改编为陆军暂编一、二、三、四等四个师，即以贺耀组、刘镛、叶开鑫、唐生智四人为师长。

三、戴岳在北伐战争时期

谭延闿率领湘军子弟兵两万余人，到达广东韶关驻扎后，一切服从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领导。不久，谭延闿即出任大元

帅府的秘书长。

一九二三年十月，湘军入粤后，随即奉命增援革命军参加南雄始兴战役，戴岳在这次战争中指挥有功，被升为第二军第二师中将师长。

一九二五年一月，因军队调整缩编，戴岳被调任为湘军整理处副监兼炮兵督练处处长。

同年四月，孙中山下令讨伐叛军杨希闵、刘震寰时，戴岳任第一路指挥官。当时在广东省东江、北江地区作战，为时达半年之久。湘军子弟兵，由于水土不服和部队医药卫生条件不好，官兵患水肿病、心脏病死去者，据后来统计达五千余人，有的部队一个连全部死去。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革命军正式编入北伐军时，谭延闿为第二军军长，鲁涤平为上将副军长，所辖第四师中将师长张辉瓒，第五师中将师长谭道源，第六师中将师长戴岳。

戴岳在这次北伐战争中，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如北伐战争中的江苏龙潭、诸葛镇战役，戴岳以卓越的指挥才能，一举将大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击溃，随即占领南京，奠定了北伐军的胜利基础。

当时，蒋介石很高兴，传令嘉奖之外，还下令晋升戴岳为上将师长。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蒋介石从军队中清洗共产党，刚攻下南京时，即扬言二、六两军中有共产党人，首先下令把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的全部兵力解散于浦口附近。接着，蒋又下令要解散第二军鲁涤平、李富春（党代表）的部队。与此同时，蒋又密下手令，派一名少将高级参谋，沿长江北岸，连夜星驰，追上戴岳，并将手令给他。晋升戴岳为第二军上将军长，取代鲁涤平的位置，并要戴岳立即回师南京。在这种荣誉关头，戴岳毅然拒绝，毫不介意地说：“我们二军官兵

是三湘子弟兵，谭延闿、鲁涤平是我多年追随的老长官，我不能见利忘义！”这件事在我们湘军中，特别是第二军官兵中，人人知道。

一九二八年，鲁涤平主湘时，戴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兼长沙警备司令。

四、戴岳在“围剿”和抗战中

从一九二七年二月起，蒋介石整编部队，第二军缩编为陆军第十八师。鲁涤平调任江西省主席，张辉瓒任第十八师师长，戴岳任五十二旅中将旅长，同年四月，西征之役，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被解决，戴兼任鄂南绥靖主任，八月兼浔湖军警督察处长。五十二旅部队驻在赣东贵溪、弋阳、德兴等县。当时成立德兴清乡委员会，戴被各界推选为主任委员。

一九三〇年夏季，阎锡山、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开始。

此时，红军在江西的根据地日益扩大。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的部队，一举在广昌附近将陆军第五师公秉藩部消灭之后，随即于同年十二月东固附近的龙岗之役，一举将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两个旅六个团的兵力，全部消灭。戴岳这时即在十八师任五十二旅旅长。

龙岗之役，红军取得绝对胜利。当时情况是：鲁涤平以江西省主席兼任讨逆军第九路总指挥，依照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的命令，将驻赣部队分三路向苏区进攻。张辉瓒为第一路纵队司令，谭道源为第二路纵队司令，毛炳文为第三路纵队司令。各路纵队齐头并进，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师各旅集结完毕后，张命令五十四旅旅长朱耀华留在东固镇待命。张自率五十二、五十三两旅及师直属部队前进。戴岳在此时，向张建议：龙岗两边悬崖绝壁，孤军深入

恐遭不测，但张不听，仍督师前行。待部队进入纵长的峡谷时，红军的埋伏部队，从四面八方，如潮水一般冲来。张师官兵，无法展开作战，只得束手待擒。八千多官兵，被消灭殆尽。戴岳当时躲在一处小山堆上，只剩下七人了。立即把胡子刮掉，化装成一个连队文书，由几个贴心的卫士保护，得以逃回南昌。但据当时被俘放回的官兵们纷纷传说：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在战地集合俘虏们说话时，有许多五十二旅的官兵举手报告，请求毛泽东释放戴岳，说戴旅长爱兵爱民是一个好旅长。毛泽东说：“我已经知道，戴岳是一位好旅长，但现在尚未俘获，捉着时可以放回。”这一个故事，十八师的官兵们人人知道。我这时正在南昌卫戍司令部当上尉参谋。对当时龙冈之役的情况，是较清楚的。

戴岳这次回南昌后，不久即任独立第三十六旅旅长。他集中残兵败将，组成三个步兵团。这时期，蒋介石认为红军如此厉害，他的所谓“第一次围剿”失败了，急思再筹善策。他一面在南昌组织“中央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派一级上将何应钦为主任，一面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付红军策略。戴岳在此时，曾经向南昌行营建议：最好采取碉堡政策，以缩小苏区范围。这一条碉堡政策，到第四、五次“围剿”时，便实行了。于是，在江西及毗连各省，均普遍仿行，碉堡林立，遍及城乡要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仅江西一省即达二千九百多座。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发动战争，我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戴岳的三十六旅在平湖金山卫一带，担任消防。沪战结束后，戴旅调往浙西衢县，戴兼衢州警备司令。一九三三年春，独立第三十六旅在新干奉南昌行营命令扩编为陆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岳，少将副师长戴嗣夏，辖两旅四团。经常在抚州、宜黄、崇仁、棠荫等县，对苏区红军进行防剿，但从未担任过进攻任务。同年十月，部队驻防棠荫时，靠近苏区，

与红军保持接触。任务是建筑碉堡，堵击红军，未曾深入苏区进行激烈战斗。戴岳在此时心灰意冷，不愿再任军职。他首先谎称父亲病危向蒋介石请假一月，以后便再三要求辞去师长职务，经过半年之后，才获批准。副师长戴嗣夏升任师长，少将参谋长孙常均升任副师长，戴岳也在这次调为陆军第二十七军副军长，军长为刘兴，辖五十三、四十六两个师。但是，这两个师一个驻在贵州省，一个驻在江西省，从来没有归还过建制，戴岳也从未到军部任职。当时，戴岳为什么如此消极呢？我们部队的官兵，大都知道，他自己也曾在口头上流露过，总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蒋介石把第二军看成是杂牌部队，总想吃掉它，或者任其自生自灭，与中央嫡系部队待遇完全不同。（二）戴岳认为从一九二三年十月谭延闿率湘军子弟兵到广东追随孙中山革命，在统一广东、完成北伐各战役中，官兵流血牺牲甚多，依然受人歧视，心有不平。（三）蒋介石在当时不抗日，而专与红军为敌。戴认为红军是新兴力量，一经接触，即遭覆灭，倒不如早退为佳。苦思多日，毅然去之！戴岳坚决不干的上述三点理由，在我们老二军部队官兵中，人人尽知，也都不平。戴岳离开四十六师后，在驻防零都时，他曾经回到部队，与官兵生活过三个月。一九三七年一月，戴岳奉蒋批准到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读书，时间两年。后因抗日战争发生，提前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毕业，从重庆回到邵阳。

戴岳回到湖南后，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但他也未到职。这时期，湖南省主席薛岳，曾任命戴岳为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教育长。该校后改为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一九三九年秋，被调为湖南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这时期，湘西土匪，极为猖獗，其中如匪首张玉琳、陈林、张大治、杨保、谢宏浩等，各拥枪、匪数百，占据山头，还有其他小股土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当时湖南省主席薛岳，任命戴岳兼

清剿指挥官。凡辖区内的保安团队、县警察局等归其指挥；还指令协同驻防在辰溪的独立旅刘振喜部，驻在湘西的海军陆战队林秉周旅共同清剿。经过为时一年的努力，基本上将这几股土匪肃清，其中有两匪首被击毙，张玉林股全部投诚，编成一个保安营。此时，薛岳又命令戴岳兼任湘西行署主任。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戴岳认为不应发生内战，对时局不满，也不到军委会去任中将参议，他便回到邵阳家乡。他在家乡居住不久，又主动协助地方武装防止匪患，为保卫家乡做出了贡献。

五 全国解放后的戴岳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程潜将军在长沙领导起义后，广州政府派黄杰为湖南省主席兼湖南省绥靖总司令。这时，我同黄杰从广州到邵阳，重新组织省政府和绥靖总部时，黄杰曾邀集戴岳、岳森谈话，黄希望地方父老认清形势，并热切请求戴岳出任宝庆警备司令兼第六行政区专员。我清楚地知道，戴岳婉词拒绝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戴岳即从邵阳到长沙，见到了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北伐时，肖任第六师党代表，戴是师长），表示积极靠拢党和人民政府。肖司令员当即请他约方鼎英一起回邵阳，说服陈光中，不要顽固到底，赶快放下武器。但是，陈光中根本不思悔改，随即被我以武力解决。肖司令员又要戴岳在邵阳为首倡导做些支援前线、协助清乡的工作，肖司令员还将亲笔信要戴岳面交黄克诚政委和邵阳军分区司令员邹毕兆。

一九五〇年，戴岳赴北京，在海军司令部招待所会见了肖劲光同志。戴除汇报在邵阳工作情况之外，希望能在北京参加军大学习。这次适逢黄克诚及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均到北京开会，他们说地方人才缺乏，戴岳还是回湘工作要紧。同年五

月，戴岳被任命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后又改任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不久，又被邀为湖南省政协委员。戴还是民革湖南省委成员，积极参与了民主党派各项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戴岳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戴岳有九子五女，儿孙满堂，有许多子孙积极进步，早已成为共产党员。

先君陈浴新事略

陈守宁*

先君陈浴新一八九〇年十月二日（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今属涟源县）。在他出生的五年之前有中法战争，四年之后爆发了甲午中日之战。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成了战败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先君出身于贫寒家境，小时候提篮子到澡堂和烟馆叫卖南瓜子和盐水豆。家里来了客人，祖母都要留饭，有多次恰逢家中断炊，祖母将锅里添满水放在火炉上以安定客人，然后拿出几件旧衣服命先君从后门出去，上当铺典当几个钱籼米买菜。祖父陈吉昂是个读书人，喜画兰花，乐于助人，对乡亲们的生活、疾病、婚丧等事均竭尽全力接济，很受当地乡亲尊重。据说蓝田的蓝溪桥竣工之后，地方群众请三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最先过桥，祖父便是其中之一。

先君少时就得到同乡李燮和先生的指点，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如《黄帝魂》、《荡虏丛书》、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以及赵必振（又名赵曰生，解放后在我家住了一年许）翻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爱国思想逐渐增长。为追求救国自强的真理，先君摆脱乡塾馆课孔夫子书的束缚，渐与社会进步人士接触。

一九〇三年暑期，先君十三岁，即离开家乡到长沙黎家坡

* 陈守宁是陈浴新幼子，一直在陈浴新身边生活。现任长沙市十五中副校长。

退岭庵补习外文、数学。听到陈华天“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之时，人人都应养成‘牺牲个人，以为社会，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的品质”和“只要人心不死，中国决无可亡之理”的革命宣传。受革命党人谭人凤（又名谭石屏，新化人，多在采煤工人和煤船运输工人中发展革命党力量，当时长江流域的会党无人不知“谭胡子”）影响尤深。他呼先君为“小友”，常讲述明末抗清史实。他说：“革命就是造反，现在要把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满清鞑子翻下台去，只有洪门兄弟才有这个力量。”不久，先君以“东方望”的化名，履行了拜会加盟仪式，加入洪门。

一九〇四年二月，谭人凤邀约湖南会党各山堂的负责人于重九节举行岳麓山游山会，到会者十分踊跃，其中包括安化的黄汉会、新化的乌龙会、百旗山等，还有在省城的革命人士李燮和等，先君也参加了。会上谭人凤谓然叹曰：“黄冠草履之民，谁无尊亲之血气；四海九州之内，何非故国之山河！”与会者莫不同仇敌忾。谭人凤又说：“现在规定湖南所有的会党统一称为岳麓山道义堂，八个字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随即发给山堂凭证。

游山会几天后，黄兴、谭人凤、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一九〇五年八月，华兴会与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兴中会，及龚宝铨、蔡元培、章太炎组织的光复会合并，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确定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纲领。一九〇六年冬，先君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同乡李云龙（又名李卓然）是该校监督。唐生智系第一期毕业生，先君系第二期生，陶峙岳系第三期。三年毕业后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与武汉所驻常备新军有志之士，时相过从，结合日广，一九一〇年因病回到长沙。

在此期间，湖南革命党人把起义准备工作的重点放在策动清军（包括新军和巡防营）上，联络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是焦达峰，先君自一九一〇年冬开始从事联络军队的工作。受他联络的有新军第四十九标第三营管带卿汉藩（新化人）、督队官梁宪屏（安化人）、第二营管带杨策（同盟会员）等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胜利，震动了全国，首先响应的便是湖南。正当清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准备对革命党进行大捕杀之际，革命党决定先发制人。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初一）拂晓，新军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第五十标之一部和马队、辎重队由陈作新率领从长沙北门入城；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前、左、右三队和炮兵营、工兵营由焦达峰率领从小吴门入城，在又一村捉住黄忠浩杀了，其他清朝官吏或逃或降，湖南光复，满街汉旗飘扬，市民欢欣鼓舞。紧接着成立湖南军政府，各方代表在咨议局集会，先君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推焦达峰为湖南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武昌首义后，清政府派北洋新军南下镇压起义。二十七日，先君随谭人凤参加了援鄂部队誓师典礼。

两天后，先君作为都督府参谋部点验组成员，点验了驻在顺星桥、曾子庙的一支新募部队（千余人），看到名册俱全，士兵体质强健；还点验了驻在金盆岭的另一支新募部队（三千余人），查明是从修筑铁路的工人中招募来的，是一支可靠的革命力量，当时有流言说“流氓乞丐皆投营当兵”，至此不攻自破。后来这两支部队皆由黄兴调往南京，编为陆军部及以后方留守府的卫戍部队。

一九一四年，先君进入保定军官学校。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篡国，蔡锷点燃了护国战争的火把，一九一六年讨袁，先君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湘西游击支队长和第一军第一师机枪营营长。

一九一七年，先君为探求真理，决定摆脱军队生活，遍游全国。先君闻陆军部办有讲武堂，其招收资格为曾任校尉级军官而富于战斗经验者。乃多方设法，始获入堂。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给先君以莫大的启迪。他读了一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书籍。一九二〇年冬，他转回湖南，赵恒惕正大倡联省自治，蔡钜猷邀先君赴沅陵镇守府任参谋处长。先君考虑多日，知蔡氏所辖实力有两个混成旅，且湘西地利，亦有可凭，与蔡辖区之邻接友军为陈渠珍，遂毅然就任。

一九二二年，先君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并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回湖南。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先生到广州，宣布革命转入“讨贼时期”。所谓“讨贼”，指的是讨伐南北军阀，主要是指讨伐叛逆陈炯明。这时期先君任湘西讨贼军第一军参谋长。

一九二六年，先君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高级参谋。北伐军打击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两部反革命势力，又进出河南地区讨伐奉系军阀，此时先君受前敌总指挥部派遣，前往河南新乡任应岐军担任联络参谋。巨漯河会战历时半年，北伐军胜利回师，先君因肠胃病进汉口医院治疗。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所谓“清党”，接着“马日事变”发生。当时汉方仍拥护国共两党合作，准备东征讨蒋。参谋长龚洁到医院找先君谈话，说“此次东征就是打倒蒋介石”，并告知漯河战役后独立第九师扩编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说“军委会认为二十军参谋长一职你是合适人选，如公文送到，不可推辞”。不久，公文送到，先君随贺龙军长到南昌，八一起义后，始离开部队。

一九二八年，再兴北伐之师，先君任北伐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部副长官。北伐军沿京汉铁路直捣北京，扫荡滦河以东地区

奉系军阀张宗昌残部，将奉军压迫出关，并解决关内残敌，北伐结束。

此时，先君因厌于南北军阀混战，意志有些消沉，一九二八年冬，进入北京陆军大学学习，而与李济深先生有同学之谊。一九三一年，陆大举行毕业考试之时，日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国难已深，蒋介石调先君到南京参谋本部任职，先君未从命。当时湖南方面要先君回湘主持干部教育，从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五年冬，先君任第四路军总指挥部教导总队教育长。

一九三六年，南京军委会调先君任武汉行营高参，标勘、部署长江江防和浙闽海防工事，侦察苏、浙、闽、粤沿海阵地，乃至福州。芦沟桥战事发生后，先君便留在福建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延建区警备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办公厅主任（中将军衔）。这期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先君以能担任闽海地区作战指挥，枪口向外，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作战而遂生平宿愿。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延平地区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从飞机残骸里缴获一批日本人窃取的美国情报，父亲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一本书《美国生产力之研究》，自费印刷，赠送友人（六十年代我在湖南图书馆的书目中见到此书）。

抗日战争胜利时，先君已五十五岁，想到战地灾情，决心不再穿军衣，不参加内战，希望出现一个和平、统一、团结、民主建国的新局面，隐退民间，“少年投笔晚投戈”，因而去南京办理退役手续。到了南京之后，火药味甚浓。最令先君厌恶的，一是劫夺胜利果实而发财的暴富儿，一是穿着美式军服的“天子门生”。先君在南京访求延安书刊，仅得《新民主主义论》一种，遂和主办复员事务的黄杰接洽，列入退役之列，便离开南京，与母亲和我在上饶聚合，雇木帆船一只，循信江出鄱阳湖溯长江抵汉口。旅途，茫茫鄱阳，水天一色；滔滔

扬子，大江东去；巍巍庐山，高耸入云。祖国的锦绣河山，先君赞不绝口，曾有诗以纪，也深深地印入我幼小的心灵。江行阻风，沿岸盘桓，遭遇美国登陆艇，横冲直撞，将木帆船掀起坠下，见到多处没有爆炸的重磅炸弹半截插入沙洲，战争的幽灵还在吓唬人，父亲愤愤不已，给我讲述必须建国自强的道理。

一九四八年，我们回到长沙。及至程潜回湘主政，聘先君任省政府顾问，他们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旧友重逢，无话不谈。当时先君写的《识小录》在《小春秋》报逐日连载，写的是湖南革命往事，对赵恒惕进行无情的抨击。程潜说：“赵曾向我表示将辞职离湘，嘱我劝你不要再写。他现在是省参议会议长，和军统挂了勾，与桂系有老关系，你要谨言慎行。”先君说：“他在‘大选’中活动国大代表签名，还想争夺湘政宝座，如果真落入斯人之手，湘事不堪问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逐渐谈到形势问题，先君认为程有贤望和条件领导湖南走向光明，要把湖南可能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程潜同意这样做，又反问先君作何打算，先君说：“我早已下定反对内战、迎接统一的决心，我甚望赞助你事业的成功。”程潜说：

“我对孙先生的遗训不起，岂肯顶着战犯的臭名以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党代表林祖涵在延安，是容易搭上线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程潜是第六军军长）。”两人商议联络、团结、争取省内的武装力量，以及在武汉的陈明仁兵团，在荆宜的宋希濂兵团，还有白崇禧的副司令长官张轸（原是第六军的师长，现有四师兵力）。最感麻烦的是湘西游杂部队和土匪队伍，总数在十万以上，称王称霸，不相隶属，蒋桂均视为可居的奇货，滥发军、师及司令等派令，至使洪江专员高世愚一日数电请辞。程潜认为先君在南北混战时期于湘西军中日久，后来又任过湖南军事干部教育工作，有旧的关系，一定要先君去湘西接任第十区专员，以文官身份出现，不为股匪所忌，做些

劝说、诱导、稳定工作。

先君于一九四九年春季率家人去洪江，在五十 九 天 的任内，几乎没有在公署办公，都是在各县间穿梭，与大小头目打交道，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也曾用武力较量过几次。当时在洪江只有一个搜索连的兵力，最紧张的时候（受数千土匪包围），公署的文职人员都发了枪，先君将我与母亲寄到民间。搜索连内竟无人会打机枪，接火后先君亲自担任机枪手。数日后，程潜派遣的援兵到达洪江、安江后，才陆续解围。四月下旬接程潜电，促先君回省，得知大事已定，准备五月起义。

不料白崇禧部队退驻长沙，反客为主，大有毁巢之势，把驻在岳麓山附近的装备完整的陈达师吃掉了，程潜完全陷入被动，只得转入潜伏时期。白崇禧曾来我家两次，两次均用先君告诉我们说的“外出证婚”为由挡驾。此时陈明仁兵团已调驻湖南（出于程星龄的得力工作，通过刘斐向白崇禧建议），张轸四个师已在武汉火线起义。八月四日，由程潜、陈明仁联名发出起义通电，长沙和平解放。

当时，程潜等与地下党的直接联系人是马子谷，与先君联络的有地下党城工组负责同志梁君大，江南地下军工作组梁村夫同志；另有地下党员余志宏同志将两大包党的城市工商政策汇编文件运藏我家，白崇禧部队退出长沙后，先君即把这两包小册子送到黄兴路商务书店廉价发售，一日内即全部售完，开据发票并现款交余志宏同志。梁村夫同志要先君介绍去滇、黔、川的向导，先君都一一照办了。余志宏同志和负责公安工作的夏印同志也曾希望先君给予协助。马子谷、梁君大同志还动员先君写出解放湘西方案，供首长参考。翌日，十二兵团司令部派吉普车接先君去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员与先君详谈近一天，并一一在手册中记录。肖劲光司令员聘先君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高参，协助四十七军曹里

怀军长解放湘西，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人民政权。第二天曹里怀军长就派车来接，六十岁的老人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很像个老炊事员），随军进入湘西。

湘西解放后，先君回到长沙，省委统战部告诉他，说蒋介石在台湾广播中指名长沙陈浴新，加了许多“叛党叛国”的“证罪”之后，宣布褫夺中将军衔和勋章、奖章，并通缉归案法办。部领导告诫先君要提高警惕，夜间不要出门，恐遭敌特暗算。不久在一次庆功会上，先君获得了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西剿匪胜利”军功章。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先君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被选为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任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在这六年多时间内，先君均兼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在这一期间，先君坐镇灵官渡天伦造纸厂废纸收购处，抢救了许多古籍、文物，并曾亲往湘乡荷叶曾国藩家取回许多手稿，我曾听他说：“再迟一点去就没有了。”

一九五七年，先君被错划为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仅发给生活费，接受批判后，去机关打扫卫生或参加养兔。曾自吟诗两句：“老夫耄矣难为役，兔粪聊供有效肥。”

十年动乱之中，先君受到冲击，造反派还逼供先君交代与刘少奇、贺龙等同志有什么关系，时常半夜起来写交待。一九七〇年冬，先君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痛得他高声唤娘，而当时我们却无力送他进医院治疗，逐渐关节变形，终于瘫痪在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君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

先君生前生活俭朴，无烟酒嗜好，严禁家人牌赌，经常慷慨解囊帮助同乡朋友及清贫之士。他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藏书。解放初他将收藏的四百多箱线装书（不下八万册），用三艘木帆船

从蓝田运到长沙，连同在长沙家中的藏书（装了一卡车）都捐献给湖南大学。

先君还通晓日文，学过德文。五十年代初，他接待过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由东京诸大学的文学教授和历史教授组成），他们从楚文化到王船山，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对京剧和湖南地方戏剧（湘、祁、汉和长沙花鼓戏）都很感兴趣，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梅兰芳两先生有较深的友谊，在五十年代他兼任了湖南省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先君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周 澜 小 传

刘 岳*

周澜字叔祁，湖南祁东洪桥镇人，一八九一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湖南衡阳船山中学肄业，后入湖南陆军小学，继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当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盟会。一九一四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学习，随后在学校参加了国民党，于一九一六年毕业。时值湘人驱汤（梦铭），公举刘人熙为督军，成立警卫团，唐生智任营长，周澜在该营任连长。由连长、营长、团长升为旅长，参加了护法、倒谭（延闓）、援鄂等战役。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唐生智在衡阳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主席等职。周澜任第八军教导师师长，担任北伐军左路重镇常德及湘西地区的警戒任务。当时曾接到澧州镇守使贺龙的通知，说即将前来常德，要求参加北伐。周澜接到通知后，立即去函表示欢迎，并率领所部的三个团让出常德城，移驻德山，常德城全部由贺龙部队驻扎。贺龙率部来到常德时，周澜又派教导师的政工干部李中奇去见贺龙，并办理接待事宜。

一九二七年初，唐生智担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负责巩固武汉，俟机进攻河南。唐所部有第十一军（由第四军扩编的）、第四军及扩编后的第八军和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周澜这时已升为三十六军副军长。

* 刘岳系周澜女婿，彼此相处时间较长，文中所述多是亲见亲闻。现居长沙市。

“马日事变”后，唐生智从河南返回武汉，仍遥控湘政，以周斓任第十七军军长，代行省主席职权，仍担任常德、邵阳及湘西地区的警卫任务。他对湖南“善后问题”的处理，虽说要查办“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还是摆不脱反动势力的影响，因而未能尽善处理。这时武汉政府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左派”伪装，采取了分共的政策，于是部队中的中共党员都离开了部队。在周斓所属部队中的中共党员如王首道、王恩茂等都为周斓礼送出境。

宁汉分裂，国共分手。武汉政府将第四方面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任命唐生智为该集团军总司令。八月中旬，唐生智派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从郑州回师东征，讨伐蒋介石，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进窥南京。这时桂系李宗仁已把蒋介石赶走，把持了南京国民政府，于十一月派西征军讨伐唐生智。唐因战事失利，于十一月十二日通电下野，令刘兴、何键退入湘西与周斓所部会合，以保存实力。唐所部主力被桂系收编后，由白崇禧率领进驻唐山、开平一带。周斓、刘兴等离开部队避居乡间。

一九二九年十月，唐生智利用蒋冯战争，重整旗鼓，暗中与各方联络进行反蒋。周斓自然是随唐的。唐生智的反蒋战争不到一个月便遭惨败。唐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再度通电下野。当时，周斓任新八师师长驻邵阳，何键免去了他的职务，以免他率部响应唐生智反蒋。周斓乃暗示其所部团长唐生明哗变，移师广西投入张发奎部，成立第十二军，迎周为军长。随后周部参与讨伐何键的战争。事成后，辞职住汉口。周斓在汉口期间，不问政事，寄情于古籍和书法，课读子女。后来蒋介石与唐生智再度合作，蒋曾派其亲信陈诚到汉口周斓寓所劝其出山，周婉言谢绝了。

周斓于一九三六年初回到家乡湖南祁东，自出资金，并从周姓宗族公产中筹措部分经费，在洪桥镇创办达孝中学（现为祁东县一中），自己担任校长，礼聘一批有识之士来校任教，旨在为国育才。当时聘请的教师中有一位杨开英，是杨开慧烈士的堂妹，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达孝中学内。杨老师是由长沙的中共地下党员通过达孝中生物教员陈安国介绍来的，陈老师把她的情况都如实告诉了周斓。周出于对革命烈属的同情，对杨老师母女倍加照顾。一九三七年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邀请周斓出任省政府总参议，出于爱国之心，周毅然受命。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唐生智接受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职务，周斓应邀出任该长官司令部参谋长。南京沦陷后，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又邀请周斓担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唐生智也致函劝其赴任，周乃前往省政府所在地耒阳就职。一九四四年，日军侵入长沙，直逼衡阳，这时湖南已沦陷大半，省政府分设行署三处主持政务，周斓接受湘南行署主任的职务，在湘南蓝山县设立行署办公。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斓被选为立法委员。他在家乡仍致力于办学，亲自主持达孝中学校务。一九四九年初，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中共地下党省工委的策动下，于湖南酝酿起义，周斓积极奔走效力，在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七十二人中，他名列第九。是年夏天，白崇禧部队退驻湖南时，周斓以自己掌握的地方武装为基础并联合国民党军队中的起义人员陈炳文团长等，在衡阳、祁阳一带组织游击队，多次在湘桂公路上袭击敌人的军车，阻扰逃遁的敌人。白崇禧甚为恼火，派出重兵包围周的住处祁东洪桥镇源山莲庄，搜捕周斓，事发时周斓与之对抗，在所部的掩护下得以逃脱。

解放后，周斓即来长沙居住。一九五〇年冬因患心脏病住

院治疗。一九五三年病情趋于严重，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二岁。省委统战部为他主持了丧事，副省长唐生智和省委统战部领导等亲临吊唁，并慰问其亲属。

鸭绒被创始人丁鹏翥

王 和 政 *

丁鹏翥号博生，湖南衡阳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四十年代后期我和他在湖南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共事。他的年龄大于我，学识在我之上，我以师长事之。他为人刚正不阿，廉洁自持，一生热爱祖国，致力于发展实业，有独特的成就。一九五八年在长沙因病逝世，到现在虽已有二十八周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荡漾在我的脑海中。

丁鹏翥在解放前历任中国合作事业协会湖南分会主任、湖南合作事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大学合作系副教授、湖南合作杂志主编等职。解放后，他去北京，一九五一年即受命为轻工业部草拟全国羽绒工业发展计划，深得轻工业部何长工部长的嘉许。一九五六年从京回湘，被任命为长沙市轻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湖南鸭绒被厂厂长。他一生事业最为人所推重的是首创中国羽绒工业，发明制绒机及其成套设备，写了《中国羽绒工业》一书。

一九一八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外受欧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害，内有南北军阀连年混战，谭延闿主持湘政，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商业普遍遭受摧残，工厂倒闭者甚众，湖南经济陷于极度困难境地，广大劳动群众谋生无路。年仅二十七岁的丁鹏翥，对当时的黑暗腐败政治，十

* 王和政与丁鹏翥曾有同事关系，四十年代后期，丁兼任湖南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总经理时，王兼任常务理事，过从较密。现居长沙市。

分不满，同时他深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目睹现状，忧心如焚。如何开发湖南经济资源，为家乡人民造福，如何发明一种产品，抵制洋货，已成为他时在念中之事。于是他四处奔走，不断探索，起初在开发湖南经济途径中，觉得尚有出口贸易可为，可是在出口物资中如牛皮、山货、矿砂、桐油等，多被巨商大贾操纵垄断，苦于无从着手；继而专心致志寻找资源，企图挖掘人弃我取的未尽之利，经朝夕凝思苦想，深入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鸭、鹅毛等废物，大有利用价值，他当时暗自思忖，那些被人弃之于地的鸭、鹅毛，到处皆是，来源充足，收购容易，价格便宜，若进行整理加工出口，使它变废为宝，难道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

一九一八年初，丁鹏翥开始搜集鸭、鹅毛，与爱人共同试验，首先制成样品，与外商挂钩试探销路。初制样品时，采用手工操作，即将一堆堆鸭、鹅毛排放在工具桌上，手搓口吹，提取绒毛，排除杂质，然后用水洗净晒干，按粗细分等包装，投寄汉口有关单位。不久，得外商复信认可，并在来信中要求选净粗翅，剔净灰杂等物，绒毛才符合外贸出口商品要求。这时，丁鹏翥考虑，外商所提要求，如单纯采用手工制作方法，不仅生产效率低，且难以达到国际标准。同时在手工操作过程中，他看到毛中灰尘杂质与散发出来的腥臭味异常刺鼻，搓选的时候，工人呼吸迫促，容易导致疾病。并且用手工搓散绒毛，因人的呼吸气息吹动，其中轻绒易于飞散。当时丁鹏翥便试以自己的肺活量，尽力吹搓散之绒毛，竟发现绒毛居然轻重不同，被口吹而分远近，且有一定距离，因而想到绒乃羽中佳品，价值更高，倘能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则使绒与羽截然分开，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能提高生产效率。丁氏设想至此，非常兴奋，遂毅然携眷回衡阳原籍，精心研制取代手工操作的机械。这就是丁鹏翥发明羽绒机器的开端。

丁鹏翥回到原籍后，一面继续采用手工提绒，一面设计羽绒机器图样，反复试验，历时数月，始获成功。一九一八年四月正式试制出了第一部铁木结构的提绒车，洗毛、消毒、烘烤等设备，亦于同年七月全部完成。这年冬季，丁鹏翥按照当时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暂行工艺品奖章条例》之规定，将自制机器图样、模型、说明书等件具文呈请农商部，要求审查是否可属发明。第二年三月，接到农商部复函，邀请丁鹏翥到部面洽，丁氏到京后，就地将原机器改良数处，听候审批。他返回湖南不久，又接到农商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四九六号批示，批示说：“查所制羽绒机器，经本部审查，尚属实用，应准按照《暂行工艺品奖章条例》给予专利五年，以示鼓励，填发奖励执照一纸，仰即具领……。”并于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政府公报上刊登。那时候，湖南发明机器而受专利奖赏者，丁鹏翥是第一人。以上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羽绒机器发明的过程。当时欧美各国还没有发明提取羽绒的机器，丁氏羽绒机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提取羽绒的机器，而且用这种机器所制的“丁制鸭绒被”，亦为中国所独有。

丁鹏翥在羽绒的提取方法和羽绒被褥制作技艺等方面，也有所创造和发明。例如，一九二〇年，他发明的横行羽绒衣胆及筛绒方法，都有独到之处。横行衣胆，具有许多优点，为后来横行羽绒制品的开端。

一九二〇年，为扩大羽绒产品销售业务，丁鹏翥夫妇乃于长沙市堂皇里创建我国第一家羽绒企业——长沙华新羽绒公司，一九二一年又扩资组成华新羽绒股份公司，丁鹏翥任董事长兼总技师。公司成立后，生意兴旺，顾客络绎不绝，产品销路日宽，利润亦较丰。第二年，即在邵阳、常德等地设立原料收购点，大量收购鸭、鹅原毛，同时在武汉设立产品推销站，扩大产品销售。当时“丁制鸭绒被”因选料严格，制作精良，

轻软柔和，折叠后体积小，便于旅行携带，且御寒能力强，又能浮水，深受消费者欢迎，远销香港、日本、美国等地，先后获得中央工商部、农商部、上海总商会的奖励。一九二三年，丁鹏翥发明的“丁制三层式被”，质量更好，与当时德国式筒被相比，即显示出优点，胜过欧洲的羽绒产品，曾多次参加国际展览会并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特产奖”，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丁鹏翥经营羽绒工业三十年，一贯重视实践，勇于创造革新，并不断总结制作经验。从一九二五年起，他就著有《整理中国羽绒贸易商榷书》，发表于《湖南实业杂志》新四十五册上，他在文章中希望羽绒业能在全中国普遍推广，以挖掘经济资源未尽之利，使中国工商业尽快繁荣起来。

由于他毕生勤劳，产品系独家经营，行销中外，所以利润亦厚。但他不象旧社会其他商人一样唯利是图，而是经营有术，乐于助人。三十年代末期，丁氏在华新羽绒公司内设立药柜，施药济贫，每年支出药费达千元以上，深得群众赞誉。一九四二年日军逼近长沙，湖南省政府一部份迁驻蓝山，当时有位青年名叫王石波（现任湖南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因学校解散，流亡蓝山，苦无生计，求助于素不相识之丁鹏翥，丁则鼓励他自立谋生，主动借钱给他开饭店，并对王说：“赚了钱是你的，赔了本我负责。”此外他还热心教育事业，曾任长沙修业学校、衡清小学董事等。

我和丁鹏翥先生共事是在长沙和平解放前两年。那时候，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员工生活非常困难，湖南省政府成立员工消费合作社，专门办理员工食米配发事宜，丁兼任该社总经理，我兼任常务理事，因业务关系，经常在一起，有时利用公余，畅话心曲，颇称惬意。记得一个明月之夜，我们同在合作社（原国货陈列馆、现中山路百货大楼隔壁）门前散步，丁先

生很亲切地对我说：“人生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只要在这张白纸之上，涂下无愧于后代子孙的色彩和内容，就会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他还说：“历史似亦有这样一条规律，每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往往就会出现一批仁人志士，振奋而起，自觉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不断探索追求，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寥寥数语，意远情深，至今我记忆犹新。

化学教师郭德垂

郭道晖 郭道光*

三十年代以后，长沙各中学理科教师中出现了一批名教师。学生们在喜得教诲之余，常在学科上冠以老师姓氏，如杨代数、汪几何、方物理、郭化学等等。被称为郭化学的先后有湘阴郭德垂先生和益阳郭琴轩先生二人。

湘阴郭氏是清咸同以后的学术名家，而以曾任广东巡抚、中国首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兵部左侍郎郭嵩焘(筠仙)最为世人所知。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是一个思想开明、头脑清晰爱国心强、有远见卓识的官僚和学者。他出使英伦，走向世界，晚年极力勉励族人子弟必须以现代学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武装头脑”。

郭嵩焘居长，兄弟三人，昆焘、仑焘，都有著作行世，仑焘一支的长曾孙就是郭德垂，郭德垂之父名龙允（号寅伯）是饱学之士。母亲姓聂，是我国早一辈的留日女生，回国后任周南女校学监，后来以毕生精力办湘阴县女子职业学校。

据郭德垂老师自己说：他常常记得父祖辈对后人的勉励，从小就决心做一个科学家、实业家。

一九一三年，郭德垂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即北京大学前身）学习应用化学专业。毕业后入天津永利碱厂工作。作为一个应用化学学生，他想以自己所学当一个企业家，于是自己设

* 作者系郭德垂的子女，郭道晖现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郭道光，原长沙湘江师范副校长，已退休。

小厂制化妆品，他发明了“去斑粉”一种，又编写了《化妆品制造法》一书。他想抵制“洋货”（主要是日货）横流，但在那时，他无资金、无背景，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从事企业失败以后，郭德垂以其毕生精力转向化学教育。他曾因母病，失去了一次庚款赴德留学深造的机会，于一九二〇年回到长沙。这时，长沙中教界涌进了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其中许多人以后都成了省内、国内的著名中学教师。郭德垂从这时起先后在一师、一中、省长女中、周南、长郡、岳云、广益、衡湘、妙高峰、国立十一中以及省外的十多个中学教化学，直到一九五二年调湖南大学化学系任讲师止，先后三十二年。

郭德垂老师的化学课有一个特点，即“深入浅出”，他根据中学生的年龄，用尽一切办法设计种种方案使学生们易记、易懂、易运用。他将课堂化学实验演示与讲解结合在一起，讲述大量的知识，使学生既掌握基础知识又懂得实用。但是，他也有过不幸，有一次在实验室里误用了一种药品，引起爆炸，使右耳残废。

他曾为学生编写了《高中化学》、《中学化学表解》和《中学化学摘要》等三本书（其中包括用韵文写的“化学原子价口诀”），这些书在四十年代成为湖南中学生的“枕中之秘”。后来，赵东樵先生也写了《理化问题详解》，与郭先生的书一道“风靡了众生”。若干年后，他的一些学生成为教授、副教授、高工之后，还在用“郭化学”的书教自己的儿子、孙子。

郭德垂先生调湖大化学系之前，坚守在长沙一中的岗位上。解放前夕，任护校委员会主任。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后，他的七个儿女，都参军、参干，后来全部成为了共产党员。

他自己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过民进长沙市委委

员。

一九五七年，郭德垂因向党反映“长沙市当前补习学校的矛盾”，被错误处理。二十多年来，仍诚恳地工作，对党没有怨言。一九七九年，他接到平反通知书后，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含着眼泪说：“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好！”次年五月以心力衰竭在长沙岳麓寓所去世，得年八十四岁。

龙伯坚传略

黎 丰*

家 世

龙伯坚，原名龙毓莹，祖籍湖南攸县，出身世家，生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他的祖父龙湛霖（芝生），系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侍郎。戊戌政变后，辞官住长沙西园私邸，为湖南新派，主张创办学校，振兴实业，刷新政治，曾任明德学堂总理。

他的父亲龙绂瑞（蔓溪），曾任四川提法使。辞官后在长沙协助堂伯龙璋和留日归国学生胡元倓（子靖）等创办明德学堂、经正学堂，自己还创办了湖南民立第一女学，为湖南最早开办的女子学校。辛亥革命后，任湖南军政府交通司司长。

龙伯坚幼年，由父亲龙绂瑞延聘老师在家读旧学。以后，又延聘教师补习英语和数学等现代学科。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三年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名湘雅医学院，为湖南医学院前身）读书，先读预科两年，后读本科五年，为第三届毕业生。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展后，曾和毛泽东（润之）一起编辑《新湖南》周刊。

一九二三年，龙伯坚刚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在湘期间曾任命他为军医处长。谭延闿和龙伯坚的

* 黎丰系党史工作者，他根据龙伯坚部分亲属、故旧的回忆以及有关资料撰写此文。

父亲龙绂瑞是拜把兄弟。龙伯坚既学医，又擅长诗文，谭延闿读了他的文章后，曾致书称：“殚精学术，夙所知闻，才思芬芳，乃今始识。”

一九二九年，龙伯坚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任技正。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由卫生署选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系进修两年，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一九三四年，由卫生署委派担任湖南省民政厅所属新设的湖南省卫生实验处处长。当时，湖南卫生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龙伯坚任处长后，主要精力放在湖南七十多个县卫生院的创建上。至一九三七年，全省卫生事业初具规模。

抗日战争初期，龙伯坚调任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保健处处长。一九三九年在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时，又调任西北七省卫生专员，直至一九四一年。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知道龙伯坚在西安天水行营工作，曾于一九四〇年写过一封信，通过八路军办事处转给龙伯坚，并写了一首词送给他，同时送给他《论持久战》等小册子。可惜这首词和信件、小册子，后来全家由贵阳迁回湖南时装在行李船上，在冷水滩发生翻船事故而被淹没。长沙解放后，龙伯坚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到当年毛主席送给他的那首词已遗失，请毛主席再将那首词写给他。毛主席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复信说：“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

一九四一年，龙伯坚因病离天水行营职，到父亲住的贵阳花溪休养。随后，全家由贵阳回长沙。一九四二年，全家又由长沙迁至祖籍攸县，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一九四三年他闲居在家时，就想为中国医学古籍写集解，在此期间读了不少书，并着手收集资料。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龙伯坚第二次被委任为湖南省卫生处处长。他花了很多心血，在全省各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所在地，创建了略具规模的医院。一九四八年还成立了湖南省立中医院，曹伯闻任院长。长沙解放前，他还为掩护和支持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活动，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和平解放后，龙伯坚因对革命有贡献，第三次担任湖南临时省政府卫生处处长。一九五〇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一九五一年调任中南卫生部教材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年底，又被任命为中南抗美援朝医疗队大队长，曾去东北工作。

一九五三年，龙伯坚调北京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所长。一九五五年成立中医研究院时，又调该院医史研究室任一级研究员。此后，龙伯坚主要从事《黄帝内经集解》的编写工作。

一九五七年，龙伯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降为四级研究员。一九五九年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工作。一九六一年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九六二年结业。同年国庆节前夕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九七八年正式获得平反。一九八〇年任湖南省政协常委。

一九六八年，龙伯坚曾写《七十自序》，概述生平，抒情言志，自慰自勉。章士钊看后赞叹并写道：“置之怀袖者数日，叹三十年来，未曾见此类高华文字。”

龙伯坚晚年双目失明。一九八三年初，《黄帝内经集解》在他学医的儿子龙式昭协助下整理完稿，了却生平一大心愿，在中国医学史上作出一大贡献。

办《新湖南》周刊

一九一九年，龙伯坚在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本科一年级读书。五月四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长沙，各校学生纷起响应，游行示威，成立学生会，出版宣传刊物。湘

雅医学专门学校先是办的《学生救国报》，龙伯坚任主编，出了两期。以后改名为《新湖南》周刊，由龙伯坚、毛泽东先后任主编。《新湖南》的刊名是龙伯坚取的。其由来是辛亥革命以前，湖南有位同盟会的革命人物杨守仁（笃生），在日本留学期间，著有一本鼓吹革命的小册子《新湖南》，宣传自由民主，有“在天心阁撞自由钟”的句子，意在唤醒湖南民众，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湖南青年受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很深。因此，经龙伯坚提议，湘雅学生会的刊物也就取了《新湖南》这个名字。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七月，毛泽东发起组织湖南学生周报联合会，以便指导各校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刊物。当时由省学联的《湘江评论》、周南女校的《女界钟》、明德学校的《明德周刊》、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甲种工业学校的《工学周刊》、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等主要周刊，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湖南学生周报联合会，并公推龙伯坚为总干事。会址设在楚怡小学。每次开会，毛泽东都代表《湘江评论》参加，对办好周刊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新湖南》周刊共出九期。第一、二期由龙伯坚主编，同学李振翩、张维任编辑委员。这两期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民主和科学，鼓吹爱国运动。每期印一千份，除在省内发行外，还远销北京和江浙一带。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办刊物需要钱，学生便主动提出每桌每餐由六碗菜减少到四碗菜，用节约的菜钱作为学生运动和出版刊物的经费。

《新湖南》周刊出第二期时，学校已经放假。同学们都回家去了，龙伯坚为以后几期缺少稿件发愁。八月上旬的一天，他正伏案写文章，张维走进房来，气愤地告诉他，湖南督军张敬尧把省学联查封了，《湘江评论》第五期正在付印，也被

查封了。两人大骂军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张维又告诉他，毛润之还有文章没有发表。龙伯坚将笔一放说：“有办法了，我们去找毛润之来办《新湖南》。”他对毛泽东的思想、文章非常佩服。于是约请毛泽东在图书馆会面。龙伯坚，张维和李振翩一起来到报纸阅览室，看见毛泽东穿着一件干净的长袍子，坐在一张长桌边看报纸。龙伯坚介绍李振翩和毛泽东认识了，接着提出请毛泽东参加办《新湖南》周刊的要求。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

以后，《新湖南》周刊实际上由毛泽东主编。他经常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宿舍写文章，编稿子。龙伯坚也就常和毛泽东谈论时事和文章，受到很多教益。毛泽东才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更使龙伯坚钦佩的是他一边和别人侃侃而谈，一边振笔疾书，很快就写好一篇文章。

从第三期起，《新湖南》周刊就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传统。第七期又进行革新，提出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在这期里，发表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重要文章。当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一号，还介绍了《新湖南》周刊的革新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作用。《新湖南》周刊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刊登的长沙特约通讯说：“湘雅医专发行底《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旅欧华人团体创办的《旅欧周刊》也介绍说：“湘雅学校发行之《新湖南》，为《湘江评论》之化身，内容极为完美。”由于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笔锋犀利，抨击时政，出到第九期时，也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

三十年后的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和平解放，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于八月十五日创刊，毛主席书写了报名。龙伯坚想起五四时期的《新湖南》周刊，便在这年十一月十

一日写信问毛主席，用《新湖南报》这个报名，是不是和当年《新湖南》周刊有关系。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毛主席回信说：“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

一九五〇年，龙伯坚到北京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主席接见了。毛主席还向陪同接见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介绍说：“这是我从前在湖南从事革命工作的老同志。”

长沙解放前的“复壁藏宾”

《后汉书》中《赵歧传》有复壁藏宾的故事。龙伯坚和他的父亲都掩护过革命志士，也传为佳话。

龙伯坚的父亲龙绂瑞在辛亥革命前掩护过黄兴。一九〇四年十月，在长沙领导华兴会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黄兴，准备在西太后七十生辰（农历十月初十），省中文武官员在万寿宫遥祝时举行起义。事被泄露，清朝官吏派军警搜捕，并悬赏缉拿黄兴。龙绂瑞闻讯后，便把黄兴藏在他家西园一间密室里，避难三天，又转藏到圣公会楼上，使黄兴脱险得以东渡日本。黄兴死后，龙绂瑞作挽联：“一时毁誉总皮毛，记当年复壁留宾，早识英雄本天授；廿载交期如骨肉，才几日寓庐话别，空余涕泪望魂归。”这件事给龙伯坚印象很深。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龙伯坚当时任湖南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卫生处主任秘书曹治阳是地下党员，就住在上麻园岭肺病医院内龙伯坚家里。有一天，曹治阳对龙伯坚说：“你的父亲在前清黄兴领导华兴会革命时掩护过他，帮助他避难脱险。假如现在也有一个革命人士需要隐蔽，你是不是愿意掩护他？”龙伯坚回答：“当然愿意。”曹治阳又说：“有一位唐光前先生，原先住在孤儿院，由曹伯闻院长掩护他。现在曹伯闻不当院长了，他就要另外找地方住了。如果你愿意掩护他，我就介

绍他来和你见面。”龙伯坚说：“好吧，什么时候见面？”曹治阳告诉他：“明天下午五点多钟，你在家里等着，唐先生手里会拿一支电筒来找你。”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龙伯坚在书房里看书，果然那位唐先生穿着长袍，拿着电筒来了。他们初次见面就长谈了三个钟头。当时龙伯坚猜想这位唐先生是个共产党员，可是还不知道他是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周礼。先是唐先生请龙伯坚谈谈对局势的看法。龙伯坚思想比较进步，他认为蒋介石发动内战，政治腐败，经济困难，民不聊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代总统李宗仁准备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省政府主席程潜也赞成和谈；老百姓都不愿意打仗，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唐先生也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共产党争取和平的政策，并且分析了湖南情况，认为程潜拥护和谈，下令停止征兵，暂缓征粮，释放一批政治犯，态度积极，是可以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唐先生知道龙伯坚早在“五四”时期就和毛泽东一起办过《新湖南》周刊，希望龙伯坚继续为革命为人民工作。

过了一天，曹治阳告诉龙伯坚，唐先生决定到他家来住。随即，龙伯坚把在湘雅医学院读书的儿子龙式昭的房子让了出来。唐先生有时就来他家住，有时只白天在他家看文件，写材料。每次来都闭门不出，也没有人来找他。龙伯坚家屋后有个比较隐蔽的地下室，唐先生有时就把一般的文件和宣传品，藏在地下室门后的箱子里。

当时地下党员需要找社会职业来掩护革命工作。龙伯坚给唐先生安排了一个卫生处视察员的名义上的职务，可以不到差，不上班。他还介绍常杏云等地下党员，到卫生处和卫生处的下属单位工作。以后龙伯坚又用卫生处的名义，在麻园岭附近租了一个公馆，给唐先生一家住下。公馆的主人是国民党的一个

军官，他看到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挥师南下，便跑到香港去了。这个公馆房间多，省工委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就在这里秘密办公。

解放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湖南省政协为副主席、民革湖南省主任委员曹伯闻举行追悼会时，龙伯坚送了一副挽联：“南州普及病坊，故乡创业公支我；末世勉追家范，复壁藏宾我继公。”抗日战争前龙伯坚第一次任湖南省卫生实验处处长时，属民政厅领导，当时任民政厅长的曹伯闻对他创建县卫生院支持很大，所以称“公支我”。解放战争时期曹伯闻任孤儿院院长时曾掩护地下党的省工委，龙伯坚受他父亲过去掩护革命党人黄兴的影响，继续做掩护地下党省工委的工作，所以言“勉追家范”和“我继公”。

支持地下党的活动

长沙解放前，地下党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和发展进步力量，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参加时事学习小组或时事座谈会。通过学习、座谈，一方面可以了解军、政、工、商、文、教各界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对革命形势和共产党政策的认识，赞助和支持人民解放事业。一九四九年四月间，曹治阳和龙伯坚商谈组织时事学习小组，龙伯坚立即去邀了湘雅医学院院长兼精神病学主任教授凌敏猷、内科主任教授王肇勋和结核病科教授单传烈一起参加。这三位教授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思想进步。成立时事学习小组后，每周在龙伯坚家里学习座谈一次，由曹治阳主持，龙伯坚招待便餐。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解放军入城政策等。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支持学生运动，组织教职员工护校，为迎接解放，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湖南地下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姜亚勋的部队，缺少医药，要求省工委派医生和送药品到部队去。唐先生和曹治阳请龙伯坚想办法。龙伯坚便和凌敏猷商量，找了新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回来的助教陈枯鑫和湘雅医院医生沈维廉，动员他们支援游击队，又从湘雅医院秘密拨出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部队。省工委派了地下党员汤健民，护送医生和药品、医疗器械到湘中第一支队。两位医生参加游击队后，冒着生命危险，在湘潭打姜畲等战斗中，上战场救死扶伤，医治了不少伤员。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占湖南临湘县。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强迫长沙绥靖公署、湖南省政府及所属机关迁往邵阳，一些国民党官兵乘乱抢劫物资。龙伯坚根据地下党的意见，决定卫生处不搬迁，把药品和医疗器械保存下来，以便解放后使用。经过龙伯坚和凌敏猷商量，为了防止国民党官兵乘乱抢劫药品器械，把放在长沙火车北站附近卫生处仓库中的四百多箱药品器械，转移到了湘雅医院的地下室里。

龙伯坚还从经济上和其他物资方面支援地下党。如给地下党提供经费，供应地下党印刷宣传品的纸张等。有次省工委需要钱用，龙伯坚一次就提供了二百块银元。

狱 中 斗 争

龙伯坚把卫生处仓库里的药品器械转移到湘雅医院后，事情被泄露了。七月上旬，卫生处有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支队长尹一彬，向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告密，说龙伯坚和共产党有联系。一是用人可疑，卫生处的主任秘书曹治阳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二是拒迁邵阳，当时省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邵阳，许多机关的主管都在纷纷收拾行李，焚毁档案，准备动身，只有龙伯坚若无其事，家里一针一

线也没有动；三是贪污药品，卫生处库存药品很多，龙伯坚暗地把这些东西寄存在湘雅医院去了。陈明仁不明真相，在这份密告上批示：“交稽查处拿办。”稽查处处长、军统特务毛健钧马上派特务去抓龙伯坚。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龙伯坚正在尚德街刘卧云医生家和刘卧云、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协均中学校长陈虔僧一起打麻将。忽然进来四个穿黑绸短褂的人，其中一个走来客客气气地说：“警备司令部请龙处长去一下，有点事。”龙伯坚这时正在庄上和了一个满贯，高兴得很，听说要他去警备司令部，不觉一惊。那特务接着说：“等你们打完这圈牌再走吧！”龙伯坚把牌一推说：“不打了。”他坐上包车，随着几个特务走了。

龙伯坚被捕后，关在浏正街居士林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单人房间里。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把他带到湘雅医院，去搜查地下室的药品器械。特务叫他坐在进门的一间房子里，恰巧凌敏猷这时进门来了。龙伯坚便打招呼，用英语说：“我是因为药品的事被捕了。”一个特务在旁边瞪眼道：“中国人讲什么外国话。”不让他们交谈。特务随即开来两部卡车，把药品器械装上车开走了，又把龙伯坚带到居士林关起来。

第三天上午，特务又到肺病医院和龙伯坚家搜查。龙伯坚的爱人曹慧，早已通知唐先生和曹治阳离开，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宣传品和学习资料也转移了。省工委的秘书赵光白这天正在清理一包宣传材料，曹慧看到特务进了医院，叫他快走。那包宣传资料就请保姆王妈帮忙，夹在雨伞里带出门去了。特务到处搜查，但一无所获。

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官，先是客客气气和龙伯坚谈话，谈得没有什么结果，就进行审问，龙伯坚没有招供一个地下党员，也没有承认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人在他家里开过会。至于不执行

省政府搬迁邵阳的命令，龙伯坚说卫生处要搬迁的主要是药品器械，如若忙乱搬迁，必有散失。把药品器械存放在湘雅医院，也是为了便于保管，决没有想贪污药品器械的事。警备司令部问不出什么罪名，就把他转移到浏正街由一家烟厂改造的一个监狱里。监狱出口处围着很粗的木栅栏，牢房四周的窗口很高、很小，都用铁丝网和木板钉着，里面关押的大都是政治犯。同牢房的有一位《工商日报》的主笔杨任之，是以“煽动和谈，为匪张目”的罪名被捕的。他们早就相识，入狱在一起，由志同道合而成患难之交。杨任之是一条硬汉子，没有任何口供，军法官也拿他毫无办法。还有一个小学教员许在一，是以共产党嫌疑被关押的，多次审问，受尽鞭打、灌辣椒水、踩杠子等酷刑，也没有招出自己是共产党员，白崇禧批了字要枪毙他。在他们牢房对面，有一间死牢房。每次枪毙人的时候，先一晚在牢房外点名，被点名要枪毙的人，就从大牢房里提出来，关入死牢。第二天清早，就上绑拖出去枪决。龙伯坚和杨任之认为“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都经受了考验。

龙伯坚被捕不久，有天黄坚医师去看他，好不容易找了在警备司令部当总务处处长的奚胡子，因为是熟人，才同意把龙伯坚喊出来见面。黄坚象开玩笑一样地问：“怎么回事，搞到这里来了。”龙伯坚说：“这不是好玩的，说什么我和共产党有关系，又说什么贪污药品。这个地方随时可以枪毙人，不晓得哪天会轮到我。”黄坚说：“有什么法子能帮你的忙吗？”龙伯坚说：“你去找唐生明，说我在这里危险。”龙伯坚和唐生明有交往，知道唐生明经常和陈明仁一起打麻将，好说话。黄坚便去找了唐生明。唐生明告诉他：“你要龙伯坚安心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省工委书记周礼（唐先生）知道龙伯坚被捕后，立即向曹治阳和省工委统战小组负责人余志宏说：一定要尽力营救。余志宏等又通过与陈明仁关系密切的人

士去做工作，唐生明和文于一都帮了忙。龙伯坚的好友凌敏猷、黄坚、刘卧云等都设法奔走营救，凌敏猷还亲自向陈明仁说了药品的事没有问题。陈明仁这时正准备起义，加上龙伯坚没有什么口供就下令释放了。八月初的一天，军法处副处长谢熊给刘卧云打电话说，龙伯坚没事了，可以接他回家。刘卧云便去监狱，把龙伯坚接出来，送他回家了。

编写《黄帝内经集解》

龙伯坚于一九五五年调任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一级研究员后，将研究课题定为编写《黄帝内经集解》。不料在一九五七年、中医研究院错误地把他作为“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就连他编写《黄帝内经集解》也被说成是别有用心，成了一个罪名。

龙伯坚对中央提出的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方针是拥护的，一九五〇年他担任湖南省政府卫生处处长时，去北京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他，对他谈到要重视中医中药，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不能单靠西医，犹如中国搞运输既要有飞机、火车，也还要有土车子。毛主席说的中西医结合，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思想，给龙伯坚很大的启发。龙伯坚回湖南后，就比较重视发展中医事业。龙伯坚编写《黄帝内经集解》，也是想要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和继承祖国医学遗产作出贡献。

一九五七年，龙伯坚在鸣放中对中医工作提了一些意见。不料大祸临头，会场上、报纸上、大字报，接连对他进行批判，加以“反对党的领导，破坏中医政策”等罪名。他说研究中医要“沙中拣金”，批判时就歪曲成他认为中医没有什么价值。他主张西医学习中医可以一边学习一边研究，批判时又说成是他认为中医不值得一学，煽动西医反对学习中医。就连他说的“凡是中国人都是有爱国心的”，“对接受医学文化遗产，没

有一个西医不乐意做”这些话,也被指责为“别有用心地混淆是非”。甚至把他的研究《黄帝内经》,说成是企图往内经里钻空子,从根本上否定中医理论,以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生活上也遇到困难,但是却没有影响他致力于研究工作的决心,反而更加紧张地投入到整理和编写《黄帝内经集解》的工作中去。

《黄帝内经》是两千年前的一部医学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医学价值很高。因为文字难懂,过去又没有人做系统的解释工作,所以它的重要性很少为人所知,没有引起世界医学专家的普遍注目。龙伯坚经常感叹说,有些搞中医的人,不懂古汉语,对中医学很少研究,因而医道不精。又说,十三经已为清人作了注释,可是《黄帝内经》流传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佶屈聱牙,难于读懂。他的古汉语造诣很深,读过许多医学古籍,为了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发扬中华民族的医学成就,他下决心作注释《黄帝内经》的工作。早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他就着手积累资料。一九五九年以后,他专心编写《黄帝内经集解》。他收集藏书达六十多万卷,其中大量为医学古籍。他刻苦钻研,仅研究《黄帝内经》断句,就花了一年时间。为了把《黄帝内经》译成现代汉语,他往往为弄清一个字的确切含义,不惜翻阅几十本医书。他从浩如烟海的医林文献中,吸取历代医学家有关《黄帝内经》论著的精华,重点考证了五十多种不同见解,添加按语,精心编分,始终不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他被错划为右派的冤案也得到了改正,工作更加努力。这时他视神经出现萎缩,视力逐渐减退。领导上便将他在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工作的儿子龙式昭借调到北京,协助他编写《黄帝内经集解》。

一九八〇年十月国庆节前夕,龙伯坚和湖南老友如产科专

家黄坚、内科专家刘卧云、小儿科专家谭冠龙，在北京聚会了。恰好四老都是八十岁高龄，这天和夫人们一起，在新侨饭店欢宴，共做三百二十岁大寿。大家说古道今，各述所怀。老友们预祝龙伯坚完成编写《黄帝内经集解》这件医学史上的大事，同时劝他不要太辛苦了，要注意身体。龙伯坚说：“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写完啊！”

一九八一年三月，《黄帝内经素问集解》已整理完稿，《黄帝内经灵枢集解》初稿也已完成，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写信给胡耀邦同志，推荐出版。九月，龙伯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签订了关于出版《黄帝内经集解》的协议书。龙伯坚非常高兴，写了《黄帝内经集解出版喜赋》一诗：“集解辛勤四十年，喜看出版及生前；红尘不负轮回转，鸿雪能留一代缘。”

龙伯坚在一九八三年逝世前，终于完成了《黄帝内经集解》的编写工作。他先后著有《黄帝内经概论》一本、《黄帝内经素问集解》二十四卷、《黄帝内经灵枢集解》二十四卷，共约四百万字。龙伯坚四十年心血凝成的书稿，受到国内外医学专家的重视。著名内科学专家张孝骞为他撰写推荐文章，赞扬“此书之成，不仅为促进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新医学、新药学将起巨大的作用，而且可丰富世界医学史，俾中外医学家更了然于我国对世界医学的卓越贡献。”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收到龙伯坚寄赠的《黄帝内经概论》后，回信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并表示将“铺红地毯欢迎”他去伦敦参观、讲学。

龙伯坚为《黄帝内经集解》写的自序诗云：“渠渠厦屋，众力所成；块砖片瓦，分位无名。年力有限，了此长征；尽我微薄，不负吾生。”

简介父亲焦达悌的一生

焦 传 爱*

父亲焦达悌字岛松，一九〇三年农历三月初二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上北乡均嘉坊大屋场，距省城长沙一百三十华里，今属浏阳县龙伏乡均嘉村。

祖父焦彞卿（1864—1928）从事教育，曾任团总，尔后转入工商界，曾在江西萍乡某煤矿入股为董事。

父亲生前同胞兄弟共六人，大伯焦达峰辛亥革命后任湖南第一任都督，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立宪派兵变中惨遭杀害。

少年时期，父亲在焦家祠堂设立的家塾读书，一九二一年报考长沙平民大学，一九二三年缀学，次年赴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平定陈炯明叛乱的战斗。毕业后，被分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程潜手下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北伐战争中，他作战英勇，立有战功。

一九二七年，父亲任南京总司令部侍从副官，一九二八年改任南京警卫三团团长。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任浙江二淮盐务缉私局局长，后因经理股长黄明谟，拐走一个月的军饷二万余元而被撤职关押。当时焦达峰女婿黄佛（今湘潭市政协委员）正在南京任教，得知此消息后随即多方奔走，想方设法筹集钱财，如数偿还军饷，才使父亲免受牢狱之灾。

一九三一年，父亲因前妻病故，加之一度失意，经朋友劝慰

* 焦传爱系焦达悌四子，文中内容一部分是作者亲见亲闻，一部分由其兄、胞兄、母亲口述。现居长沙市。

在南京与文淑华结婚。尔后得到张静江的同情和帮助，与浙江省保安处处长朱世明磋商，才得以安排任保安二团团长。一九三二年又经黄埔军校湘籍同学李觉、李默庵、蒋伏生等人疏通，出任八十九师某旅副旅长。后因他参加了以李济深先生为首组织的反蒋活动，被捕在军人监狱关押了十个月，经李济深先生出面聘请江一平律师进行辩护后保释。

抗日战争暴发后，他被调任四川省达县任巴中团管区司令，搞征兵工作。同时在县城和农村各处张贴抗日救亡的宣传画。但是他目睹当时的现状，征兵工作由抽壮丁变为卖壮丁、抓壮丁后，就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调离工作。一九三九年底调任重庆兵役署任上校附员。

在重庆时，国民政府号召军民捐献救国。父亲把家中当时仅有的五千元积蓄取出，以祖母阎少陵的名义，捐献给了政府。当时《国民日报》曾报道焦阎氏为国捐款的消息。

父亲在重庆与友人谈吐中常露出不满之辞。如见国民党军官麇集重庆，就以“将官满街走，校官多似狗”来讥讽。不久，他打报告申述要求到前方去。一九四一年得以批准离渝返湘，在当时湖南省政府所在地耒阳，任军管区上校附员。以后又调任第九战区长官部任少将高参兼长沙防空司令部参谋长。

一九四四年春，日军四次进犯湘北，湘北地区随即沦陷。他和友人李亚南、四叔焦达巖在浏阳家乡积极组织筹建浏北的自卫力量，打击日军，保卫桑梓，成立了湘北抗日挺进纵队。为了扩充抗日力量，还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和国民党散兵游勇张森的部队等。在收编张森时，父亲那时已兼任浏阳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他带领李亚南、周佛生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三次去张森部队谈判，最后以哥老会名义和他们为首几人插血为盟结拜成的兄弟，才达成协议。并在浏阳上北乡九峰山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数十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和马匹等军用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一九四七年调到南岳二十七军官总队任五大队大队长。二十七军官总队解散后，又调任中央训练团讲师。一九四八年他由南岳返回长沙，和一些国民党失意军人一起组织自救会。当时有一个邵阳人叫刘华严（聿子），经常带人来我家和父亲商谈，每次来家父亲总是叫我和哥哥在外间房做功课，并嘱咐我们如有客来，就要我们事先禀报。

一九四八年秋末冬初之时，父亲又调长沙绥靖公署任少将高参。一九四九年五月，他通过刘华严的关系，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的长沙第七总部（三一三〇）取得了联系，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师师长”。不久，他又被程潜将军召见（当时我们居住在二伯父焦达人的止庐寓所内，今长沙市第一中学宿舍）。父亲回到家对母亲说：颂公委任他为湖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和浏阳县长。并说颂公接见他时讲：“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仗是没有打手了，好好去干吧！”还送了他一张印有“服务桑梓，多施仁政”的名片。父亲持颂公所赠的名片，又拜会了当时颂公的秘书毛注青，毛秘书见颂公名片和手迹，也以“审时度势，好自为之”作为临别赠言。

父亲眼见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便想利用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专员这一合法身份，伺机率部起义投靠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他带领我二哥焦宏昌和原在南岳二十七军官总队五大队的于培基，随同陈明仁将军派去护卫的武装人员，分乘两辆汽车前往浏阳县赴任。

父亲在浏阳任内的四十七天中，除与白崇禧的特工处处长韩蒙轩指派监视父亲的一个加强连进行周旋外，同时还要应付一二六军张湘泽部队的骚扰。在此期间，他收编四乡游杂部队共一千五百余人，收缴各种武器一千三百余件。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浏阳全境解放。为迎接解放军入城，他即率领所属部队撤离浏阳县城。同时还指派参谋长刘逸秋（三一三〇长沙总部行动小组长）和县政府主任秘书晏伯宸二人，以及县政府教育科长焦传统（焦达峰之子）共同组建浏阳县人民临时治安支前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迎接解放军入城。当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一三三师等部队顺利进入浏阳县城，当时秩序良好。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以焦达梯为首的湖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和第一区保安司令部，以及浏阳县政府等所属军政人员和部队，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三师、一五九师和浏阳县人民政府的改编。

父亲在接受改编工作完成后，于同年九月间曾给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王首道同志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倾向共产党，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心迹。内容如下：“王副主任：昔先父、兄为中国革命，倾家荡产。辛亥首义，光复湖南，胞兄达峰先身殉难。梯幼秉庭训，置身革命，思有以继先人未完之志，不计其它。维处于封建独裁统治之下，清白之身，未为所染，此是甚以告慰先父、兄者也。此次回浏工作，明知是跳火坑的事，但无目的、无任务的使命，我愿负此艰难。梯于六月一日接任伪一（区）专员，俟后及到浏阳之后，以当时严重局面兼理县长，虽在暂短工作期中，自问尽了最大努力。浏阳解放前夕，华中局长沙七总部派员联络，一切行动尽依照决定指示办理。解放后，接奉人民政府办事处吴主任指示，将部队集结于荆坪整编，归一五九师指挥，并派刘兴起同志为军事代表协助整编事宜。近又奉浏阳县人民政府赵县长通知，改派张立栋同志为军事代表，部队归人民政府指挥，并命将所属部队即日移驻浏阳，及到达后，旋即归一三三师改编。在一切行动听指挥之下，悉遵命令处理，虽无成绩可观，也足慰我初衷矣。白部

队改编后，专心处理移交工作，现所有伪专署及伪县府之交待，在悌本人任内，一切手续业告一结束。此致，敬礼！焦达悌。一九四九年九月。”

一九四九年九月（即中秋节）后的一天上午，父亲在二位解放军战士护送下，回到了长沙住地止庐家中。同年十二月即被分配参加中南军政大学十二总队三大队学习。

父亲在军大学习时，我曾数次到学校看望他。我和两个哥哥焦传忠、焦宏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都在部队与父亲通信数次，每次他总是勉励我们在部队要好好工作，跟共产党走。

一九五二年，父亲由于过去的历史问题被错误镇压，时年四十九岁。由于他的缘故，我们三兄弟也先后复员回地方。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也受到了冲击。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六号文件精神，省、市、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等各级领导机关给父亲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并妥善安排了母亲文淑华的生活。今年三月，广州军区又给父亲补发了起义证书。

我所了解的石声汉教授

姜 义 安*

先师石声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和中国古农学研究专家，他早年在辛树帜先生（湖南临澧人，其传刊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领导的广西瑶山生物考察、采集工作中，因成绩卓著而闻名于世。后来，他致力于我国古农书的研究，主持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工作，整理、校注了《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著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一九五六春，我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帮助姨丈顾颉刚先生整理资料时，西北农学院辛树帜院长去看望顾先生，谈到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室，由石声汉教授领导，并约我参加这项工作，我欣然从命，得与石先生相识。我以后学晚辈的身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学习，十多年朝夕与共，日无间断。他的高洁人格、坚毅不懈的治学态度、刻苦忘我的勤奋工作精神，感我肺腑，终生难忘。他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外的饱学之士，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中国自然科学，尤其在整理祖国农业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辉煌贡献，不幸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及病魔的摧残，不得终其天年。

我于悲痛之余，根据他的日记残篇，他的亲人口述以及平日个人所见所闻，简述其生平事迹，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 姜义安现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工作，曾担任石声汉教授的助手。本文是他根据石声汉教授残存日记和自己的亲见亲闻写成。

童年、小学和中学时期

石声汉先生原籍湖南湘潭县仙女乡，寄居长沙，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出生在一个潦倒的知识分子家庭。

石先生的父亲（1870—1934）读书很多，精于书画、金石篆刻，会作旧体诗文。辛亥革命前，为生活奔波四方，石先生就是他三十七岁时在昆明云南善后局任职时生的。辛亥后，他带着全家回到湖南长沙，先后担任小学、湖南省教育会、民间慈善团体的低级职员，收入微薄，还时常找不到工作。石先生的母亲（1883—1955）姓俞，是个穷秀才的女儿。

石先生是长子，从小受到父母的钟爱和严格的家庭教育。五岁时，读完《四书》，入小学前读完了《诗经》、《左传》，还学了不少诗词古文。这为他以后研究古代农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同时还学习了书法、篆刻等。

由于家庭的熏陶和父母的教育，石先生从小便养成了刚直坚毅的性格，他每天用功到凌晨三点左右，在睡觉前，再把二弟声淮（现任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叫醒读书，直到天亮。所以他们家有夜不息灯的轶闻。

一九一四年，他七岁，入父亲所在的长沙楚怡小学。何叔衡同志作过他的级任教师，对石先生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何的“世无权威，只有真理”的名言，更成为石先生终生不易的信念和遵循的准则。他经常给何叔衡同志传送书信，而且还积极参加一些爱国的政治运动，如毛泽东领导的抗议福州惨案的示威和一九一九年驱逐张敬尧出湘运动等。由于家境困难，无力缴纳学费，他小学读书六年半，曾四次辍学。

一九二〇年，石先生小学还未毕业（当时学制七年），以插班生资格考进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有段时间，他父亲失了业，全家生活非常困难，石先生几乎要辍学了。幸赖湖南教育界的前

辈，当时明德中学校长胡子靖先生和辛树帜先生等几位教师，介绍他帮助学校管理图书，免交学杂费，又推荐他给一些有钱的人家当家庭教师，才免于辍学。因此，他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他喜欢生物学、化学，对英文也颇有修养，曾阅读过狄更斯、萨克雷等人的英文原版小说和雪莱、拜伦等人英文原版诗歌，又从国文教师刘永济先生（已故武汉大学教授）学会了填词。他后来从事的专业虽属自然科学，但他一直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造诣。

在此期间，石先生也参加一些进步的政治活动，曾自发地带着弟弟们把大卷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屠杀中国人民的标语和漫画张贴在街上。以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他曾说服母亲，冒着风险把他的同学、共产党员庞人侃（化名彭君彦）带到家里，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庞人侃转移到一家书店。

大 学 时 期

一九二四年，石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他父亲在天津谋到了一个待遇很低的工作，无力供他上学。当时湖南教育司的李剑农先生看到他的试卷，又从明德中学一些教师那里听到他的学习情况和家境后，就与教育司一些同事及明德中学几位教师筹募了一笔钱，帮助他解决了衣被、旅费和生活费用。

武昌高师设在武昌阅马场（现为湖北教师进修学院校址），李剑农先生还写信介绍他到距离高师不远的湖南旅鄂小学（现为武昌先贤街学校校址）勤工俭学，挣点收入。

他当时不满十七岁，在同学中年龄最小，但由于他勤奋好学、朴实诚恳，受到大家的尊敬，许多同学成了他的终身挚友，如吴印禅（已故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赵佩莹（已故

广西大学化学系教授)、毛路真(已故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等。他们都比石先生大几岁甚至十多岁。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汉口英租界曾因散发传单被英国“巡捕”逮捕过。以后,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学习中,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北伐战争以后,武昌高师先后改名为第二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武昌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石先生便因“思想空幻,态度灰色”(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性组织)被开除学籍。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打击,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的痛恨。他回到家里,闲住了半年,除读书外,还常和一位较远的亲戚、已故作家罗黑芷先生交往,为罗先生主编的报纸副刊写些短篇小说,并译出印度诗人泰戈尔著名的作品《企鵝拉》。

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编译馆时期

一九二七年,经当时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辛树帜先生介绍,石先生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助理员,同时补修生物系未修完的功课。次年升任助教,并参加辛树帜先生主持的瑶山生物采集队,深入瑶山数月。石先生除采集和制作动、植物标本,兼理队里一切函牍杂事外,三个月中,还写戚八万余言的《广西瑶山采集队日程》(同年中山大学出版),把采集时的感想、经历,描写得生动周详,并对动、植物的改良、补救、采集方法和应注意的各点,作了具体论述。材料还囊括了瑶山概况、瑶民生活及生物情形等等,莫不详分缕析,条理井然。由于石先生的文字明净、质朴、优美,这本书除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外,还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当时曾经被推荐为中学课外读本。他在中山大学一直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其中于一九二九年,因吐血,先后在广

西桂林、梧州各地休养半年，分别在广西第二师范（桂林）和第二中学（梧州）教过书。这段时期，他学会了拉丁文，并研究了语言学和《广韵》等书，这几年他写作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兽学丛书》第一集、第三集，《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日程》，《中国哺乳类学丛书》第三集，《广西瑶山哺乳类报告》，《湖南之哺乳类》，《广东北江瑶山哺乳类报告》，《续记广东北江哺乳类》，《采集广西瑶山报告及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瑶歌》等书。《瑶歌》是他在瑶山从事采集工作之余，晚间深入村民，搜集的二百多首瑶民歌曲。这些民歌用罗马字母，英文拼音法标音，刊登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广西瑶山调查专号》上（一九二八年四卷四十六、四十七期合刊），是研究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宝贵资料。

一九三一年，石先生到杭州任浙江大学讲师。

一九三二年暑假和许慕贞女士在广州结婚。许女士曾是他任过教的广西第二中学学生。

一九三二年秋，石先生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员，当时馆长是辛树帜先生。

国外留学时期

一九三三年，石先生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董事会留英公费生。

他十月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学院(Royal College of Science, Imperial College)植物生理研究班作研究生。一九三六年四月伦敦大学授予他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及帝国理工学院学侣荣誉证书。他的论文题目是《植物营养的生理研究》。同年五月间赴德国不勒士劳疗养。

当时在英、德两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政治空气颇为活跃，进步的与反动的斗争很激烈。石先生托辞“怕麻烦”，一个人

躲在伦敦近郊，他不去中国学生会，就连中国饭店他也躲得远远的。在柏林，他也住在没有中国同学住的哈楞湖，避免和中国同学接触。

在伦敦大学读书时，他利用一些周末时间，到伦敦天产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把Brefschneider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译成中文，一九三五年出版，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重印。

石先生在伦敦大学的同学知交Houghton，一九六六年一月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在我认识你的时候，你的抱负是回到中国去植树造林，以停止戈壁沙漠之侵害，我怀疑你是否能实现这一抱负。另外，当我认识你时，知你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男婴儿，你说你不希望让儿子受教育，因为有了知识，只是带来不平和不幸。我不能相信你会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而不花费你的生命去教育别人。”石先生的这位朋友确实看到了他拯救祖国的远大抱负，也很理解到他心灵深处的悲伤，不愧为是异域的知己。现在可以告慰那位热心肠的朋友，石声汉没有辜负他早年为建设祖国征服戈壁滩的壮志，他两次来西北工作，最后定居西北，特别是他在教研组的研究方向上，始终坚持研究水分生理，认为西北半干旱地区，发展生产的关键是水分生理问题，连续让他带的三届六名研究生，均是作水分生理的研究。现在国际粮油开发署以西北农学院为基地建立干旱地区农业问题的研究点，已为国家所确定，从这些不难看出石先生的远见卓识。

一天夜里，石先生在伦敦街头看见一对男女在行歌乞食，引起这位身在异国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思想上的共鸣，他写出了《金缕曲》一词：

灯映层楼炯，下垂帘，风凄雾湿，市喧初静。小巷忽传歌断续，酸楚四弦相应。幽咽语，浮沉不定。华发一双鹄鸪侣，正行歌，乞食街头冷，风雾里，肩厮并。

天涯我亦飘零剩，廿余年闲闲误却，青袍青鬓。异域

乍经流漂日、无限旧仇新恨，翻美汝，鸳鸯同命。料得一
径愁对处，隔云天，正有人如病。恰回首，泪偷迸。
表现了自己的感想和情绪。

在西农、同济、武大时期

一九三六年，二十九岁的石声汉在德国疗养不久，即经西伯利亚回国。在南京，许多名牌大学前来聘请他任教，他均谢绝了，却选择了刚刚成立的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前身）任教。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教学和实验工作。“七七事变”后，物资供应断绝，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他在沮丧、惆怅中离开了大西北。

次年初，他回到湖南，住在距长沙五十五里的山村长冲，租了几间房子，埋头攻读线装书，整天在牢骚郁愤中度日，常借写诗填词嬉笑怒骂国民党政府腐败，自遣自慰；从一组词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

《水调歌头》

回想去年事，一出续黄梁。相逢但问研究，风格恁张扬。桌上红兰墨水，架上英法日语，事事尽堂皇。天平显微镜，棋列极辉煌。英文过，植物毕，国文忙。晚来犹有，专家会议二三场，坐看主任委员，西装纸烟手表，跻路复踉跄。开发西北者，意气总轩昂。

烽火漫云急，道远正无妨。须知抗战救国，正好作文章。胡桃国防树也，萝卜国防菜也，慷慨说周详。热血俨如沸，讲演声琅琅。飞机过，大炮响，始匆忙。太太细软，文件偷向四川藏。练习话剧歌咏，组织宣传大队，出发赴穷乡。救国募公债，偏解他人囊。

日暮电灯黑，独坐静思量。不才如我之物，何苦亦装腔。欺人自欺而已，于我于人何补，愧汗湿如浆。附和事

容易，难在泯天良。人才事，百世计，许荒唐。廿年卅年，以后粉笔岂能尝？人生糊口而外，尚有其他可贵，长叹起徬徨。弹耳服辕久，风起忆穷荒。

这年秋天，应同济大学（校址在广西八步）聘请，石先生担任了该校理学院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八步遭到日军轰炸后，他便以学校教授身份，去昆明为同济觅校址。

同济大学当时内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同事、同学中间，壁垒颇为分明。但石先生除每日讲课、写作外，对任何活动皆裹足不前。在校三年，是大家公认的最不灵敏的“名士派”。一九四一年，他因和校长意见不合，遂辞职。下半年，转任武汉大学（在四川乐山）生物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一九四九年迁回武昌，石先生连续任教十年。

他来武大之前，该校生物系因为没有师资，多年没开设植物生理学这门主课，自他到校之后，便开了这门课。

他在武大主要讲授植物生理学，但因工作需要，也开过第二外国语德文课，还为一九四九年生物系的毕业班学生开过动物生理学。

他不但在植物生理学方面有很丰富的知识，而且对中国古代的生物学典籍和现代的自然科学的若干分支，都作过较系统的研究，所以讲课内容丰富，表达生动，深为师生称道。

抗战时由于条件艰苦，没有自来水，他用高地的水泥池盛水，连接竹管通入室内；没有天平，他以戥子来代用；没有玻璃仪器，他把酱菜瓶子、泡菜缸子都搬上实验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就是这样“以土代洋”，“以粗代精”地进行着教学和研究。

那时石先生除了养活夫人和五个孩子，还要接济在湖南的母亲和三个上大学的弟弟，迫使他不得不挤出时间到乐山技术专科学校兼课，并担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研究员，为一些民间

企业提供咨询。

石先生在武大工作期间，任务较重，暇时不多，但仍挤出时间，撰写了一本《生命新观》（三十余万字），一九四四年在乐山出版，并发表了许多篇文章和诗词。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武汉警备司令部派军队在武汉大学枪杀学生后，石先生悲愤地向一个来访者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来访者为之动容。

重回西北农学院时期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武汉解放。武汉的气候对他的气喘病越来越不利，他便于一九五一年春又调回西北农学院工作。

石先生来西北后，气喘病稍有好转，但心脏病依然时常发作，经常在课堂或会场上晕倒。

在西农，他先担任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及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教研组领导工作，后因工作需要，又承担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并于一九六〇年起招收培养植物生理学及植物生物化学研究生，同时接受了培养外地教师十余名的工作；他还编写了《植物生理学讲义》、《有机化学讲义》、《生物化学讲义》及《实验讲义》。

石先生对每一堂课，都是认真准备，反复推敲，时常工作深更半夜。

解放初期，地方不太安宁，学校设有警卫，每天夜里巡逻，他们多次发现石先生家里的灯光经常亮至凌晨二三点钟。隔窗窥望，只见石先生在灯下用火柴棍摆着各种图形，警卫人员怀疑他在搞什么非法的活动。调查之后才知道是他在准备次日生化的教案。由于他的每一次讲课都一丝不苟、取材丰富、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再加上他那生动的表达语言，深受学生欢迎。他不顾身体衰弱，还坚持和研究生同去数十公里外的农村实地考察。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间他编写有《微生物和食物》、《生命和水》（一九五〇年开明书店出版）、《食品加工原理》等，还翻译了两本生物化学专著：《比较生物化学引论》（九万余字）和《动态物化学》（三十余万字，一九五六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开始中国古代农学研究

当时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先生早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他就发现石先生是个刻苦用功、有志气、有才华的学生，因而注意加以培养，经常在经济上给以支援，并帮助他半工半读，后来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一九五五年农业部提出整理我们祖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号召。辛树帜先生即向国家推荐石先生整理《齐民要术》。在一九五六年一次国务会议上，辛先生就古农学研究的计划和设想作了发言，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笑着说：“辛树帜你一生辛辛苦苦，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表示对整理农业文化遗产的支持。在整个研究古农学的工作中，作为领导者的辛树帜院长，从各方面都为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石先生确称得上“千里马”，而培养和发现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正是原西北农学院辛树帜院长。

石先生整理古农书，一开始就对助手说：“我过去也未搞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都是开始学着做。我们的工作不是什么高深的研究工作，而是对一些古农书的加工整理，为进一步作专题研究的人提供资料，是服务性的基础工作。”

白手起家，开头最难。经顾颉刚先生推荐，他写信向山东济南栾调甫先生请教，这位八十高龄的长者，复了一封万言长书，说：“校勘不懂家法，就作不下去。”什么叫“家法”？石先生花了不少功夫，才从乾嘉二代朴学家戴震、江声、毕沅、

阮元、王念孙父子等人校读古书的方法中，体会到“校勘工作”要尊重原书，不能妄自改动，有意见可以多作注释“的家法”。后来这就成了石先生整理古籍的原则。

石先生第一个目标是《齐民要术》，三年后石先生完成了《齐民要术今释》，为我们冲破了“古奥”的堡垒，开出一条通路。

同时，他撰写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不但简明地介绍了《齐民要术》的本身历史和过去研究它的情形，而且考证了它的史料来源，为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技术性资料。

他还根据《要术》中引的《汜胜之书》和崔实《四民月令》两书材料，分别辑录，编成《汜胜之书今释》和《四民月令校注》，使两部佚亡已久的古农书，得以重见其梗概。嗣后石先生把《汜胜之书今释》和《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译成英文，交科学出版社印行。

石先生旧学修养好，诗、词、书法和篆刻无一不精。他熟悉四国文字，精通英文、德文；又有音韵学、文字学、语言学、动物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有机化学、食品加工学等方面的广泛知识，加上他勤奋用功，一丝不苟，三年中出版三种书，八册，一百三十万字；另有两种中译英的外文书，论文十余篇，功效之高，令人惊异。

《齐民要术今释》共四册，至一九五八年陆续出完。书刚刚出版，正遇上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石先生受到批判，理由是他“厚古薄今”。这对石先生心灵是一个致命冲击，但是他没有屈服，他坚信自己遵照的是“古为今用”的原则。他坚强地辩驳说：“现在提出‘古今’、‘厚薄’的问题，我自己考虑过，我研究《齐民要术》材料是古的，但我的作法是运用近代科学去解决，不是厚古，而是想实际利用；我用现代语言注释

说明，可以替不熟悉古典的人省一些时间、精力，谈不上厚与薄。”由于运动，古农学研究室工作停止。

一九六一年冬，石先生去北京医治肺气肿哮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会见了，肯定了他过去研究古农学的成绩，给予许多鼓励。李部长看到他只有五十四岁，却那样体弱衰老，极为关怀。他作了三项口头指示：一是极早治好病（当场叫在坐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和杨东莼两同志负责安排去阜外医院诊治）；二是整理古农书的工作合乎党的需要，应当继续做；三是培养青年接班人，并要他回院后向党委转达。同时齐燕铭同志还要他写些普及读物。

一九六二年初春，高教部副部长黄松吟来西农视察工作时，曾会见石先生，当着西农几位院长的面，要石先生和辛树帜先生试拟《中国农业史课程纲要》。着重说明农业和医学在我国历史上以及将来对人民大众的重要性及整理农业文化遗产的意义，并尽快开设“农学史”这门课程。嗣后，西农古农学研究室又复苏了它的新生命。

石先生根据上述精神，立即编写《中国古代农书评价》、《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均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等通俗读物。接着他向学校呈报培养青年接班人的规划。石先生认为，当时若大量增添工作人员，无论是从编制到经费，学校都有困难，同时也不可能短期内物色到很多合适的人选，满足不了需要。为了不使任务落空，他提出代培研究生的办法，等他们毕业，回到原单位，立即可以开展这项工作。为了多出人材，快出人材，石先生提出一次招收二十名，学制四年，第一年补习古汉语，第二、三年每人各选一个或两个（年代短的）朝代收集农史资料，第四年写毕业论文。

这个庞大的计划，反映出石先生惊人的气魄。敢于在六十年代一次带二十名研究生，如没有坚实、广泛、雄厚的各种专业（古

今中外)修养和高度的事业心,是不可能提出的。当时他的身体异常衰弱,担任了植物生理教研组领导工作和带两名植生研究生以及为外校培训植生专业教师多名的工作,还校注了《农政全书》(一九八〇年农业部授奖科研项目)一百三十万字,那时古农室仅有一位工作同志!

石声汉老师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增加学校负担,而对国内各地区都能照顾到,可以迅速达到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之效果,又将我国各个朝代正史中之主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是古农室久已想做而无力完成之项目)了,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开展有极大帮助,一举数得。

《农政全书校注》是石先生继《齐民要术今释》后又一部重要农学校注巨著,全书一百三十万字,一九七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农政全书》由明末杰出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徐光启编著,对我国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摘编,是对十七世纪前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总汇。书中记载的水利、开垦、种植、水稻、棉花、引种甘薯,防治蝗虫等重要农事活动,都经过作者的细致试验研究,至今还有参考实用价值。石先生以多年研究农业遗产的丰富经验,对《农政全书》进行了校、注、案、译等方面的全面整理。

石先生还编写了《齐民要术选读本》、《四民月令校注》、《两汉农书选读》、《农桑辑要校注》,先后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著有《辑校南方草物状》、《食品制造原理》、《什么叫颜色》等。另外还译出达尔文《肉食本草》和伯希的《棉花》两书。

热心祖国科学事业和国际间学术交流

一九六四年四月,石先生接到日本西山武一教授来信,说他要参加今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科学讨论会,并要求一九

六五年在中国召开一次“农书研究讨论会”，日本约有五、六位学者希望能参加。

石先生立即向国内有关领导反映，曾向中国农业科学院丁颖院长、西农党委、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谈了自己的认识和设想，他认为日本学者“拥有许多我们国内已经绝迹的中国古籍，又有几十年的工作基础，他们在这方面是要和我们国内的研究者争胜的。”

他建议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一个小型座谈会，召集国内各地从事古代农书研究的人，讨论如何组织力量，以便订出明确具体规划，分工合作，使中国农业遗产，在国内和国际间，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将研究中国文化、科学技术历史的重心，从国外夺回，建立在国内”，“同时也要准备和日本学术界角斗”。

后来在西农古农学研究室停止工作期间，不少国外友好的汉学家们，经常寄来他们研究我国古农学的论文，石先生每次接到后无不感慨万分。他常说：“我们的珍贵历史，自己不去研究整理，让外国人搞，实在说不过去，与我们国家地位太不相称了。”

他的四弟石声泰，一九四八年赴美学非铁冶金，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一九五七年石先生怀着热爱祖国的心情，动员四弟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他四弟刚搭上回国的轮船时，正值国内反右派斗争开始，石先生知道国外敌人对反右派斗争定要进行反宣传攻击我们，深怕他弟弟动摇回国决心，并准备必要时去香港把弟弟接回。直到四弟毫无动摇，毅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才放了心。

约在一九六三年前后，已故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在出版前寄来一份征求意见稿。石先生除提了许多具体技术性意见之外，看到书内有些插图，是用的外国人的照片，就写信给刘先生说：“在我看到

这些外国的照片时，极不舒服，二十多年前看到一个德国人瓦格勒在青岛著了一部《中国农书》，心里始终是个疙瘩，一直耿耿于怀，今天看到这些照片后，不期而然地又触犯我多年的旧情绪，你的高足遍及河南、山西，能否请他们就地拍摄一些照片，代替这部分。”

石先生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整理我国古代农学书籍，除了广泛搜集，参考历代有关资料外，还与不少国外的学者专家们相互交流，得到了他们大力支持、协助和崇高的赞扬，在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上，作出了可喜成绩。往来最早的是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天野元之助，天野于抗战前曾到中国各地旅行，完成了几部巨型专著。

日本著名的中国农学史专家西山武一教授，早在一九四〇年开始研究《齐民要术》，曾在日本金泽文库的协助下将北宋时的《齐民要术》手抄本影印出版（现称金泽文库本）。石先生开始校订《要术》时很需要这部书，便写信给西山求助，西山接信后，立即将自己仅存的二本（影印本）《要术》中的一部赠给石先生。一九五七年底《齐民要术今释》第一、二分册出版，石先生也赠寄给西山。西山和熊代幸雄共同对《齐民要术》的校订及译成日文的工作，早有计划安排，当拿到石先生的著作时，西山、熊代高兴万分，熊代来信说：“……当我拿到盼望的贵著之后，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昨天，我花了一天时间，粗略地拜读了贵著内容，我感激得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给我的印象使我终身难忘。虽然我还没有精读，但可以想象到您的出色注释。”《人民中国》（日文版）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发表齐卉之《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友谊》一文中说：

“石先生的功绩岂止于‘贾学’的研究，从根本上说为今后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与交流起了促进作用。”西山教授还说：他们“翻译的《齐民要术》上册出版之后，下卷暂停出版，因

为要参考您的今释本第三分册加以修订后，再出版下卷，这样说全托您的便利了。”自此以后中日两国农学学者之间书信往来更加频繁。一九六三年西山向我国提出要求与石先生合作研究《齐民要术》，地址设在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后因佐藤政府的阻挠未能实现。

不久西山武一的老友、日本鹿儿岛市市长、中日友协访华团团长平濑实武，率领访华团来中国访问，特地代表西山来西安与石先生会晤，并赠送许多他们私人的照片。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中英友协主席、英国了解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是石先生在四十年代的老友。一九五六年李给石先生来信说，他买到了《汜胜之书今释》，知道石先生已动手整理中国农书，感到高兴，并提出以后有研究成果发表时告诉他。第二年石先生给他寄去一本《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样书，他来信道谢，也提出了《齐民要术》中某些他不能理解的内容，请石先生解释。以后《齐民要术今释》出版后，又陆续送他一套。这年年底，应科学出版社要求，石先生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改名为《齐民要术概论》）和《汜胜之书今释》译成英文本，给李寄去两书的打印稿本，李约瑟很细致地修改了这份译稿。一九五六年初李约瑟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请石先生与他合作一、二年，共同完成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生物学部分。一九五八年夏，李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中国访问，特来西北农学院看望石先生。

石先生的四弟石声泰（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七七年底参加我国金属腐蚀学代表团去英国访问时，李约瑟发现代表团名单中有与石先生相近似的名字，他估计可能和石先生有亲属关系，特邀请代表团去他主持的东亚科技图书馆作客，当他知道石声泰确系石先生的亲弟之后，非

常高兴；李对石先生的去世，表示惋惜和慰问，并引导代表团参观了馆中陈列的石先生著作和过去赠送他的条幅对联（抗战时期赠送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李约瑟博士和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到北京，通过科学院接待组和清华大学外事办公室约石先生的长子石定机同志（现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去北京饭店会面。李约瑟当时忙于跟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讨论学术问题，请鲁桂珍博士接待。说是石先生的著作在国外很有名气，很希望早日得到新出版的遗书。夏所长离开后，石定机同志把石先生的遗照送给李，李表示感谢。

一九七三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四十多名学生，看到《齐民要术今释》一书后，来信热情称赞中国农业科学的光辉成就，并成立了“中国古代农业遗产研究小组”，专门写信给石先生说，他们读了石先生的有关中国古农书的著作很受启发，希望两国建立联系，继续探讨有关中国古代的丰富农业遗产，并表示想来中国探望石先生，可惜当时石先生已经去世了。

与病魔作斗争

石先生曾在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冲击，是西农有名的“白旗”，受到了很大刺激，曾经一度造成了他的精神失常。助手每次去他家里，不敢敲门，也不敢呼喊名字，只得等待机会，悄悄地转到他的面前，先让他看到后再说话，否则突然听到声音，就会使他惊惶失措，神色突变。

但是运动一过，他又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中，平时他十分珍惜时间，不让一分一秒的光阴轻易放过。可正当他为《农政全书校注》最后定稿而昼夜奋笔疾书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什么“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一顶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家被抄了，书被封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对他精神、肉体的

折磨，身体也拖垮了。

一九七一春天，他腹痛难忍，犹以为是一般的肠胃病，自信“癌症是不会来找我的”。但诊断结果是：晚期胰腺癌，全面扩散，已经无可救药了。

在天津医院的病榻上，剧烈的痛疼使石先生的脸部冒出豆粒般的汗珠，他从不发出一声呻吟，在弥留之际仍然惦念工作，当神志稍微清醒时，他就向两位弟弟和小儿定栩说：“希望手术后再有两三年的时间，把《农政全书校注》重校一遍，争取出版。另外，我计划再搞三部古农书。”还告诉在农场工作的定栩说：“你要多读书，别乱种田，我们祖先就很讲究田法，不要到了今天反而乱种起来。”有一天单位派人来探望他，并问及对过去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他用微弱颤动的声音回答说：“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临终的遗言，不久就去世了，终年六十四岁。

一九七八年，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写给石先生长子石定机的信中说：“我们这里对你已故的父亲关于农业史的著作是无限赞赏的。今年五月我要去北京，我一到那里就会跟你联系，这样我们就能好好地谈当年在武汉的那些日子，以及你父亲所做的令人惊叹的工作。我想你定会很高兴，设若他能知道我们正在积极准备《中国科技史》的农业卷。……你可以相信，我们的著作极大得益于你父亲的功劳。我们保证将在书中最经常地承认这一点。”

周佛海的青少年时期

钟玉如*

大汉奸周佛海，系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乡窝溪村人。

周佛海的旧居，住着他的长子，即佛海前妻郑妹所生的周少海，前年六月病逝，享年六十七岁；儿媳李爱珍，今年六十五岁；孙子周祖沙，三十岁；孙媳潘氏。还有一个曾孙儿，已上小学，一个曾孙女刚满五岁。一家人融融乐乐，生活得很幸福。

周佛海的妹夫，也就是周佛珍的丈夫余文伟，八十八岁，比佛海只小五个月。他俩同读高等小学，同进第八中学。结婚后，在周任职的南京住了多时，后因婆媳不睦，乃回沅陵。周嘱余专侍其母。余文伟现在是县副食品公司退休工人，头脑清晰，眼耳双健，谈笑风生。

窝溪村有两位老人，一个是八十岁的周高荣，佛海邻居；一个是七十八岁的曾开贤。这两人小时常与佛海接触，后与其弟周佛深要好。

周佛海与邻村的刘真沛同年生，小时结为同庚兄弟，情同手足。从读私塾开始，直到第八中学，都是同窗好友，很健谈，常讲周的故事。去年元月去世，他的儿子刘学瑾，五十八岁，是个强记博记的人。

去年的三月下旬和四、五两月，我多次访问了这些人。下

* 钟玉如系湖南省沅陵县文化馆干部，去年他在当地多次访问了周佛海的一些亲人和故旧，本文内容便是这些人的回忆。

面便是同他们谈话后整理的记录。

一、幼儿与寡妇

刘学瑾说，周佛海，原名周明繁，字子美，一八九七年五月生于福建省莆田县。

其父，周夔九，清末在福建莆田县当一名典史之类的小官，因禁鸦片一事，遭到当地绅士、奸商的强烈攻击，被逼上吊自杀。

其母，马氏，福建人。夔九死后，在亲友的帮助下，扶柩携子，回到了窝溪村。那年佛海才十岁，弟佛深八岁，妹佛珍五岁。家中有旧房一栋共七间，用砖石砌成一个独立小院。有水田十四亩，其中部分系夔九从福建寄钱回家，托弟周湘斋购置的。

周佛海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十分清苦。马氏没有娘家亲戚提携，婆家妯娌也不和睦，两个弟媳虽系富有之家，却瞧不起这幼儿寡妇，毫无怜悯之心。马氏不懂农业生产，何况还是一个小脚女人。困难的程度自不必赘言。然而，马氏却是一个有眼力、有毅力、善持家的女人。她把希望寄托在“望子成龙”上。集中家中有限的财力，让读书有望的长子——佛海读出头；次子和女儿，酌情读几年。

马氏有这么个决心：让子女读书，那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一个家境困难的主妇，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二、启蒙学生

刘学瑾又说：佛海回家那年，便被送去凉水井郑子馥家读私塾。我父亲也是那年启蒙的，他俩一见如故，便结为同庚兄弟，同读的学生有十多人，都属启蒙学生。然而，周佛海聪敏

过人，老师每天点授课文，他过目便能背诵。任教的老师是当地很有名气的郑精华，人称“精先生”，教学认真，学规严厉，他每天给学生点授两次新课，还要背读两次课文，每天规定写大、小字的数量也不少。一般说来，学生的负担也不算轻松。

周高荣接着说：周佛海读书时爱玩。私塾学堂后面有一园槐竹林，他天天去竹林爬竹杆。开始，他手脚一齐动作，抱着竹杆爬，以后两腿伸直用手向上爬。爬到竹杆腰部，迅及跳到另一株竹杆上再滑下来，像猴子那样灵活。有时爬到顶端，一个弯弓，连人带竹落到地上。动作十分惊险、敏捷。他的爬树技能，谁都莫能相比。每当他玩弄这些绝招时，周围的同学们，都站在一旁啧啧的拍手叫绝。

郑老师见周不读课文，一个劲地玩，但布置的课文，又背诵得滚瓜烂熟。是什么缘故？郑老师作了些调查研究。发现布置作业和点授新课之后，周佛海根本不读课文，把大、小字写完之后，便去玩耍。到背诵时，他排在同学们后面，边走边读，到他背时便滚瓜烂熟了。

郑老师感到惊奇，心想可能是课文布置少了，第二次便增加一倍。佛海毫无难色，仍然是写字、玩耍、到背书时，边走边读，一口气背诵得利利索索。

第三次，郑老师将新课再加一倍。他仍然和以前一样。老师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到下次背书时，他大声点名，要周佛海第一个背书。这一下子佛海犯难了，挨了一顿骂，还被打过一次手板。吃一堑长一智，佛海吸取了教训，以后一布置作业，他先看书，再写字，然后去玩，再也不怕老师搞“突然袭击”了。

周佛海有惊人的理解能力，读书半年后，便可勉强给别人写信。四年后，不仅能讲解所学课文，而且能写出有理想、有气魄、有文彩的文章来，还能吟诗作对（对联）。那时，他写的律诗中，有这么一句话：“南阳诸葛隆中卧。”他小小年

纪，却敢与诸葛亮相比，可见他从小就抱负不凡。

有一次，他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郑老师作了详细修改，然后送给哥哥郑仁鲍看，想炫耀一下“高师”育出的“强学生”。那郑仁鲍，系清朝举人，四方有名的饱学之士。看了文章后，拍案惊呼：“奇才！”然后，转过脸来用责备的语气对郑精华说：“你怎么搞的，把他的文章改坏了。你教不下他了，叫他到城里去读吧，别耽误了时光。”

三、名列前茅的高等小学生

余文伟回忆往事说：大约是一九一三年，周佛海和我一同进入高等小学。校址就在鹤鸣山。也就在这一年，刚满十六岁的周佛海却作了新郎。农村的早婚习惯，迫使他与本地姑娘郑妹结合了。婚后仍然事读，马氏身边却增添了一个强有力的助手。田里地里的活儿，都由这位助手“独揽”。

但是，家庭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为了养家糊口，为了送子女读书，仅限十二亩田里长出来的东西是很不够支付的。马氏只好动用固定资产，起先变卖首饰，再卖一些衣物，最后变卖田产。尽管如此，周佛海还是没有资格在校寄读。只好寄住在施家巷一位姓刘的同学家中。每逢星期六，便回到乡下家中取来下星期的学习、生活费用。

周佛海，身着一件蓝竹布长衫，额下配戴一副近视眼镜，面部清瘦，体形苗条，对人态度和蔼，彬彬有礼，特别是对长辈十分尊敬。他走起路来，挺胸昂首，从不左顾右盼。但是，他却常常饥肠辘辘，过着半饱的日子。

在高等小学的两年中，他在新一班，我在新二班。每次做作文，他的文章次次传观，有时老师还在课堂上宣读。每期发榜，他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同学都佩服他。

四、第八联中的高材生

余文伟继续说：一九一五年，我和周佛海都考入沅陵第八联合中学，也就是辰郡中学的前身。在这段时间里（四年制的中学，他才读了两年半），他才华显露，引人注目。每当老师在课堂提问时，他口若悬河，左右逢源。写文章他最快，每次都是先交卷。他写起文章来根本不多想，好像肚子里有一大堆现成腹稿，倒出来就是了。他的文章，差不多每次都在“传观”栏内贴出。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国文老师姓张，在县城教师中声望极高，看了周佛海的文章后，高兴地用珠笔写上这么一段眉批：“故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成之。”张老师也表示要虚心向他学习。这篇文章轰动了全校，对周的激励也很深。十年后，他在南京工作时，还几次提到这个眉批的启迪作用。

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去世了。学校开追悼会，同学们都被蔡锷的伟大爱国精神所感动，有的激动得嚎啕大哭起来。周佛海却站在同学中大声地说：“哭有什么用处，眼泪是赶不走帝国主义的，哭声也拯救不了中华民族。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民族复兴刻苦读书，难道我们的同学中，今后就不能产生出第二个蔡锷吗？”同学们都被他慷慨激昂的讲演吸引住了，哭声也没有了。

周佛海勤奋好学，刻苦用功。他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外，每天晚上，还向一位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蒋先生学习日语；请高家巷的何老秀才，补习古典文学；他的英语成绩也是很好的。此外，他还挤出时间博览群书。

五、不平则鸣

余文伟接着说：周佛海性格倔强，豪放潇洒。同时也兼有

几分侠骨傲气，见义勇为，爱鸣不平。对新事物十分敏感，思想新颖。他对当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爱不释手，对李大钊的文章十分欣赏。陈、李对他产生的影响也极大。李大钊说：“冲决过去历史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他当作座右铭。在同学中也经常传播这些思想，我们都喜欢听他发表意见。公认他硬是高出我们一头。

不久，我们学校成立了学生会，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对学校的旧制度不满，要求改革学制的呼声日盛。周佛海第一个站出来，提出“废除旧学规，争取自由”的口号，得到了同学的广泛响应。一些思想守旧的老师看不惯，说什么“周佛海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还对他提出过口头警告。周佛海毫不理睬。

一次学校提前上课，使一些住在家中的走读学生无法听课，缺课学生便邀集起来，找管理室老师舒采章评理。舒总是强调学校有权作出决定，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吱吱唔唔搪塞，不肯正面回答，酿成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于是便闹了起来，学校玩了个“杀鸡给猴子看”的权术，要把提意见最尖锐的向美丽开除。周佛海便找校方多次交涉，要求不要开除向美丽，校方顽固坚持既成的决定，还发了布告。周佛海顿时火冒三丈，大吼一声：“岂有此理！”猛力一拳向身边的办公桌砸去，摆在办公桌上的杯子、笔砚、书籍，顿时震落地下。这一拳震动了第八联中，也震动了全城，成为沅陵县第一次“学生风潮”。

那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夜。行政当局对此十分害怕，学校被迫停课整顿。翌日，校长潘益龄出了布告，并用红笔圈点，给周佛海记大过一次。佛海见到榜文非常气愤，一手将张贴布告的牌子扯了下来，甩在地下用劲一脚，踩成两半，扬长而去。

这一举动引起了行政当局和学校的恼怒。第二天，校长又贴出了布告，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周佛海、向美丽都被开除学籍，并且通知沅陵其他各校均不得收留。

我们当时对学校的这一决定感到愤怒，对周佛海的前途十分惋惜。有不少学友都伤心得流下了热泪。周佛海却不以为然地对同学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偌大的中国，难道就没有我周佛海读书之地吗？我马上就走，到长沙去考学校。”

周被开除后，在同学家里住了几天，就回到凉水井老家，向母亲和妻子，说明被开除的原因。开始，她们都感到非常伤心。

曾开贤说：这时郑妹已有了两个孩子。大的叫周琼玉，是个女孩，两岁多了；小的叫周少海，是个男孩，不满周岁。当时周家已是七口之家了，生活非常困难。

六、奔向远方

余文伟说：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周佛海向母亲、妻子提出去长沙求学的打算，并征求弟妹的意见，要求将家中仅有的几亩田卖出作为学资。母亲说：“只要你立志读书，将来光宗耀祖，把田卖掉，暂时日子苦点是可以的。”妻子和弟妹，也都支持了他。

告别了亲人，又回到城里，在挚友邓文伟、何亚雄、谢柏林等人的热情资助下，勉强凑足了费用，就在离开沅陵的前一天，恰好正是重阳佳节，周佛海邀约了几位好友，同游风光秀丽的河涨洲。他们登上洲头的七层宝塔——龙吟塔。周佛海凭高远眺，见气象万千：前有滔滔的沅水，四周有如画的群山。他激情满怀，诗兴顿起，以宝塔墙壁当纸，挥毫如风舞龙飞。诗曰：

凭栏浇酒酹神龙，拔剑狂歌气势虹。

敢以清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奇峰。

怒涛滚滚山河激，落木潇潇宇宙空。

试问洲前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诗罢，泛舟沅江，畅叙情怀。这天饯行的晚宴，是由邓文伟安排的。何亚雄、谢柏林、刘真沛等人作陪。大家频频举

杯，祝他：“一路顺风，鹏程万里！”周佛海也祝大家：“学习猛进，前途辉煌！”这天晚上，他们谁也没有睡意，什么国家的前途，个人的作为，海阔天空地谈论着。有人把话题引向《七侠五义》，说《七侠五义》中好汉多。周佛海接过话题说：

“《七侠五义》中，我最喜欢锦毛鼠——白玉堂，他才算得上条真正的好汉。男子汉大丈夫，‘不流芳千古，必遗臭万年’。”

次日清晨，周佛海搭上去长沙的货船，邓文伟等人送行江边。那时，我们只是一般同学关系，亲缘关系是这以后的事，所以我没参加送行。

杨致泽刘昭彭伯陔其人其事

周德民*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先锋》一节里提到农民捕杀土豪劣绅时举了“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的例子，在《十四件大事》的第二件中又说了“宁乡杨致泽是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他还说：“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另外宁乡还有一桩轰动全省的大案，即农民枪杀劣绅彭伯陔。彭伯陔、杨致泽的事件当时的湖南《国民日报》、《商报》、《湖南民报》、广东《农友》杂志等十多种报刊杂志相继作了报道，有的替土豪劣绅说话，有的为农民撑腰。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〇年，我参加宁乡农民运动史调查办公室的工作，负责编写《宁乡农运史略》和《宁乡人物志》，曾翻阅了许多档案、报刊资料，走访了在县内和外县外省的知情老同志七十八人。许多老同志当年在宁乡或长沙等地从事农民运动和党务工作，有的是在特别法庭工作过的同志，对于当年震惊全省的这些大事都记忆犹新。现将调查所得并参看档案、报刊资料整理出以下内容。

一、宁乡头号豪绅恶霸杨致泽

杨致泽曾任宁乡大浏镇团防局长多年。宁乡五镇七乡的团

* 周德民系宁乡县委党史办干部，本文是作者根据调查访问并参看当时的报刊、档案资料整理的。

防枪支共约六百来支，杨致泽就有三百支左右。他是宁乡团防系实力最强的头目。一九一七年，他曾残酷镇压浏山农民张三元起义。他和贺耀组、赵恒惕及宁乡大劣绅刘毓乡都有亲戚关系。北伐军占领长沙后，《浏波》旬刊第五期就发表过《驱杨致泽宣言》，指出“杨致泽是宁乡大浏镇一大恶棍，杀人逾百，乡民畏之如虎”。谢觉哉在云山教书时就曾写过《释团练》一文，揭发杨致泽等团防系的罪行。甘泗淇（姜凤威）在家乡时，也对杨致泽的残暴行径进行过反抗，几乎遭到杨致泽的杀害。

杨致泽又名杨应林，排行十八，又称应十八。宁乡铁冲人，身高一米八左右，长方形脸庞，眼睛圆鼓，留人丹胡。平时出门，戴礼帽，穿长袍马褂，拄自由棍，做绅士打扮。出席会议，则骑棕黄色大马，穿黄色军衣，挎手枪，佩短剑，显得杀气腾腾。他对老百姓说：“我应十八胡子在大浏镇是一副石磨，你们这些蚂蚁，想抬也抬不走，想掀也掀不动。”他在宁乡铁冲的杨海湾和易玉湾有两座大庄园，娶有几个姨太太。

杨致泽在宁乡以办团防，镇压农民著称。他的防地处于宁乡、桃江、安化三县交界处，统辖现在的宁乡浏山、黄材两个区十七个乡的地域。他在残酷镇压张三元起义时，把抓来的起义农民凌迟处死。被他杀害的无辜农民不下四百名。农民唐伯衡、杨佑明被地主诬告偷谷，杨致泽就将他们沉塘处死。

后因农运兴起，“蚂蚁”居然群起而掀“石磨”。农民欲掀斗杨致泽，因而控告杨之罪行者不知凡几。中共“宁觉”支部（湖南区委直属宁乡支部）为了解除杨致泽武装，为民除害，通过宁乡县新任团防局局长，国民党左派人士文经西，召开全县团防分局长会议，要求各乡镇将团防枪支移交各区农民协会自卫队。杨致泽依仗手中有枪，军政界有后台，竟然拒绝交枪，并企图退席逃会。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农历七月初二），中共党员何立前、喻冬声、尹泽南

等遂在会上将其拘捕。杨致泽亲友和死党即赴省城活动，经鲁涤平、贺耀组等与代行省主席职务的唐生智、秘书长张翼鹏商量，遂由省政府电令文经酉及宁乡县长黄炳衡将杨押解省府听候处理。杨致泽被押到长沙后，传闻有被释放的可能。宁乡人民十分气愤，聚集两千多人到县署请愿，要求从严处决罪恶滔天的杨致泽。何叔衡、谢觉哉、王凌波等也纷纷揭露杨的罪行。县总工会委员长姜凤韶、双狮岭工会委员长姜林武与各区农协代表曾多次集会宁乡县城，请求处决杨致泽。县城多次出现游行队伍。随即又组织游行队伍去长沙向省府请愿。这时在长沙学习和工作的甘泗淇、肖述凡、谢觉哉、何叔衡、姜梦周等人主动加入游行队伍，并由甘泗淇带队，数百人游行长沙城，一百多人进入省政府，声言“不杀杨致泽，决不回县”。《商民报》、《大公报》、《宁乡旬刊》、《农友报》等报刊都刊发了这一新闻。《湖南通俗日报》称：

“宁乡团防首领杨致泽，自被省政府拘押，已两月有余，所犯通敌谋叛、滥杀苛罚大罪，业经省政府飭黄炳衡县长调查明确，具复到省，又经省政府传讯查问无讹。不知何故，羁押至今，尚未予明正典刑。”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宁乡旅省人士，包括在长沙的宁乡籍学生、工人、居民，第二次向省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杨致泽。在群众压力和舆论界支持下，省政府才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将杨致泽枪决于长沙识字岭。

二、人屠夫刘昭

刘昭是宁乡东南边境靳水四乡的一大恶霸。他是被农民协会抓起来经过审讯斗争后枪决的。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宁乡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系传闻之误，不是事实。

刘昭，字茂生，一字茂幘。宁乡善山岭鸳鸯塘人。他素性无赖，年稍长即跟劣绅蒋铁铮等友善。蒋是奥国军事大学毕业的，曾任保定军校教官，许多军师级军官均出其门下。刘昭得到蒋

的庇护，担任团防局长，刘当上团防局长以后，横行乡里，关人杀人，勒索敲榨，为所欲为。土财主钟春城避地议论了刘的短处，刘即派团丁将钟捆到局里，先打四十大板。钟春城痛得喊天。刘昭得意洋洋地说：“你喊什么天，天就是我，我就是芳储乡的天。你敢喊，老子再打你四十大板。”

刘昭喜欢看龙灯。每年正月他要左邻右舍和佃户都去玩龙灯，并喜欢看玩灯的打架。月塘坪一户佃户不会玩灯，更不愿意去打架，刘昭就要退他的佃。

刘昭的团防局设在黄藤港，他把杀场设在离局子两里路的交通要路水口山。据老百姓传说，他曾经一早晨杀过三十五个人，水口山的地上鲜血盈流，土为之赤。他和后来的宁乡自卫总队长宋品山，同被称为宁乡杀人不眨眼的“人屠夫”。刘昭对无辜百姓视同草芥。雇农鲁某，大年初一出行，不料一根麻线搭在东瓜蒂式的帽粒上。刘说这个人有不祥之兆，活该去见阎王，便一刀砍掉了这位无辜农民的脑壳。刘杀人太多，民怨沸腾。一九二四年，杨林桥金盆山从护国军退伍回来一位当过班长的齐福初，精通拳法枪法，颇有胆略。他听到刘昭的恶迹，便夜带马刀先杀了和刘昭狼狈为奸的土豪黄石峰，又去杀刘昭，刘昭跑掉了，便烧了刘昭的住宅鸳鸯塘。刘逃出后，立即回到团防局带兵抓到了齐福初，先把齐的腿骨寸寸打碎，然后用箩把齐福初抬到黄石峰坟前祭坟。他残忍地割掉了齐的舌子、再敲掉牙齿、剖腹挖心、杀头祭坟。一九二五年宁乡农运开始，进步人士在中共湖南区委直属“宁党”支部的推动下，掀起了反团防高潮。靳水四乡反周震农、反刘昭之声更甚。当时《湖南通俗日报》、《湖南民报》都登载了揭露刘昭罪行的文章。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长沙，宁乡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梅治成担任会长，并成立惩办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刘昭企图逃跑，尚未成行。农民探知他在野娼三媛妹子家，乘夜围屋搜

捕，从夹壁中把刘昭拖了出来，经群众斗争后，送交宁乡县特别法庭审讯，判处刘昭死刑，杀于县城之南门桥驿马坪。

三、吸血鬼彭伯陔

“彭伯陔事件”是大革命时期震动全省的大案，党内也曾因此发生争论，出现分歧。京、沪、汉及省内各报都登载过这一事件的消息。中共湖南省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都曾郑重讨论过这一问题。

彭伯陔是宁乡最狡诈、狠毒之劣绅。世居宁乡大田方高山胭脂湾。彭是当地富户，有租千多石，给五家佃户耕种，租利极重。彭为人狡诈，爱包揽词讼。二十岁入省城学习《六法全书》及《刀笔精华》等，决心以当讼棍为职业。彭既包揽词讼，便交结官府，勾结土劣，与当地恶霸刘学亭、肖泽生、岳寿南、黄竹苏、黄钟苏等为至交，跟团防系头目杨致泽及宁乡军政要人梅馨、梅伯杞、贺耀组、陈泽湘均有往来。

彭之剥削无孔不入。谢咏梧虽是彭的佃户，但却是彭的老师。谢进给彭的押金，当时本是缙钱六百文折合铜元一串。后来，要缙钱千文才能抵铜元一串，彭就要谢换新佃约，按今日铜元折缙钱数，把谢当年进的缙钱一律折成今日铜元数。谢不服。彭便以刁佃欺主为由诉谢于县署，谢被拘捕入狱，既退财又呕气，便忧愤而死。彭的父亲欠饷银未交，彭假意代父还饷。三年以后，彭竟拿出饷票息上生息，利上加利，算成夹倍金额，向父索款。父怒其过于狡诈贪婪，太无父子情义，愤而不给其利息。彭伯陔竟率众打开父亲谷仓出谷，其父气忿而死。

一九二六年，农民协会兴起，彭伯陔十分仇视。彭千方百计捣乱农会。他约集土豪劣绅二十八人跟农会对抗，自称“二八皮袍会”，表示穿长袍皮袍的富人要跟穿短衣粗裤的穷人比高低。

一九二七年一月，高山乡农民协会会长喻碧泉正集合农协会员开会，宣传农协章程，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其他土劣，慑于农会威力，皆潜踪避匿，只有彭伯陔仍然有恃无恐，十分猖獗。他抓住会长喻碧泉过去赌宝打牌，竟闯进会场，公开扬言：“要打倒土豪劣绅，就先要打倒流氓地痞；流氓地痞当了农会会长，农民协会就是地痞流氓会。”群众闻之大怒，当即大喊“抓住这个土豪劣绅！”彭见势不妙，想钻出人群逃走。群众追到会场外面的胭脂湾将他抓住，用绳索捆绑到会场斗争。彭伯陔的罪行罄竹难书，群众都说可杀。于是会长喻碧泉，农会纠察队长朱香泉，当众宣布处以彭伯陔死刑，用梭标鸟铳把他打死在高山前边的河洲上。

彭伯陔被处死以后，彭的党羽，兔死狐悲，认为这是“暴民专政”，“士绅生命没有保障”，“农民协会是痞子会、暴徒会”，“农民运动糟得很，不得了”。一些土豪劣绅出钱出力，出谋划策支持彭伯陔的女儿向县里、省里、中央告状，还向宁乡在各地的要人和省内外报社写文呼冤。土豪劣绅四处奔走，大喊农民运动搞糟了，暴民专政不得了。一时为彭鸣冤叫屈的流言遍及全省。党内也有人惊呼：“农会总不该杀人”，“农民太暴动了”。湖南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慌了手脚，准备派员查办彭案。于是全省全国都晓得宁乡出了一个彭伯陔事件。《大公报》、《湖南民报》、《湖南通俗日报》等报刊各以不同观点，纷纷在报上发表评论和报道。彭伯陔成了新闻人物。中共湖南省委连日开会研究，最后决定派谢觉哉、戴述人以国民党湖南省执委、监委和省特别法庭委员身份来宁乡调查彭案真况。他们首先召开宁乡中共党员会议，统一了认识，但也认为喻碧泉等杀彭伯陔手续不全。然后，谢觉哉等召集宁乡各公法团体负责人说明彭伯陔的罪状，公正人士都说彭伯陔作恶多端，死有余辜。谢觉哉、戴述人又向报界声明：彭伯陔早在农会开会宣传孙

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农会章程时，公开反抗农会，被农民抓获押送县署审办的途中，被彭女组织打手中途劫持，因此为农民所击杀。各界纷纷刊载了这一报道。随即谢觉哉和戴述人根据彭的一贯表现和破坏农运的罪行报请省特别法庭补判彭伯陔的死刑。至此彭案风波才告平息。

大革命失败后，喻碧泉逃出宁乡，几十年无消息。一九八四年喻碧泉忽从美国来信，原来，他已转辗异国安身，现已八十余岁，很想回故乡看望。喻碧泉的爱人梅淑元原系梅冶成的大女，现仍健在，儿子是村支部委员。喻碧泉是彭案自始至终的经历者、见证人。他若能归国，定能详述当年彭案始末。

湘西会战中武阳遭遇战 与武冈追击战

蔡鸿源 孙必有*

湘桂日军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在豫南、鄂北发动攻势后，复于四月中旬又在湘西发动攻势，窥其目的主要在夺取其最感威胁之芷江空军基地，次则乘国民党军整训间隙欲击破其野战军，以粉碎国民党军之反攻计划，确保其大陆侧背之安全。自三月下旬以后即分头秘密集结部队，以分进合击之态势，先后向国民党四方面军当面发动广泛之攻势，企图吸引国民党各路大军于湘西正面，然后以其新宁之34D主力及58B全部分股北犯武冈，西窜城步，企图由国民党三、四方面军之接触部突入左翼，迂回洪江，包围歼灭国民党的野战军以达其占领国民党军的飞行基地——湖南芷江之目地。

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湘粤桂敌似有抽集约七个师团兵力向芷江及常桃进犯之企图”签呈，指出日军西犯的目的：

“1.破坏我军反攻准备；2.摧毁我空军前进根据地；3.减少我军对敌大陆交通线之威胁。”并拟定作战指导方针：“1.以确保芷江机场，并利尔后反攻之目的，以第四方面军所属部队为主力，选定有利地区与敌决战而击破之。2.第六战区及第三

* 蔡鸿源和孙必有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本文是查阅了原国民党政府档案后整理的。

方面军应各以有力部队策应湘西方面作战。3.各部队应从速完成作战准备。”

四月九日，湘西日军由二十军司令官牟西一郎指挥五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兵力约八万人，分三路西犯，以芷江基地为目标，中路、湘黔公路正面敌，以宝庆为基地，沿公路及其两侧地区，西经洞口以趋芷江，似为日军的主力；南路，新宁日军先于早几天分向武冈，城步窜犯，企图包围国民党四方面军主力右翼，并乘隙由武阳镇、黔阳、洪江间道直逼芷江；北路，由永丰（今双峰）、湘乡入新化，直趋溆浦、桃源一线，另由益阳、宁乡日军一部西窜，威胁常德、桃源，以策应其主力作战。九日，日军与国民党军开始接触，北起桃花江，南沿资水，以迄新宁全线四百公里展开激战。

日军仍施行其惯用的渗透战略，乘虚钻隙乱窜。九日晚北面日军已强渡资水，中路越洞口，南路围武冈，相继深入。国民党军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挥。并由冷欣与美国军官巴博将军各率军官二三人合组指挥所于湖南安江，针对日军战法，改进防守技术，以一部死守据点，牵制日军兵力，以主力控制机动部队，打击日军主力，沉着坚守各据点，扼制日军交通线，使其冒险前进的先头部队进退维艰。如坚守武冈部队，对抗优势的日军，始终被围不退，武阳等地守军却与阵地同归于尽等等。日军与国民党军对每一据点的争夺，常常往返十余次，使对方不得轻进。

为了准备在武阳附近地区邀击一再增援的日军，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发出要国民党94军提前到达会同、靖县的命令：

“限三小时到。昆明何兼总司令：（1616）密。卯梗午忠整兴电悉。应饬九十四军提前到达。中○卯（有）令一元西黄。”

二

湘西的武阳、武冈及城步、新宁一带地区为雪峰山南麓，高山峻岭，蜿蜒不绝，隘路特多，地形复杂。低洼之地，概为水田，除县道及乡村大道外，骑炮之运动殊为困难。山腹及山麓部分大多丛林密布，惟制高点尚多，于展望上无多大妨碍。武冈东北一带虽较平坦，但层峦环绕，道路繁复，资沅二水上游蜿蜒其间，两水河枯，多可徒步。又，此一带村落极多，宿营给养尚无困难，惟接近战地民众相率逃亡，乡村组织不健全，难以协助部队之作战。

日军这次在湘西会战中向武阳与武冈进犯的部队是，

第36D（欠218R）师团长——伴健雄中将；

216R联队长——熊野；

217R联队长——佑木清次；

第68D所属B旅团长——关根久太郎；

第65大队长——西山义郎；

第115大队长——小笠原；

第116大队长——曹本；

第117大队长——长里常；

第11A直属之特种兵部队。

统计兵力约在二万左右。

为协同国民党第四方面军作战，以有力之一个军进出于沅水以东，将国民党第四方面军正面之日军击灭之，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俭（廿八）电：“着第27集团军于梅口方面以一个师掩护94军进出巫水附近集结，尔后随94军向武阳方面攻击时，在94军之右并行攻击前进。”国民党94军则着以第5师于艳（廿九）日午前集结于长铺子、绥宁间，即向武阳敌后攻击前进；第121师于艳日集结党坪、鹅公岭东山间地区，以沿第五

师作战方向相机协同攻击前进。

二十八日，国民党94军部队到达靖县，国民党第5师集结于长铺子、龙凤坡地区，已与国民党44师取得联络，121师一部到达鹅公岭，主力到达靖县以东地区集结完毕。

二十九日，梅口以东一带地区之敌，被击不支，仍改向武阳方面西窜。三十日晨，即令国民党94军第5师速由梅口以东向武阳攻击前进，是日十八时左右，第5师先头之13团即进出于黄东塘、苦黎冲间及其南北之线，掩护师主力渡河。

五月一日晨，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电话谕：“第四方面军右翼紧张，着94军迅速向武阳攻击前进，以策应该方面军之作战。”飭94军遵照，时所得敌情：①梅口之敌三千于先头前往珠玉山向武阳窜扰；②唐家坊有敌三千多。是日拂晓，国民党第5师13团已击破梅口、武阳道上沿途日军后卫部队之抵抗，经激战后，击破敌之警戒部队。午刻攻克武阳，随向盘据龙烟山、六王庙、大河冲之日军攻击。日军凭险顽抗，相持至夜，国民党第5师即另组有力支队，由副师长邱行湘率领经罗家铺向李溪桥方面敌后迂回，酉刻第5师主力推进至傅家坳附近。

五月二日拂晓，第5师继向武阳以北之鸦雀桥、李溪桥之线攻击。当面之敌五六百，炮二三门，依据王里庄及附近高地顽抗。战斗甚烈，国民党军奋勇争先，迄午遂将马鞍山攻下。迄晚，日军继增到七八百，国民党军以进展困难，遂相持而入于夜，敌逆袭再三，均未得逞。是役毙敌115大队第四中队中队长铃木中尉以下三十余人。未时，经罗家铺向李溪桥，未遇敌之抵抗，于黄昏前到达。

综合以上情况判知，敌大部趋向武阳，有向国民党军北进或东进之企图。国民党第5师决心依正面之攻击，以抑留当面

之敌，各以有力一部由左翼及敌后迂回包围敌人而歼灭之。遂策定攻击计划如下：

“①第15团（欠第二营）及第13团第三营为挺进支队，归副师长邱行湘指挥，即由傅家坳经珠玉山、曾家桥、罗家铺、李溪桥，迂回攻击曾家坊、万福桥之敌，以协力主力之战斗。

②第13团（欠第三营附15团第二营）继续对正面之敌攻击，并抑留之，以迄于我迂回部队之到达，务将当面之敌于六王庙附近捕捉而歼灭之。

③第14团（欠第二营）为右翼包围部队，于三日进至欧溪桥东南地区，预定而后自西向六王庙攻敌侧背。

④第14团第二营为师预备队，位置于傅家坳附近，尔后随战况之进展向欧溪桥推进。

⑤指挥所在傅家坳。

⑥攻击时间预定为四日拂晓。”

五月三日，国民党第12团正面之敌已增至一千二三百人，拂晓以后，以一部与国民党军争夺马鞍山，炮火猛烈，守备该山之第13团第五连（欠一排）以地形孤立，且受敌瞰制，应援不易，对敌炮兵无法压制，阵地全毁。该连伤亡过半，最后犹反复冲杀拼战，至午后三时许先后毙敌五十余人。惟以众寡悬殊，马鞍山遂陷敌手。

邱支队拂晓开始行动，经九十里之强行军，酉刻到达李溪桥，正搜索敌情，同时据报罗家铺方向发生枪声，情况不明。

国民党第5师师长李则芬决心不变，于午后九时在傅家坳战斗指挥所下达命令：

“①敌情如贵官所识：我121师362团明日可进出于杉木冲之线，该师主力控置于长铺子附近。

②师于明（四）日以有力一部挺进敌后，主力由左翼包围当面之敌，进出于万福桥东西高山之线，将敌捕捉而歼灭之。

③挺进支队（第15团欠第二营附第13团第三营）于明（四）日由李溪桥向曾家坊、万福桥、六王庙、龙烟山之敌攻击，遮断敌之退路，协力主力之战斗。

④第13团（欠第三营附15团第二营）为右翼队，继续攻击当面之敌，左与第14团切取联络。

⑤第14团（欠第二营）为左翼队，由欧溪桥向连相冲、大河冲之敌攻击，奏攻后，转向六王庙攻击。右与第13团切取联络。

两翼队之战斗地境，现地指示。

⑥两翼队应于明（四）日拂晓前完成攻击准备，待命攻击。

⑦第14团第二营为师预备队，位置于傅家坳附近随攻击之进展，向欧溪桥附近推进。

⑧工兵营（欠一连）在傅家坳附近待命。

⑨卫生大队以主力于傅家坳，一部于油石冲开设绷带所。

⑩通信连应准备随攻击之进展延伸线路。

⑪余在傅家坳战斗指挥所。”

四日拂晓以前，各部队概已准备完毕，旋即开始行动，右翼队经激烈战斗于十一时再度克复马鞍山。

正午稍过，由罗家铺增来敌千余附炮二三门，分两路向国民党军右翼队猛扑，其一部攻抵神仙坛附近，企图包围国民党军之右翼队。当以右翼队之预备队及师预备队，展开于茅柴岭西南之线，对来犯之敌猛烈迎击，其犯茅柴岭之敌，先被国民党军14团二营抑止，茅柴岭以北各地战斗激烈异常，国民党军营长甘健民，即于此役负伤。另敌一股约六、七百人，自午迄戌对国民党军鲤鱼山15团第二营阵地，一再猛扑，国民党军各级官兵均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誓死拼战，虽全营伤亡百余人之多，阵地仍屹立未动，敌势遂为之稍杀，至晚，敌我仍相持于铁陂寨、鲤鱼山及武阳市以北之处，右翼队遂陷于对北对东

两面作战。马鞍山特为突出，形成国民党军之一大弱点。

右翼队仅遇微弱之抵抗，于黄昏前攻抵大河冲附近。

挺进支队以一部扼守李溪桥，防敌东窜，主力第15团于戌刻前先后攻克曾家坊、万福桥、六王庙、龙烟山之线，敌大部仍退据附近山隘顽抗。

十三日毙日军四百余人，国民党军亦伤亡营长以下二百余人。

至是判明与国民党军对战之敌，除原有之58旅团主力外，复由罗家铺方向增来117大队，兵力不下三千人，经国民党军连日攻击，伤亡甚重，其重点及炮兵已转移至神仙坛、茅柴岭、龙烟山间地区，师以合围之势，遂乘夜调整部署，继续围歼该敌。

对各部队下达如下之命令：

“①当面之敌经我连日攻击，伤亡甚重。其重点及炮兵已转移至神仙坛、茅柴岭、龙烟山间地区；

②师拟乘夜调整部署，明（五）日拂晓继续攻击，由两翼包围敌人而歼灭之，重点指向神仙坛；

③第14团（欠第一营附第13团第三营）为右翼队，展开于铁陂寨及神仙坛西南端之线，攻击当面之敌，进击于茅柴岭附近，重点指向神仙坛；

④第13团（欠第二、三营附15团第二营）为中央守备队，确保武阳东南端至鸦雀桥北端高地之线，并以积极行动，协力两翼之攻击，以一部守备武阳市街；

⑤挺进支队之15团（欠第二营）及14团第一营为左翼队，由邱副师长统一指挥，展开于万福桥东南之线，对龙烟山、六王庙之敌攻击，重点指向龙烟山，奏功后，由北向南攻击，协力右翼队之战斗，支队扼守李溪桥之部队，仍继行前任务；

⑥战斗地境如下：

右翼队
中央守备队

军丛山（含）——茅柴岭（不含）之
连线，线上属左；

⑦各部队应于明（五）日拂晓前部署完毕，待命开始攻击；

⑧余在傅家坳指挥所。”

五日拂晓，各部队开始攻击，十时许右翼队方面第14团第二营攻占神仙坛之大部，敌凭险顽抗，数度增援，激战至烈，连长萧叔康身负两枪，犹裹伤再战，士气益励。迄午以第三营主力加之攻击，反复冲杀，五时顷将敌击破，完全占领神仙坛。敌向茅柴岭方向溃退，阵地遗尸数十具，国民党军乘胜追击。

左翼队方面，第14团第一营拂晓与15团第一营、第三营第八连对六王庙附近之敌攻击，出敌不意，猛烈果敢，一举而摧敌之炮兵阵地，随后占领六王庙东北高地，计先后毙敌二百余、马三十余匹，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三门等军用品，生俘敌兵二名，残敌二百余向东逃窜，当令第一营尾敌追击。

左翼队第15团第三营数经激战，于拂晓前完全攻占龙烟山后，与第14团第一营取得联络，夹击由六王庙附近向东败窜之敌，计毙敌约二百余，缴获军马二十多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生俘敌兵四名。第15团第一营一部对北警戒，主力与六王庙向北败窜之敌激战于万福桥东南高地，毙敌二百，予敌巨创，敌折向东窜，于横溪冲附近，缴获马三十余匹，及许多军用品，俘敌二名。

五日晨，另由瓦屋塘方向窜来敌约千余，抵李溪桥，经第13团第三营痛击，伤亡极多，折向花园市退击，第三营派队尾追，与其掩护部队发生激战。

自四、五两日总攻以来，敌受国民党军两翼夹击，伤亡惨重，遂开始溃退，惟龙烟山、横溪冲山地，有敌115大队残置之掩护队五百人，及茅柴岭、鲤鱼山附近地区有敌二百潜匿，仍

在继续扫荡中。

是晚，奉94军军长牟廷芳电：

“①第五师于鱼日继续执行原任务，肃清神仙坛、茅柴岭、六王庙各附近之敌，即向花园市方面前进，截击东退之敌。

②第121师即经高坪、枫门岭、张家寨向武冈迂回，遮断敌归路。

③军指挥所向长铺子推进。”

师遵命部署下达命令：

“第五师命令五月五日二十时于傅家坳。

军队区分：

（甲）进剿部队：

龙烟山地区：指挥官许颢。

第14团第一营；

第15团第三营。

茅柴岭、鲤鱼山地区：

指挥官罗莘求。

第14团（欠第一营）。

（乙）堵剿部队：

东北方面：指挥官邱行湘。

李溪桥第13团第一营；

万福桥第15团第一营；

罗家铺121师之一营。

总预备队长章建军。

第15团第二营。

一、当面之敌为我击溃后，主力已向东逃窜，其盘据武阳附近之残敌，一股约五百余人，潜匿龙烟山、横溪冲附近地区；另一股约二百余人，潜匿茅柴岭、鲤鱼山附近地区企图向东潜窜。

二、师以歼敌为目的，于明（六）日向该敌围剿。

三、进剿部队应于明（六）日拂晓开始行动，务以勇敢果断之行动、缜密之部署，搜求残敌而歼灭之。

四、东北方面堵剿部队应在各该部队现在位置附近封锁敌可能利用之道路，择要构筑工事，广派便探，各使该敌无法脱逃。

西南方面堵剿部队应以一营位置于铁陂寨附近，另置鸦雀桥西南方高地。防制敌之脱逃，并应于本（五）日夜完成防御配备。

五、总预备队位置于军丛山附近。

六、余在傅家坳战斗指挥所。”

六日拂晓，第14团第二营排除当面敌微弱之抵抗，向罗家铺方面追击，侦知残敌约千人，炮三四门于五日夜半通过罗家铺东渡，该营尾穷追，当于六日午后于黄羊坪附近，将该敌追及，敌顽强抵抗，国民党军略有斩获。入夜后，敌继续向东窜。此时第121师361团到达，跟踪追击，该营即回罗家铺待命。

第15团当面龙烟山、横溪冲间之残敌，经该团围攻，大部就歼，残部二百余人更换便衣，乘夜东窜，被李溪桥第13团第三营阻击，转窜湾头以南山地中。复令第14团第三营经大竹山向北协力第15团之搜剿，大部被击毙，敌部三三五五四散，盲目奔逃，武器大都沉于水塘河潭中，后经地方民众俘虏及击毙者更不下二百余人之多。迄至五月十日，武阳附近残敌始告肃清，该团旋即奉令开往武冈参加主力之作战。

是役毙敌千余名，国民党军伤亡四百余名。据俘供：与国民党军作战之敌系68师团所属58旅团下辖115、116、117三个大队及配属之炮兵大队、工兵大队、重机枪大队等部队，共四五千，旅团长关根久太郎。这次战役的胜利是国民党军的“后发制人”谋略变“先发制人”谋略的灵活应用。所谓“后发制人”，就是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略。在这次武阳遭遇

战中，国民党军的将军们强调以我之持久，对敌之速决，避免在敌军疯狂进攻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而是争取时间制造条件，寻求敌人的可乘之机，打它个措手不及，变“后制”为“先制”，抓住有利战机，突然集中能战的主要兵力，先吃掉敌某一路进攻，最后打破敌军的多路合围。这就是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后发制人”，变战役战斗上“先发制人”的明显的战例。

三

武阳附近之日军被击溃后，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辰鱼(六日)未电开：“94军主力及29军之44师应即进出武冈南北地区向高沙市、黄家铺方向跟踪追击，协同第四方面军会师歼邵阳以东地区之敌。”并即令国民党94军主力于五月齐日以前进击龙溪桥——武冈——李溪桥概略之线，确实搜索当面敌情后即向黄桥铺、高沙市方面追击败敌。

五月七日，国民党94军令第5师第15团(欠第三营)附14团第三营于李溪桥、万福桥间扫清战场残敌，对北警戒，整补后即经武冈东北地区向黄桥铺追击前进。本日先以一个团向武冈以西之塔岭进出对北对东搜索警戒。八日，第5师有力一部围攻由横溪冲溃窜毛坤塘之敌，主力在武阳附近整补，准备向武冈方面转用。九日，国民党第5师已将武阳附近各地残敌完全肃清，开始武冈行动。十一日十四时许，先头到达黄桥铺，主力进至花桥附近，得知黄桥铺方面无敌踪，冷水铺附近尚有残敌千余在国民党军围攻中。为防敌东窜，即令第13团派队守备施家渡、茅盖渡，第14团派队守备柳山渡、田家渡及其以南徒涉场，第15团第三营守备关家桥，并于河西占领桥头阵地以利尔后之进出。

是日二十三时许，敌五六百附有山炮、迫击炮各二三门，向关家桥桥头阵地攻击，守备该处之第15团第三营(欠一连)因早

已有备，沉着应战，先后击退敌四次之突击，毙敌百余。惟敌以关家桥为东窜必经之路，誓死争夺，于拂晓前第五次向桥头阵地密集冲锋，势在必得，战斗之激烈空前，15团第七连官兵伤亡殆尽，遂被迫转移河东死守桥梁。同时敌机在关家桥上空彻夜盘旋，敌突围东窜之企图至为鲜明。国民党军为歼灭该敌，遂决心与敌兵力战，国民党军118师一个团到达黄桥铺附近，15团亦于十一日晚到达武冈七里桥附近，遂于十二日正午稍过，调整部署。下达命令如下：

“第五师命令：五月十二日十二时十四分于花桥师指挥所。

一、围困于关家桥、明月寨、冷水桥间地区之残敌，约兵力二千人，附有山炮一二门，马鞍石附近亦有敌一部约二千余，似已全股，并有待援东窜之企图。

现在18军118师由石马江、黄桥铺向南，121师由刘家桥、流沙市向东，对该敌包围攻击。

二、师以协力友军歼灭该敌之目的，以一部扼守资水右岸，防敌东窜，主力而进出资水左岸，攻击该敌。

三、十五团为守备部队，应以有力一部占领关家桥东端要点，并要构筑工事，防止敌之东渡，并以一部于荆竹铺，癞坪岭各附近对东南占领阵地。

四、14团为出击部队，应由田家渡附近渡过资水，先进出于池塘口、沙子冲之线，相机占领风神寨掩护师主力之渡河。攻击开始时间，由该团自行决定。

五、13团为控置部队，除以步兵一连派出于水浸坪附近及保坊庙附近担任警戒外，主力位置于花桥、大塘铺、紫山寨间地区，视出击部队之进展，适时进出于资水以左地区，以扩张既得之战果。

六、师战斗指挥所在花桥南端森林中。”

十八时许，各部队正按照新部署调整中，忽据探报，茶铺

子、盐泉山附近发现敌便衣队二三十人，已渡过资水。当命15团第三营派队驱逐，并以一部占领盐泉山。二十二时许，奉牟廷芳电话要旨：“该师以一部留置关家桥、花桥及其以北现位置，扼守资水东岸，阻击东窜之敌，主力转移于茶铺子及其以西至余家桥间，联系121师向北攻击敌人。”乃决心以第15团（附第14团第二营）留置花桥迄盐泉山间的沿河守备。惟以防线过宽，且到处皆可徒涉，特飭该团重点应置荆竹铺附近，第14团先以一部占领茶铺子东西高地，掩护师之主力转移，其主力逐次由朱溪桥附近渡河，向西延伸，左翼衔接121师向北攻击。第13团先控置磴子铺、曾家冲附近，当时已入夜，即用电话部署，即时开始行动。是夜敌乘国民党军主力转移之际，猛攻曾家桥，冲锋十余次，15团第七连仅余连长刘旺以下官兵三人，仍坚守至最后。迄十三日拂晓，13、14两团概已到达磴子铺附近时，盐泉山方面由鲢鱼渡乘夜偷渡之敌，增至五六百人，盐泉山成混战状态，经14团第三营及第15团第二营各一部与敌互相争夺后，敌占据北端山顶，国民党军占据南端山顶，相持对峙。此时第15团兵力分散，且受鲢鱼渡方面敌人之迂回，为避免受敌包围，另命该团向癞坪岭方向稍事集结，即与茶铺子东西线之第14团，协力攻击敌人。迄午后三时，配属之山炮兵一连，到达朱溪桥附近，当即令于先锋寨东侧占领阵地。协力第14团攻击盐泉山之敌。经数度冲锋，于黄昏占领该地。是夜敌以有力一部与国民党军争夺盐泉山，反复冲杀，战斗颇烈，毙敌六、七十，并有虏获，国民党军伤连长一员，排长二员，士兵五十余名。十四日拂晓始将该处残敌肃清，敌主力于先晚渡过资水，经花桥向东北退却，遂以第14团继续向北扫荡当面残敌，第13团主力及第15团有力部队（以第一营及第三营第八连编成之加强营）为追击队，经水浸坪向北追击，迄午已通过桐木塘向北急进。第14团第二营攻占柴山寨后，闻

花桥方面枪声甚密，知121师先头已到达该处，遂继续追击败退之敌，协力121师361团之战斗。攻抵花桥附近之大山岭，遇敌有抵抗，战斗转激，毙敌二十余人，生俘一名并获步枪一支，国民党军亦伤亡排长以下三十余人。

十五日，第13团进抵天鹅山附近，敌扼要死守，同时法西坳附近之敌，对121师361团反攻甚烈。令13团猛攻当面之敌，14团经柴山寨向北攻击，策应361团之战斗。

十六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奉94军军长牟廷芳辰铤已诚庙电节开：

“一、当面之敌，主力向桃花坪及其以南地区撤，一部在芭蕉桥、烧纸铺间据险顽抗；

二、军即超越追击，期于桃花坪以南地区包围歼灭之；

三、第五师以第13团（附第15团第一营）对芭蕉桥、烧纸铺之敌攻击，尔后向栗山铺进出，第14团即经谢家铺，米山铺追击包围敌人，第15团（欠一营）及师部位置于水浸坪；

四、121师以一部由马坪街向石狮口、易家桥前进，并与第5师夹击芭蕉桥、栗山铺之敌。”

第5师即遵照部署于正午十二时开始行动。

十七日，第13团继续攻击当面之敌，占领572高地，敌遂向东北溃退，当即协同121师361团先头跟踪追至芭蕉桥路口。得121师通报，部队将有新任务，遂在原地待命。

第14团于辰刻通过邓家铺向栗山铺迈进，得知敌突入划家塘以南地区，遂以一部截击敌人，支援友军，并阻敌南窜。至申以新宁方面发生新情况，师奉命一部继续向资水两岸追击，师主力概于十九日到达武冈、石羊桥间地区，任资水两岸守备。

同日，国民党94军军长牟廷芳和26军军长丁治磐接到第三号作战命令要旨：

“着94军之43师即开城步、真良间地区，限筱（17）日开始行动，巧（18）日前到达。该军须另以一师集结于武冈，以一师由南向东向北追击歼灭败溃之敌，到达金柿市、唐渡口沿资水西岸之线即停止待命，并随时注意部队之掌握，以便尔后之转用。军部暂位置于武冈，必要时则移动驻梅口，仰即遵办具报。”当日晨，在芭蕉桥、两路口间顽抗之敌三千余，经国民党94军主力连日攻歼，伤亡颇众，复经第5师及121师猛击，迄午敌不支，纷向芭蕉桥以东地区溃逃。当追杀尾敌时，敌复转向朱山铺方面退窜。该两师遂各派有力一部超越追击败逃之敌。十八日，为防止新宁方面之敌，除以第5师有力一部追击东溃之敌外，第5师主力向高柱岭、武冈间，121师向木瓜桥、渡头桥间地区移动；43师即占领火烧界南北之线，准备自西向东侧击由新宁北窜之敌。94军军部移西岩市。并策定对新宁方面之作战指导：“以94军之一部控置武冈，主力追击敌人于资水以西地区。”十九日，94军除追击队外于本日十三时概完成新部署：“以新宁方面敌之动态不明，即令43师之128团经石狮口向新宁攻击搜索前进，并相拒攻占之。”二十日午刻，43师128团先头一部（一个营）到达马头桥附近与五六百附炮二门之敌激战，战斗至申，将敌击退，该团主力酉时进抵龙潭桥。二十一日，43师128团于本日拂晓起开始向新宁西之左家山、鷓子岭进行，遭遇约步兵千余附炮数门之敌攻击，反复争夺，激战终日。敌凭险据守，相持至晚，仍在对峙中。121师追击队本日在中沙田附近截击石门山附近之敌，颇有斩获。第5师追击队本日已到达石马（桃花坪西南）。据报桃花坪附近敌已全部退过资水东岸，将桥梁焚毁，并在向竹桥南北之线逐步退守。二十二日九时，43师129团继续向鷓子岭附近之敌攻击，敌伤亡惨重，迄午攻占该地。旋左家山之敌增援，向该团右翼反扑，其沉着应战，敌未得逞。第5师追击队由石马向金柿市方

向追击。121师追击队马晚击破石门山附近之敌，晨即占领石门山，继续向邓家铺、金柿市追击。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即于养电规定：94军即以有力一部扫荡高桥、朱山铺附近之敌，向资水西岸进击。二十三日，94军追击部署如下：“（一）第5师追击队即扫荡朱山铺、邓家铺附近之敌，尔后向金柿市、花石桥（水浸渡南）西岸之线进出。（二）121师追击队扫荡石门山附近残敌，尔后再向盐田桥、金柿市之线进出。（三）43师128团以一部位置于高桥（新宁北）附近向南搜索警戒，主力即进出东江口、黄龙桥之线扫荡残敌，后再向盐田桥、石山之线进出。”本日各追击队扫荡资水以西残敌，直如风卷残云，除二十四日午后敌约二千余经王家亭向东北逃遁外，其余小股概被斩杀追歼。至二十六日，各追击队到达金柿市附近地区，王家亭以南及资水西岸已无敌踪。湘西会战于此即胜利结束。

四

从四月九日到六月二日，前后经过五十天的湘西会战，国民党军取得了辉煌之重大胜利，计毙伤日军29,174人，俘获日军军官17人、士兵230人，缴获马347匹、大小火炮24门、轻重机枪一百挺、步枪1,333支，其它战利品20吨。这次会战中日军虽然以娴熟的战斗技术主动进攻，但是作垂死的挣扎，意志非常消沉；而国民党军将士则士气旺盛，攻击精神充溢，有同仇敌忾之心和忍苦耐劳、不避艰难的精神，在会战中主动以钳形攻势，向敌包围歼灭；各级中美军官相互合作和美机的不断轰炸，所以能予敌惨重的创伤。尤其是国民党94军所辖部队第5师更能体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民党军是有一些能打仗的。”在这次会战的武阳遭遇战和武冈及其附近地区的追击战中，国民党军第5师确实表现出中华民族对敌英勇善战的

的精神，多次得到国民党军事领导人通电嘉奖。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在五月六日就两次为94军第5师能如期集结兵力，收复武阳，打破敌迂回洪江之企图发出鱼电：“查此次战局好转，捷胜肇端，悉赖吾兄（指羊廷芳）识破战机，大胆行动所致，功在国家，至堪嘉慰。”“第5师支日在武阳附近痛歼顽敌，……殊堪嘉慰。”“开我军胜利之先声。”由于第5师作战行动之敏捷，攻势之勇猛，为击破敌左侧背的攻击创造了至要条件，因此能一鼓作气摧破敌人，转“后制”为“先制”，实为“开始胜利之转折点”。五月八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齐电：“查此次敌犯湘西……官兵忠勇效命，作战初起，即能拒止敌寇，……继歼武阳、武冈一带敌人，迭克数地，开胜利之基石，至堪嘉慰。”五月二十六日，汤恩伯又电转蒋介石的嘉奖马电：“奉委员长辰马令元西亥电开：敌犯湘西，该方面军一部参战于梅口、武阳、高沙市，同心协力，英勇作战，击破敌寇，首开本会战胜利先声，着即传令嘉奖等由。”

日军经过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国民党军乃开始大反攻。

“湘游·纵”回忆录

赵琦 陆民华 刘文通*

三十六年过去了,许多事早已淡忘,无复记忆,但是当年的战斗生活,即使只留下一鳞半爪的印象,也常常唤起我们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在祁阳福音堂二楼的一间房间里,我们这三个隐蔽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祁阳县城里的共产党员,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建立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开展武装斗争。

这个决定是在中共衡阳(地下)工委的领导下产生的。当时,工委负责人刘国安同志,是我们在衡山师范读书时同一支部过组织生活的同学。他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就曾提出打游击的事。从那时起,我们便着手准备。到了一九四九年初春,解放军在胜利结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直逼长江。蒋介石集团表面应付与中共和谈,实则积极准备,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在南方特别是在两广建立起巩固的后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工委和我们都认为,祁阳(当时的祁阳包括今祁阳、祁东两县所辖范围)一带是广西的咽喉。我们控制这一地区,就好象在白崇禧那个老狐狸的喉咙眼里卡上一块硬骨头,虽不致命,却可以扰乱他们的安宁,牵制他们的兵力,破坏他们的征兵、征粮工作,并堵截他们的退路,从而能更好地贯彻中央“打过长江去,

* 赵琦、陆民华、刘文通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部队第一纵队”(简称湘游一纵)政委、政治部主任、第一支队政委。

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作出了建立游击队的决定。后来，我们叫“二月决定”。

在福音堂会议上，我们还讨论了组织发动群众，筹集武器、给养，以及建议由华中衡阳支部负责人之一罗特同志（当时叫罗顺楚）任游击队领导人等事项。

参加那次会议的，除我们三个外，还有一个唐鼎甲。他不是党员，但在衡山师范时就已定为发展对象，是个搞武装斗争的积极分子。

“二月决定”以后，我们便分三路深入城镇乡村，串联发动，组织人员，筹集武器。我们打算：一、发动青年学生、农民参加革命斗争；二、策动敌人营垒中有识之士起义。

我们三人的分工是：赵琦回归阳老家，负责东南区的组织工作，那里有较好的基础。刘文通去曾经做过小学教员的秋塘坪一带，领导西北区的活动，那里比较偏远，有较大的回旋余地。陆民华是县立中学教员，负责串联发动县城的学生参加部队。

由于广泛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如亲戚、朋友、同学、师生、亲族……等等，并较好地掌握和利用了敌人的内部矛盾，因而我们能在短期内较顺利地把各种反对蒋介石的力量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首先，我们建立起以青年进步学生和农民为主体的骨干队伍；同时，对国民党地方武装，在乡军人积极进行策反；对乘乱“揭竿而起”的各种武装力量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我们在东南和西北两处都打开了局面。

东南区方面，赵琦回归阳后，首先串联发动附近几十名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农民，找到一九四二年“皖南事变”后筹建地下武装时埋藏起来的一批武装，加上唐硕人搞来的一些枪枝，装备起第一批游击战士。接着，我们又收缴了河阳乡、

金兰乡乡公所及附近一些保公所的枪枝弹药，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为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我们对彭林生进行了策反工作。

彭林生是国民党一个失意在乡军人，曾任师长、副军长等职。一九四四年祁阳沦陷时，他是蒋介石嫡系蒋伏生自卫军的副司令。但是，我们得知，此人与蒋伏生（时为衡阳警备司令）矛盾很深，且对国民党前途十分悲观，有另寻出路之念。唐硕人的亲戚彭监（一个进步大学生）又证实了这一情况。我们认为，争取此人起义，对我们很有好处。于是，通过唐硕人、彭监、彭涛、彭炳生等介绍、陪同，赵琦与陆民华前往彭林生家“拜访”，对他纵谈形势，劝他选择前途，动员他举旗起义。第一次，彭林生态度含糊，不置可否。以后又多次会晤，他还是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坚持不懈。经过两个月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彭林生终于在六月中旬，率三百多人枪起义，并提供一万块银元作为部队经费。

不久，过水坪的陈清华（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带领的武装有一百来人枪，多次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迫切要求寻找党领导的起义队伍，也来投奔我们。

西北区方面，刘文通与邹削强、邹子模等人也积极开展工作。

邹削强是刘文通在秋塘坪当小学教员时的学生，后来在县城上中学，是个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因主办“星月社”，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勒令退学。刘文通就住在作为联络站的邹削强家里。通过各种渠道在青年学生中串联发动。这时候，西北区已经有了两支队伍，领头人是张练斋、邹湘、邹仙洲、邹廷寿。

张练斋是个没能完成学业的交通大学进步大学生。因为领

头闹学潮，被特务列上黑名单，便逃回祁阳，带领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借”了一家地主的二十一条私枪，最先打出游击队的旗号。邹湘和邹仙洲也是大学生，不久前从香港回到祁阳，与外号“延老猛”的辍学青年邹延寿在一起，串联二十多个青年知识分子，搞了十八支枪在乡间活动。他们希望得到党的领导。刘文通通过邹削强与他们取得联系，经两次会晤商讨，于五月下旬，两支队伍合而为一，组成一支六十余人的游击队。

这支队伍组成后，首先打击了秋塘坪、久安、乔木堂、罗城等乡的乡公所，收缴了他们的全部武装。不到一月，队伍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有枪械九十余支。

此外，在西北地区活动的还有一支唐鼎甲率领的队伍。唐鼎甲在“二月决定”后首先回乡，用变卖田地所得，买来两支手枪，一举缴了地主谭介甫家私枪三十余支，拉起了队伍。我们派他去与祁邵衡边区游击队（王佐、曹炎部）取得联系，并配合行动。

除了东南、西北两处外，在衡阳方面，黄振也搞起了两个独立分队，称为独立一营、独立二营。

独立一营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夺枪战斗。他们首先缴了两市塘国民党七十一军前哨所轻机枪四挺，自动步枪、卡宾枪十余支，子弹十六箱。接着又拿下演陂桥警察所和仁义、成德、钟武等乡公所，收缴了全部枪枝弹药。加上一些同志带来的武器（肖攀龙带来步枪十二支、手枪四支，肖济海带来手枪二支），这支队伍人员、武器都较充足。全营三百零四人，不缺枪支，还曾支援县武工队步枪二十五支。

独立二营有指战员一百八十余人，全靠白手起家。他们缴了长乐、永康两个乡公所的武器，又夺了衡阳县警察局刘涛大队李芝裕中队的枪械，武装了自己。

一九四九年五月，遵照衡阳工委的指示，我们在后栏桥正式成立了党支部，赵琰任支部书记，陆民华、刘文通等同志为支部

主要成员。

六月下旬，整个部队已发展到一千余人枪。我们在后栏桥召开了一次干部会。部队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部队第一纵队”，简称“湘游一纵队”，并建立了领导机构：赵琦为纵队政治委员兼第一支队政委，黄振为纵队司令员（因刘国安将暂离衡阳，罗特不能来游击队担任领导职务），彭林生为副司令员，陆民华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唐硕人为参谋长，邹雯为副参谋长（后派去四纵任参谋长），并正式任命两个支队和纵队直属队的领导成员。第一支队：彭道生（彭林生的弟弟）为支队司令员，第二支队：刘文通为政治委员，张练斋为司令员，邹湘、邹仙洲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二支队还任命刘俊国、李子英为正副财粮主任。

为了加强联系和及时掌握各地情况，我们于后栏桥会议前后，除原有老江边院子（邹削强家）、大水蒋家（蒋经成家）两处联络点外，又增加草源冲（曾庆明家）、归阳（唐硕人家）、祁阳县城（彭博爱、王祖貽、邓尉林家）、衡阳市（蒋采青家）、白地市（徐文澜家）等联络点。中共湖南省衡阳工委派郑政椿等同志负责与纵队部联系，传送文件，传达指示。

这时，和平解放湖南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白崇禧却集重兵于衡宝一线，大有与我军决战之势。因此，在后栏桥会议上，纵队党支部提出了“巩固、发展、建设部队，更有力地牵制敌人、打击敌人”的任务。

会后，祁阳县警察局督察长陈北堂在与之交谊颇厚的彭涛的反复说服下，率领一个三十多人的警察分队起义，这个分队后来成为独立团的骨干。接着，中山大学学生陈焱也率三十余人从城里下乡来与我们汇合。他后来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二支队方面，根据纵队党支部提出的任务、要求，一面进行自身的思想建设，一面积极准备攻打北区实力最强的民有乡

乡公所（黄土铺），以夺取武器，扩大自己的队伍，削弱敌人的力量。

部队不断壮大，给后勤工作增加了困难。为了保证供给，各支队除向地主强行筹粮筹款、借取义仓积谷（给借条）外，还积极开展袭击敌军过往军车及军用仓库的活动。这项活动既解决了我们给养方面的困难，也给了敌人以打击。如一支队袭击归阳赵家祠堂国民党军用仓库，夺取了他们库存的全部军用物资。纵队副司令彭林生率领部队伪装国民党军官拦截敌人的军车，不费一枪，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我们这支游击队虽然建立不久，而且当时人不满两千，枪不过一千儿百，但它好象插在蒋白军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人惶惶不可安宁。他们四处布告悬赏，捉拿黄振、赵琦、彭林生、刘文通等人，还放火烧了彭家宅院。五月间迁入祁阳县城的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严令各地方武装全力对付我们，驻扎祁阳境内的白部也派出数倍于我的兵力，多路出动，对我们实行“围剿”。

敌人的“围剿”，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使我们的斗争更加困苦，更加艰难。特别是鹧鸪庵和石狮岭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受到较大损伤。

在鹧鸪庵失利的是二支队。

后栏桥会议后，二支队集结于源头冲，驻扎在地势较好、进退方便的鹧鸪庵，一面对大多是青年学生和农民的战士们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一面做打民有乡公所的准备。但就在我们将要采取行动的前两天清晨，敌人抢先袭击鹧鸪庵，经一小时激战后，我二支队胜利突围。战斗中并无伤亡，但是有五名新战士走错了方向，落到敌人手里。待我们营救时，他们已被解往祁阳县城，有三人于途中被敌人枪杀。他们是：青年学生、地下团员徐慎安、青年农民张善修、刘寿和尚（奶名）。上述五人中，十六岁的女学生赵曼丽和十四岁

的张武，虽然未遭杀害，却也被毒刑拷打，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放。

石狮岭在衡阳县关帝庙附近。七月十四日，我纵队部与一支队约一千人，为避开敌人主力，由岐山转移到这里，与衡阳独立二营汇合，司令部驻在石狮岭。十五日凌晨，白崇禧部队的一个团尾追我部，向我纵队部发出突然袭击，黄振、彭林生和赵琦，当即指挥部队予以还击，双方发生激战。独立二营全力掩护纵队部撤退，战斗持续四个多小时，终因敌众我寡，力不能支，致肖功扬、李发生二人当场牺牲，三十多人被敌俘去。其中营长李超白、文书欧阳庆生、战士刘忠元被杀害于洪桥；陈世雄、刘君贤等在“刑场”“陪斩”后转入外地监狱，直至全国解放才获救。这次战斗，衡阳独立二营做出了较大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在反“围剿”中，我纵队还有六位同志献出了生命。他们是：刘继松、刘铁桥（找李桂平策反）、黄熙文（去嘉禾、蓝山策反途中为敌所获）、曾凡寿、曾庆宜、谭哲全。

尽管如此，国民党军队并没有象他们所吹嘘的那样，在一月内消灭我们，严峻的战争环境使每一个游击战士受到锻炼和考验，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随之提高。

这时，刘国安同志暂离衡阳，一纵暂由罗特同志直接领导。罗特同志派肖阳同志来祁阳与我们联系，同陆民华同志见了面，询问了部队情况，传达了地下党关于继续坚持斗争的指示。战士们挥泪掩埋烈士后，遵照地下党的指示，满怀仇恨投入了新的战斗。

一支队在石狮岭一役后，灵活转移，分散活动，一部分控制着湘桂线从洪桥到白地市一段，不断袭击敌人的军车和小股部队。一部分转战于常宁、宁远一带，先后两次在常宁境内与国民党军队交锋，歼敌二十余人。

二支队从鹞陂庵突围后，按部署在草源冲集结，重新整顿，与另一支游击部队——祁邵衡边区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并重新讨论了联合打黄土铺的计划。

正当我们策划下一步行动的时候，白崇禧部的一个团悄悄向我二支队逼近。为了摆脱敌人，二支队与祁邵衡边区游击队连夜行军五十余里，出草源冲，入邵阳县境，于次日凌晨，又回到祁邵边界两路塘，敌军咬住我们不放，到马杜桥，我支队回头反击，双方打了三个多小时，由于熟悉地形，我们打得灵活主动。这一仗，使二支队经受了很好的锻炼。不久后，在风歧坪打了个大胜仗，缴获邵阳自卫团长短枪五十余支，接着又在祁阳罗口町（现属祁东）缴地方反动武装张倚琴枪三十多支。九月，在攸陂陈家，缴当地地主武装枪六十多支。以后，又连续作战，打下紫冲、振兴、振汉、清源等几个乡的乡公所。支队一天比一天壮大，武器也不断增加和改善。

九月，衡宝战役即将打响，中共衡阳（地下）工委指示：所有游击部队，都要以迎接新中国诞生为中心，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群众，瓦解国民党基层政权，配合解放大军作战。赵琦带着地下党的指示，分别到两个支队召开部署新战斗、迎接胜利的动员会。提出的任务是：

一、以湖南和平解放和由中共衡阳工委转发的《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为主要内容，广泛宣传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

二、利用有利条件，配合解放大军作战。

三、做好瓦解县区镇乡保甲人员的工作，责成他们各安职守，服从命令，听从接收处理，对于顽固分子，坚决予以惩处。

四、分区作出筹备粮草计划，训练侦察向导人员，为迎接野战部队歼灭白部做好充分准备。

五、采取改编、接受投诚等方式，改造散兵游勇，确保城乡治安，稳定社会秩序。

六、加强游击队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深入进行政策教育。当时衡阳工委转发的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中心的纪律教育，使部队真正成为有觉悟、守纪律、懂政策的人民军队。

会后，纵队和二支队正式成立了宣传队。纵队以彭涛、曹纯为宣传队正副队长。二支队参加宣传队工作的有邹削强、赵曼丽、李时英、刘成荫、李莹、邹大寅等二十多人。宣传队翻印了《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印了《告父老书》、《警告乡丁》等宣传品。利用各种机会广为散发，并开展了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的文艺宣传活动。这时，敌人的正规部队已无暇顾及我们，而地方势力则已是胆战心惊，不敢妄动了。

十月初，衡宝战役打响，我一纵各部队全力以赴配合野战军作战，建立了一定的功绩。

其一、十月八日，我一支队与纵队直属队击溃白部独立十师蒋伏生部，俘敌百余人，解放了祁阳县城，刘国安同志直接指挥的湘南游击二支队的二团队二大队进行了配合。入城后，我部遵照统一部署，进行了维持秩序、安定民心等工作。

其二、二支队在七星岭、石亭子、黄土铺一带配合野战部队作战，杀伤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在攻打玉峰山战斗中，敌人顽固死守，三日未下，我军时有伤亡。支队派刘规舜率领一支三十多人的小分队抄小路袭上山头，很快结束了战斗。

其三、我一纵九名指战员机智灵活地俘敌一个营，传为佳话。衡宝战役打响后，黄振、赵琦率领七名战士深入战地，与野战部队联系，于紫冲附近遭遇白部一个营。黄、赵一面派人去洪桥报告主力部队，一面抓住敌人如惊弓之鸟的心理弱点，虚张

声势，制造俨然有大部队的假象。对敌人讲形势、前途，“训话”达三小时之久，为主力部队赶到赢得了时间。一个整营的敌军，不费一枪一弹，全部缴械投降。为此，得到了野战部队首长的表扬和奖励。

其四、我衡阳独立一营、二营在演陂桥一带参加了衡宝战役。

在这期间，二支队有一段插曲，不宜漏掉，那就是：张练斋惩治凶祭曹炎。

曹炎是一支略早于一纵的祁邵衡边区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六月初，反动地主、自卫队长曾圣斓暗中窥悉该游击队召开干部会，便向白军暗送情报，并配合白军连夜偷袭，使这支游击队损失惨重：副司令员王佐在战斗中牺牲，司令员胡铮和曹炎被俘后惨遭杀害，并被“枭首示众”，造成震惊祁阳的“六三惨案”。衡宝战役高潮过后，张练斋带领部队沿途收集散兵游勇的枪支。到黄陂桥，正好遇上了曾圣斓，真是无奇不有，那个作恶多端的匪徒竟然打起湘桂边区游击队的旗号，一变而为共产党游击队的司令，还恶人先告状，向当地驻军诬告我二支队为“土匪”，驻军闻报出击，令我部缴械。张练斋发现是解放军时，即令停火，向驻军说明情由。最后，野战部队首长查明真相，便将曾圣斓交我二支队处理。张练斋在召开公审大会后，将曾枪毙在曹炎墓前。当地群众无不称快。

在衡宝战役和解放祁阳县城的战斗中，一纵的同志们不仅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杀伤了不少敌人，缴获了大量武器（仅二支队就缴获各种武器六百多件，其中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五十余挺），还较好地完成了为解放大军侦察敌情、充当向导、发动群众、组织支前、委派乡镇干部、筹备给养、接送伤员、打扫战场、押解俘虏等项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即祁阳解放一月以后，我一纵奉命开

赴零陵天子地，与野战军合编为零陵军分区独立团，合编时，纵队已发展到三千一百多人，拥有各种轻重武器二千余件。合编后，一部分人员编入独立团，一部分人被介绍到地方工作，一部分到军校或革大学习，一部分被遣送回家。

游击队建立之初，其成员以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为主，比较纯洁。后因队伍迅速扩大，混入了一些坏人和不纯分子。他们一方面借游击队隐蔽自己，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损害群众利益。部队合编时，对那些混进来的不纯分子和为非作歹之徒，都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严肃的处置。

“湘游一纵”从成立到合编，时间不过半年，也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但是，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得到了应该得到的评价。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新湖南报》一版三条刊载新华社十二兵团分社发出的电讯说：“第一纵队与湘南人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人民的支援配合下经常袭击湘桂路上的白匪军车，打击地方团队，针对白匪‘空室清野’政策，发动人民抗丁抗粮。在三个多月中，进行大小二十余次战斗，歼敌四百余名，并发展壮大了自己。因此，第一纵队被白匪视为湘南的心腹大患。”

“湘游一纵”，这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的游击部队及其短暂的斗争史，曾经象一个小小的音符，溶汇入解放战争交响乐的雄伟豪迈的旋律之中，在祁阳的青山绿水间回荡。

